

伍啓元著

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

現代書局印行



現代

No.1417

中國新文化運動概觀

實價捌角

著作者 伍 啟 元

發行者 洪 雪 帆

印刷者 現代印刷公司

出版者 現代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現代書局

分店

南京 漢口 廣州
北京 廈門 汕頭
天津 鄭州 開封
濟南 洛陽 重慶
成都 九江 漢陽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1934 3, 10, 初版

1-1500册

序

所謂中國的『新』文化運動者，是指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運動而言，閉關自守的中國文化經過這一個時期的轉形，已併合到世界文化的潮流中了。最先冲破封建制度防壘的，是資本主義的文化。以後是各種的新潮，像洪水一樣，灌注到中國來。中國的文化更不是以前那樣的單純性了；何況封建文化受些微的打擊，並不能完全消沉，顯然的有些與資本主義文化成了交流，形成一種畸形的新思潮。實驗主義的澎湃，國故的新估評和整理，以及天賦人權等論調都在這種情形之下興起。

新舊思想所不能相混合的，就因互相的矛盾而衝突了。文化的進步是矛盾衝突的結果。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化運動，在意義上，祇能認為學術思想解放的序幕，因為衝突的爭辯還在開始。中國文化的基礎並未深固！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的『文學革命』，祇是形式解放。使發表學術思想趨于自由，便利。這並不能說是中國文化的復興。比較重要的還是由于這種自由與便利，引起發表懷疑態度的機會。暴露自己的思想乃與別人有矛盾的衝突。所持的武器，最重要者

有二種：一是杜威以及他的信徒們從資本主義的美國帶來的實驗主義；另外一種是唯物史觀，發生于介紹馬克斯思想到中國來之後。以這兩種不同的武器，對於古籍的內容，真偽，東西文化的比較，社會的性質，及人生觀等問題都有激烈的爭辯；直到今日還在爭辯着。

雖然直到如今，新文化運動並沒有怎樣的結果，當然也不能說告了結束，然而其重要性是我們所不能否認的。但是我們要得到一部總敘關於過去的新文化運動序幕的諸現象記載，是很不容易。現在伍啟元君以生動的筆法，清晰的條理，精當的敘述，客觀的態度來分敘新文化的幾個主要運動，使我們認識這運動的現象及意義，實在是值得稱讚的。

伍君曾與我在上海滬江大學同過學，但我們有友誼關係，還是在他與我脫離滬大之後。伍君是一個很用功的人，滬大畢業之後又曾在清華研究院繼續學業。他讀書之精博，是同學們所欽佩的。本書原來的題名是「現代中國學術思想史」，但是書名與內容不很貼切。我現在徵得伍君的同意改爲今名。

潘廣銘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

自序

研究中國現代的一切變遷，尤其是現代學術思想之史的發展，是異常困難的。一則因為中國尚沒有完備的雜誌論文引得，又沒有良好的新書目錄，所以材料的蒐集，很覺困難。二則因為時間太近，作者雖然抱着十分的客觀態度，有時仍難免於入主出奴，犯了史家所忌的過失。

對於本書的嘗試，筆者始終保持客觀的態度，祇把事實的真相呈現於閱者之前，而不願作任何評語。雖然筆者相信在一個時間一個空間，祇有一種思想是能把握着時代的浪潮，但筆者不願把自己的主張，作為這本史的分析之小冊底觀點。所以本書之缺乏批評的文句，是意料中事。

潘廣鎔先生給予筆者以很多可貴的指導與勸助，這是筆者所應特別致謝的。本書所以能夠出版，全賴潘先生的助力。

朱榮泉先生和陳幼樸先生給筆者校讀一遍，多所指正。此外劉湛恩先生和余日宣先生的數辭。祝秀俠先生和鍾榮蒼先生的督促，都是筆者所應表謝意的。

一九三三年，六，二三，於養生園

西洋文學概論

吉江喬松原著
高明譯

文學系本參攷書

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新文學，多少總可以說是受了些西洋文學的影響的。所以，現在從事文學的人，也應該了解一點西洋文學。但是，在新文藝出版界中，以前我們還不容易尋到一本簡明扼要的敘述西洋文學的書。這個缺憾現在可以讓中譯本的吉江喬松教授的本書來補足了。本書是以精要的五萬字，從唯物史觀的立場敘述西洋文學的面目，從希臘文學一直講到晚近西洋文學諸傾向。譯文曉暢，不僅從事文學者當人手一冊，即高中或大學用作教本，亦極適宜。每冊實價五角。

現代書局印行

西洋美術概論

陳之佛編

全書四號字直排精印 附銅版插頁西
洋名畫數十幅，三色版名畫二幅 二
十五開本 實價每册大洋一元二角。

關於西洋美術的著述，雖亦屢見於中國的出版界，然大都是側重於專門方面的，祇適於專門家的閱讀。到底美術不是專門家的美術，一般人也應該明瞭這美術的。但是現在西洋美術派別複雜，初學者確實不易找到頭緒。本書的編述目的是要使不是專門研究西洋美術的也能得到常識。編制極活潑，適宜中學校做教本或參攷書。

現代書局印行

西洋畫概論

實價一元二角

倪貽德著

· 次 目 容 內 ·

- 一 序論
- 二 西洋畫基礎知識
- 三 素描
- 四 水彩畫
- 五 油畫
- 六 人物畫
- 七 風景畫
- 八 靜物畫
- 九 動物畫
- 十 現代繪畫基本概念

著者爲國內著名西洋畫家，歷任各美術學校教授有年，素富於教學經驗。本書係根據其平素研究心得，就講席之暇，參考最新畫學理論編輯而成。內容除分論各畫派之理論的根據與背景外，更詳述水彩木炭素描繪之種種新技法，由淺入深，興味盎然，即平素對於西洋畫不相習者，亦能讀到畫的基本知識。全書都十萬餘言，附著者近作三色板畫一幀，及其他著名西洋畫新作二十一幅，裝幀堂皇，以之作爲美術學校教本或個人自修參考者，最見適宜。

現代書局 印行

目錄

上篇

| | | |
|-----|--------------|----|
| 第一章 | 緒論 | 二 |
| 第二章 | 社會的變革和思想轉變 | 十七 |
| 第三章 | 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 六六 |
| 第四章 | 實驗主義及其他 | 三 |
| 第五章 | 疑古思潮的澎湃 | 四 |
| 第六章 | 國故整理與其批評 | 五七 |
| 第七章 | 唯物的辯證法 | 六六 |

下篇

| | | |
|------|---------|-----|
| 第八章 | 引言 | 八〇 |
| 第九章 | 人生觀的論戰 | 八三 |
| 第十章 | 東西文化的討論 | 九三 |
| 第十一章 | 文藝的論戰 | 一〇四 |
| 第十二章 | 政治問題的討論 | 一二四 |
| 第十三章 | 社會史的論戰 | 一二七 |
| 第十四章 | 結論 | 一七三 |

上

篇

第一章 緒論

一

近世科學的發達和資本主義的進展把整個地球打成一片；無論願意與否，現在中國已是世界的一部，已不能再享受閉關自守的桃花源生活了。世界已是整個的世界，中國社會一切的轉移，也祇是受世界巨潮底動向所激盪。因之，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推移，也不過是跟着世界學術思潮的蛻變而轉捩吧。

本書就是指出現代中國思想界怎樣的不可避免地依着世界主要思潮而轉動。在『上篇』裏，將指出中國思想界怎樣的依着各國改革的過程，先把文字與語言打成一片（第三章）；怎樣的再進一步把美國的主要思想方法——實驗主義——介紹到中國來（第四章）；怎樣的把這個思考方法應用到中國古史的探討（第五章）和國故的整理（第六章）；和怎樣的另一派的思想家把另一個科學方法——馬克斯的唯物辯證法提出，並和實驗主義相對抗（第七章）。然而，這樣還未能

把現代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全局完全顯露出來。所以我們更進一步去敘述各種思潮彼興此替時所發生的各種衝突和論戰。（第八至十二章）

在未到本文之先，讓我們先把變遷的過程作一鳥瞰的敘述。但一種學術思想的所以能够產生，不是偶然的結果，而是由經濟的結構和思想的推移所孕育而成的。所以要使本文不是支離破碎的敘述，我們不能不回溯到九十年前，從一八四二年說起。

二

中國在這九十年來，學術思想有一個很大的劇變，就是從中國舊有文化轉到西洋近代文化的蛻變。這個劇變，可以分爲三大階段。第一個階段的時間很長，而變化又最慢。這個階段始於『鴉片戰爭』，直至甲午中日之戰；可以叫做中國舊文化的衰落期。第二個階段始於中日之戰，直至民國初年。在這階段中，中國文化的缺陷，最少在物質方面已被完全認識；所以西洋文化的接受事業，大有一日千里的趨勢。這個階段可以叫做新文化運動的啓蒙時期。第三個階段始於民國五年，直到現在。在這個時期內，學術思想界正式豎起新文化的大旗，極力提倡西洋文化；實在可以算是新文化運動的全盛時期。這個全盛時期，在現在還不過是一個開始；前途還有無限的

寶藏，正等候我們的學術界去發掘呢。

x

x

x

中國本來有她的特殊的文化：她的文化是靜止的，是中庸的，是緩進的，是知足的……中國社會，自春秋以後就沒有多大的變化；中國學術，自秦漢以來就沒有多大的進展，可以說是完全誤於這種文化的根本精神。如果不是歐風東漸，驚醒了中國人的迷夢，中國到了今天必還是在一個停頓的狀態。然而，西洋文化及其劇動的，向前的，急進的，不知足的精神，終於跟着歐西的堅船利礮湧進中國來。正如幾個年青力壯的人，如狼似虎地跑進了一個老人的屋裏；老大的中國文化是被定命要伏倒在西洋文化之前了。

在鴉片戰爭的時候，正是清代樸學大師埋頭伏案去做他們的考據工夫；清代學術思潮，已到了全盛時期的時候。然而，到了高峯點的『漢學』，受了西洋文化的衝動，也就轉入了蛻分時期了。梁啟超先生說：

「『鴉片戰役』以後，志士扼腕切齒，引為大辱奇恥，思所以自湔拔；經世致用觀念之復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開，所謂『西學』者逐漸輸入；始則工藝，次則政制。學者若生息於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窺，則粲然者皆昔所未睹也；還顧室

中，則皆沈黑積穢；於是對外求索之慾日熾，對內厭棄之情日烈。欲破壁以自攻於此黑闇，不得不先對於舊政治而試奮鬥；於是以其極幼稚之「西學」智識；與清初啟蒙期所謂「經世之學」者相結合；別樹一派，向於正統派公然舉叛旗矣。此則清學分裂之主要原因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在這九十年來的第一個階段內，在學術思想建設方面的最大貢獻，要算是莊存與氏，劉逢祿氏，龔自珍氏，魏源氏……在「今文學」上的貢獻。但龔諸氏的貢獻，有比他們的建設更重要的，就是解放思想的事業。

鴉片戰爭之後，又有一八六〇年的英法聯軍入北京，火燒圓明園的慘劇；如此外患重重，保守的清室，也有一些覺悟，要做些皮毛的改革。如一八六一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一八六七年設立同文館；一八七三年設立鐵路局；一八七七年遣派學生至英法留學……都是一時的新政。然而這些新政，實在祇是外表上的改革。這個階段的真正意義，卻是在破壞方法。因為舊文化在這個時期，已漸漸將它的弱點暴露出來了。

自甲午之役，地廣民衆的中國竟敗於維新後的三島國——日本，於是西洋文化的重要已被一

般明事理的人所承認，而效法西洋的呼聲日高一日。思想界遂走入了新文化運動的啓蒙時期。

新文化運動的啓蒙時期的開幕，大約要算一八九五年梁啟超氏和康有爲氏等的公車上書。請求變法的盛舉了。後來變法的提議，終沒有被完全採納，他們所創立的強學會也被封閉。但他們還是再接再厲，時務報在一八九六年出版了，新民叢報在一九〇二年刊行了；這兩份雜誌先後代表了兩個時期，先後把西洋文化輸入，變成了新文化運動啓蒙時代的思想的中心。

在翻譯界上，我們就有嚴林兩顆明星了。林琴南氏的譯品，是在文藝方面，他所介紹的文學名著，確是不少。嚴復氏的譯品，是在學術方面；他所譯的天演論（赫胥黎原著），羣己權界論（穆勒原著），羣學肄言（斯賓塞爾原著），社會通詮（甄克思著），原富（亞丹斯密原著），法意（孟德斯鳩原著）等，對學術界的影響甚深。新文化的介紹，全靠翻譯，所以，嚴林二氏在學術思想上的貢獻，確是不少。

在文學方面，除了嚴林二氏的翻譯文章外，有譚嗣同氏和梁啟超氏等一派的議論的文章，章炳麟氏等的述學的文章，章士釗氏等的政論的文章。這都是在古文的範圍以內革新，但對民五的新文學運動亦不無影響。

在學術方面，『今文學家』大佔上風，今文學已漸漸到了全盛的時代。今文學運動的中心人

物是康有爲氏；他所著的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能夠脫離學術界迷信的藩籬，用懷疑的目光去重新整理，實在影響於近幾十年的學術界不少。但當時繼承正統派的學說，主張『古文』，與今文派相抗的，大不乏人；章炳麟氏和劉師培氏就是『古文派』的領袖。

這個時代學術思想的中心精神，不在今古文的爭辯，而在西方文化的引進。在位的學者，如張之洞氏之流，極力提倡『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理論；他在一八九八年（光緒二十四年）發表了他的勸學篇，主張派遣學生出洋，分詣各國研究政治工商兵法……他的勸學篇，並且奉諭頒行各省，可見當時政府對西洋文化的注意。同年康有爲氏與梁啟超氏等的維新運動得了德宗的贊許，於是他們就擁護德宗，實行新政；可惜遇着西太后和一班舊勢力的反對，結果，戊戌的變法沒有成功，反死了譚嗣同氏等六君子。但新文化更被人注意；攝政的西太后也不能不有所改革。所以一九〇三年（光緒二十九年）張之洞氏，榮慶氏，和張百熙氏的『學堂章程』，竟被採用，並且施之實行。於是數百年來的科舉制度就被廢除，西洋教育學制遂在中國實行。同時留學生出洋，也日盛一日；中國學術思想界，也和西洋學術思想一天接近一天了。

當時在野的思想家，沒有一個不受西洋文化的影響的。如章炳麟氏的『種族革命論』，章士釗氏的『政論』，新民叢報的立憲主張，民報的民主主張，雖是派別不同，但都是受西洋文化的

影響，則可斷言。新民叢報對西洋文化的提倡最力，其有功於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亦最大。

然而「晚清西洋思想的運動，最大不幸者一事焉。蓋西洋留學生殆全體未嘗參加於此運動；運動之原動力及其中堅，乃在不通西洋語言文字之人。坐此爲能力所限，而稗販，破碎，籠統，膚淺，錯誤，諸弊，皆不能免；故運動垂二十年，卒不能得一健實之基礎。旋起旋落，爲社會所輕。就此點論，則疇昔之西洋留學生，深負於國家也。」（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六三）

三

直到西洋留學生起來參加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才走進了第三個階段——全盛時期。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新青年」的一班人，如胡適博士，陳獨秀氏等；他們正式發起新文化運動的旗幟，集合同志，努力提倡，所以形成了一個很大的劇變——從中國文化轉到西洋文化。

X

X

X

所謂西洋文化究竟是甚麼？西洋文化的中心，不外「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兩大怪物。新文化運動所要提倡的，就是這兩大怪物了。「德謨克拉西」的精神，是注重個人的自由發展；要人人有發展的機會，當然先要有教育上的平等。但在教育上要使人人有機會求學，必不是在深

與，彫琢文學的社會中所能夠做到的事；因之，他們第一步就起來改革文學，使文學通俗化，使文學民衆化。這就是文學革命運動。

『賽恩斯』——科學——的重要，不是祇限於機器的一方面；科學的精神，科學的方法比其他一切的科學的結果更爲有價值。所以介紹科學的方法，是新文化運動者的責任。科學方法最盛行的有實驗主義；因之，胡適博士等就極力提倡。這就是實驗主義的引進。

實驗主義引進之後，學術思想界受其影響最深；但學者用實驗主義的方法論治學而又最有貢獻的，有『疑古派』的一班人。疑古思潮，在學術史上可以說是上接於今文學派的思潮的

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對舊文化有所認識；要打倒舊文化，更應先明白舊文化爲甚麼要被打倒。所以新文化運動者，就不惜用他們的時光，用他們的智力，用他們的新方法，向故紙堆中去研究。國故整理事業，因此大有可觀。

科學的方法不限於實驗主義，辯證法的唯物論至少也有同樣的重要。所以另外一派的新文化運動者，就提倡辯證法的唯物論。但實驗主義者，對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常常施以攻擊。這兩派的學者，至今還常常互相爭論。

這就是現代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過程。總括起來，可以分爲三小階段：（一）文學革命運動，

(二)實驗主義的引進，(三)辯證法唯物論的引進。

x

x

x

自歐戰以後，西洋文化已漸漸顯出破綻，科學的人生態度已漸漸被人懷疑，同時西洋思想界，已漸漸從個人主義轉到社會本位主義。中國新文化運動，到戰後才到全盛的階段，當然所受的阻力甚深。所以自五四以後，對科學表示懷疑的：有張君勱氏的人生觀，和梁啟超氏的歐遊心影錄，梁漱溟氏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這幾篇文章，立刻就引起新文化運動者的反響，因而形成正式對壘的人生觀的論戰，和沒有正式對壘的東西文化的討論。

在最近幾年，反對個人主義而提倡社會本位主義的甚多，其最顯明的是『革命文學運動』。另一方面，有一部分的人，對個人本位的民主政治和社會本位的社會主義，都加以反對，而提倡所謂適合於中國文化的『村治』運動。有一部分的新文化運動者，對此不能滿意，因而形成了文藝的論戰和政治問題的討論。同時唯物辯證論者，因對中國經濟性質的認識不同，遂引起了所謂『社會史的論戰』。

這就是五四以來學術思想上的衝突。

我相信現代中國學術思想變遷的主流不過如此，在下文我們再詳細地分別討論罷。

第二章 社會的變革和思想的轉變

一

自從工業革命成功，資本主義擡頭之後，經濟的力量，已逼着西歐工業國家向外發展，以求解決他們原料的供給和生產品的銷售。這樣，自從一八七〇年到現在，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的過半，已被帝國主義者所分割：這些地方，不是被收爲殖民地或屬地，便是劃爲勢力範圍或保護國。因此，這些後進的民族都被捲入資本主義生產的旋渦，他們都變了資本主義制度不可少的分子。中國就是在這半個被宰割的地球中的一部分。所以，客觀的條件已使中國不能閉關自守，更不能自行建設封建的制度了。自廣義來說，即站在整個世界的立場來說，無疑地中國已是國際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的一個構成者了。

同時，中國自身的民族資本主義，也因帝國主義的來臨而日益擴大。帝國主義雖不是有意地使中國資本主義化，雖是常常有意地設法阻障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達，但帝國主義的侵入中

國，已於不知不覺中使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條件建立起來。馬克斯說得好：

「資產階級既急激的改良了生產工具，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機關，於是把所有一切，甚至於野蠻的人民都推入於文明的道路上了。那價廉物美射擊力，即中國的城壁也被打破了；就是極端排外頑固的野蠻人也祇得降服了。世界各國爲要免得滅亡的運命，也祇得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牠將所謂文明輸入他們的社會，就是要把自己也變成資本家。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將要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1)

帝國主義者怎樣的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國呢？下面四點，就是最明顯的方法：

(一) 帝國主義者破壞了中國舊時經濟制度的獨立與閉塞——因爲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不能不簽訂了南京條約，允許了開設五口通商。後來中國又和其他強國簽訂了許多條約，劃了許多通商口岸，增加了不少租界，失了不少土地，現在中國的條約口岸 (Treaty Ports) 的數目已有四十多。通商口岸設立之後，外國貨物遂不停的輸到中國來。這根本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經濟。不但如是，通商口岸——尤其是通商口岸內的租界，變成中國資本主義的中心。這裏一方面因爲地理的優點，原料的供給和市場的接近使中國工業易於發展。同時因爲帝國主義的銀行和其他利便工業發展的金融機關，先後在通商口岸的地方設立。而且通商口岸裏的中外人才很多；所以，中

國工業的發展的客觀條件，在租界已經存在。故中國工業的發達，是近於租界或通商口岸的所在地的。例如中國最興旺的工業——紡績業，其設立於租界或通商口岸的有三十六家，而設立於其他地域的有三十五家。但這三十五家，差不多都是鄰近上海市鎮的。

(二) 帝國主義發展了中國的交通事業——資本主義是一種商業生產的制度。交通事業不能發展，交易便不能暢通，大量生產變成了不可能，而資本主義亦必不能發達。帝國主義者的來臨，發展了中國的交通事業。其結果，擴大了中國的市場，提高了中國的生活程度，開取了中國的天然富源，並且使中國工業因而發展。不過，我們不要受帝國主義者的欺騙，以為帝國主義者是負起了『白人的責任』而發展中國；他們的發展中國交通事業，不過是要使中國的市場擴大，以增加中國購買他們貨品的能力。交通事業的發展，可以分爲三方面說：第一方面是鐵路。中國現有的鐵路里數是：

國有鐵路

六五〇一里

外國管理者

二一四七里

共計

八六四八里

但這六千餘里的國有鐵路，大部分是靠外國的投資的。鐵路外債的數目有四六五，五五〇，四三

五元，而鐵路內債不過七三·九八八，七八〇元。可知中國鐵道的完成，可說是帝國主義者的功勞。第二方面是航業。航業的發展，和鐵路一樣的重要。中國航海的輪船，少得幾乎等於沒有。往來於中國各口岸的都是掛着外國旗子的。就是內河的輪船，也是操之於日英兩國的手上。(3) 第三方面是電話電報。茲將各國投資到中國電話電報的資本列下：

日本

四五，〇九二，〇〇〇日圓

英國

二一〇，五四八，〇〇〇金鎊

德國

四七，〇〇〇金鎊(4)

(三) 帝國主義的在華投資。資本主義的世界是再矛盾也沒有的世界。資本主義的國家，在國內有整千整萬的失業工人，而不加救濟，却不停地把資本輸出，尤其是投資於後進的國家裏面。因為「資本主義越發展，利潤率越低落。於是資本向利潤率較高的地方（即資本主義發展較低的地方）移動。」(5) 資本主義國家輸出資本，可以分政治的投資和商業的投資。商業的投資較為重要。因為統計的不容易調查，商業的投資的實數不能查得；下列的表，祇把外國在華的商業投資的較可靠的估計指出吧：

圖別

在華商業投資總額

| | |
|-----|-------------------|
| 英國 | 一,五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元(6) |
| 日本 | 八七七,〇〇〇,〇〇〇元(7) |
| 法國 | 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元(8) |
| 德國 |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9) |
| 美國 | 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10) |
| 意國 | 六〇八,〇〇〇元(11) |
| 葡國 | 一·三四三,〇〇〇元(11) |
| 比國 | 一六,二六〇,〇〇〇元(11) |
| 丹麥 | 二四二,〇〇〇元(11) |
| 瑞典 | 三八一,〇〇〇元(11) |
| 荷蘭 | 五〇,〇〇〇元(11) |
| 西班牙 | 二九〇,〇〇〇元(11) |
| 奧國 | 一〇〇,〇〇〇元(11) |
| 合計 | 三,四一八,二七四,〇〇〇元 |

此外還有大量的投資於政府的借款。這種資本輸入中國的結果，使中國的交通事業和金融事業進步，使工業發展的根本條件成立，使中國也踏進了國際資本主義的領域。

(四) 帝國主義在中國所設立的工廠底發展——帝國主義在中國設立工廠，實在給予中國工業以相當的刺激和鼓舞。而且外國工廠的設立，訓練許多工人；這些工人都可以給新興中國民族工業的利用；這也是帝國主義發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一個方式。(12)

雖然在理論上和實際上，帝國主義的來臨，會使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但利用模稜兩可的術語，以作個人政治主張的根據，而說中國是封建社會的，實大有人在。那麼，正如陸克 (John Locke) 所說：『無論是誰，倘若他去研究那爲着用字的不當而在世上蔓延的不準確，含糊，謬誤，和混亂，就一定會懷疑到我們所用的語言對於人類智識的貢獻究竟是增進還是障礙了。』現在，我們要把中國經濟性質弄清楚，我們便不能不先把『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名詞弄得明白。現在把這兩個制度的特徵和差別分述於后：

第一：封建社會的經濟是一種自然的經濟，而資本主義經濟是貨幣的經濟和信用的經濟。今日中國之超出了自然的經濟已是很明顯的事實了。

第二，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在農業和封土上，而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在商業和工業的資本。像西歐中世的封土在中國早已不存在；而商業資本自秦漢以來已反覆地發展了。商業資本的發展不祇是一種事實，而且反映於學術思想的上面。例如司馬遷就是辯護資本主義的人物。(18)到了現在，銀行和錢莊的發達，工業的機械化，農村的再分解，已使我們不能不承認封建制度的完全崩潰和工業資本的擡頭了。

第三，封建社會結構中的對立階級是封建主和農奴，而資本主義制度裏的對立階級是資本家和工人。封建主所給予農奴的是『保護』，而資本家所藉以維持其地位的是他們蓄積着的資本。在中國社會史上，封建主早已不存在，而自由農民爲着要求得保護而不能不降格而爲農奴的客觀環境；亦早已沒有。同時，商業資本家很早就擡頭，不過『自由』勞動者除了出賣自己的勞力外無以生存的客觀條件，直到十九世紀中葉才建立起來。

第四，在封建社會中，封建主決定了城市的命運；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農村的命運操於城市的手中。在中國經濟史上，資本家老早就操縱了農村。(14)到了帝國主義侵入之後，這種情況更爲擴大，例如——

『中國很僻遠的農村中都要購買洋油火柴等等日常生活工業品，假使這種工業品在城市發

生恐慌，馬上便影響到農村去；然而，農村的農產品或米穀發生恐慌，城市一時還可得到國際市場的接濟避免危險。這便證明鄉村再生產行程不但依靠城市的再生產行程，並且依賴於國際市場交換的順利進行。反之，我們可看到年來中國邊境不斷的災荒，不但不足以影響到敦倫，巴黎，紐約；即上海亦不足受重大的影響。而一九二五年，「五卅」，上海香港大罷工，不但影響到全國，如大難將至，而且影響到美國，日本等等國家。(15)

第五，封建制度的剝削的普遍形式是超經濟的榨取——力租和物租，封建主具有經濟外的強權。而資本主義的剝削方式是剩餘價值。中國今日社會雖仍有封建的殘餘，但主要的剝削方式已是資本主義的經濟了。

第六，在封建社會裏，封建主沒有生產工具，而農民有一切的農本；在資本社會裏，資本家有生產工具，而工人祇是出賣其勞力。今日中國的社會，在農村裏我們還可以看見具有農本的農民，不過這些農民是自由的而不是農奴。至於城市方面，則因生產的日漸機械化，工人已不能再有他們的工具了。

第七，資本主義社會是建築在自由競爭的學理上。所以生產上的無政府狀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徵之一。在封建社會中，農村的生產由封建主去支配，而城市手工業又為行會所壟斷。今日

中國社會很明顯的已走上了自由競爭的途上了。

綜上所說，可見今日中國已非封建的，而是資本的社會了。

x

x

x

我們再不要夢想中國還可以成爲自給自足的社會了。站在整個國家的立場上，中國已到了不和外國交易不能生存的地位。根據海關十九年度報告，外國輸入的商品是——

| 類別 | 值 | 關 | 平 | 兩 | 百分比 |
|-------|-----|-----|-----|---|-------|
| 棉貨 | 一四九 | 八三八 | 八〇八 | | 一一·四四 |
| 棉花 | 一三二 | 二六五 | 六六九 | | 一〇·一〇 |
| 毛製品 | 二四 | 八〇四 | 四二四 | | 一·八九 |
| 麻貨 | 一九 | 八四〇 | 三四〇 | | 一·五二 |
| 八造絲 | 一四 | 九四〇 | 四三八 | | 一·一四 |
| 以上是衣類 | | | | | |
| 米 | 一一一 | 二三四 | 一九三 | | 九·二六 |
| 糖 | 八六 | 三九〇 | 八〇六 | | 六·六〇 |

麪粉等

三一，九二六，二二〇

二·四四

海產品

二五，八五三，二二二

一·九七

糧食等

二三，二六〇，六六四

一·七八

小麥

一二，八三〇，六九〇

〇·九八

葷食

一二，四五〇，二〇九

〇·九五

以上是食類

化學品

四，九〇四，九四四

三·五八

紙

三七·三八四，三七五

二·八五

燭

四八，九二五，一〇八

三·七四

菸

三一·〇九九，七二四

二·三七

紙菸

二五，七六六，二三七

一·九七

以上是日用品類

礦物

七五，八八〇·八〇六

五·七九

煤油

五四，八六四，五四六

四·一九

機器

四四，二八三，二〇七

三·三八

煤

二四，九一九，四七五

一·九〇

電器品

一七，二九九，五六六

一·三二

以上是工業用品類

染料等

二五，七六五，四七一

一·九七

木材

二三，一七七，五七〇

一·七七

其他

二二〇，八四九，一二八

一六·一〇

以上是雜類

從上表我們得到下面數目字——

(類 別)

(百分比)

衣品類

二六·〇九

三四二

食品類

二三·九八

三一三

工業用品類

一六·五八

二一七

日用品類

一三·五一

一七七

價額(以百萬海
關兩為單位)

雜類

一九·八四

二六〇

統計

一〇〇·〇〇

一·三〇九

可見中國大量的必需物品都是來自外國的。我們再不要閉着眼睛去說中國還是自給自足的社會了。

就是站在農村的立場，我們也不能說中國是自給自足的社會。現在鄉村的農民，已有很多吸食外來的香菸和燃着火油的燈了；我們若跑到鄉間去，我們就曉得大多數的農民已不再織造他自己所穿的衣服了。

不但如是，我們這個以農立國的國家祇有東北幾省是能夠供給省內所需要的食料的。下面的一個統計指出中國食料供求的實況：

| 地域 | 需要的數量 (以百萬斤為單位) | 生產的數量 | 差額 |
|-----|--------------------|-------|--------|
| 黑龍江 | 一，八七六 | 三，九九二 | 餘二，一一六 |
| 吉林 | 三，七六二 | 六，四三五 | 餘二，六七三 |
| 遼寧 | 六，七八四 | 八，一四五 | 餘一，三六一 |
| 熱河 | 一，三七一 | 一，七二八 | 餘 三五七 |

| | | | |
|-----|---------|---------|------------|
| 察哈爾 | 九〇三 | 一，二九一 | 餘 三八八 |
| 東北 | 一四，六九六 | 二一，五九一 | 餘六，八九五 |
| 山西 | 五，五〇二 | 五，四六七 | 差 三五 |
| 河北 | 一四，〇〇〇 | 一〇，三一五 | 差三，六八五 |
| 山東 | 一六，七〇〇 | 一三，二一五 | 差三，四八五 |
| 河南 | 一四，九五〇 | 一二，六二三 | 差二，三二七 |
| 華北 | 五一，一五二 | 四一，六二〇 | 差九，五三二 |
| 湖北 | 一一，七四一 | 一一，六〇二 | 差 一三九 |
| 安徽 | 九，六一三 | 六，九一四 | 差二，六七三 |
| 江蘇 | 一五，一六〇 | 一五，一二三 | 差 三八 |
| 浙江 | 九，〇六九 | 七，二九二 | 差一，七七六 |
| 華中 | 四五，五八四 | 四〇，九五八 | 差四，六二六 |
| 廣東 | 一三，一三三 | 八，四六一 | 差四，六七二 |
| 統計 | 一二四，五六五 | 一一二，六三〇 | 差一二，九三五(6) |

這一類的統計指示給我們的有兩點：第一，中國已不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第二，中國雖已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路，但資本主義是異常的微弱，而且機械的生產還沒有多大的發展，所以生產的數量不大。這是中國的一個大危機：一方面舊的制度已經崩潰，而另一方面新的制度祇建立了一個在動搖着的基礎。

11

經濟的結構是社會的基礎，在這基礎的上面豎立了政治，學術，生活等等上層的建築。這些上層建築的變遷都是隨着經濟基礎的變遷而轉移。所以現代中國思想的蛻變，完全是基於現代中國社會這個大轉變——向工業資本主義推移的一大轉變——的。

把民國以來我國學術思想的蛻變概括起來，可以分爲四大階段——

- (一) 直覺主義的階段，
- (二) 實驗主義的階段；
- (三) 唯物辯證論的階段，
- (四) 東方文化的階段。

直覺主義代表了封建殘餘的『迴光反照』；實驗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的擡頭；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以反對資本主義的理論；而東方文化論是站在理想主義的立場來反對資本主義的理論。這四種思想潮的發生，很顯明地是建築在走向資本主義途中的經濟結構的。

關於中國現代社會變革和思想轉變的關係，我們有再加以說明的必要：

第一，帝國主義的來臨，國際資本主義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國，這是現代社會變革的一大特徵。基於這一個現象，思想界的發展，全以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精神為中心。換句話說，學術思想是以迎拒西洋資本主義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為核心。

第二，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擡頭，封建殘餘的日益崩壞，這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另一特徵。我們必要把握着這一點，我們才不會驚訝為甚麼在二十世紀的時候還有胡適氏，羅隆基氏之流去死抱着西歐十八世紀的政治哲學——天賦人權，自然權利……不放。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會了解一切封建制度的迴光反照。

第三，中國已不是一個世外桃源，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社會，而是國際經濟制度下的一個構成者了。這是現代社會變革的另一個特徵。因為如是，中國學術思想的推移，總逃不出世界思想巨流的激盪。所以一切適合於中國的或不適合於中國的思潮，都先後的被紹介到中國來，而許多

國際思想界的爭辯，都在中國重演一遍了。

第四，現代社會變革的另一個特徵，是舊的制度已經崩潰，而另一方面新的制度仍未建立起來。新興資本主義祇有一個動搖着的基礎。所以中國民族，自其經濟的結構言，自其社會的基礎言，自其學術的思想言，都是徬徨於歧路的。雖然事實上祇有一條必然的生路，但路向的紛紜，却是不能否認的了。

『多難興邦』雖未必是金玉之言，但至少國家的多難，社會的轉變，其有益於思想的發展實是不少。現代思想的發達，完全是由於上述的社會變革所激盪的。

(1) 馬克斯共產黨宣言

(2) Vikra Nagro: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p3

(3) 麥看舒宗燧中國航業概論

(4) 嚴靈峯中國經濟問題研究頁七九

(5) 石濱知行唯物史觀經濟史錢譯本中冊頁一四〇

(6) D. K. Lieu: "Foreign Investments in China" pp9

(7) Ibid, pp23

(8) Ibid, pp31

- (a) *Ibid.*, p135
- (2) *Ibid.*, pp15
- (1) *Ibid.*, pp38
- (2) Akira Nagomi: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China pp13-15
- (3) 參看胡適司馬遷辯護資本主義 (見經濟學季刊卷二期一)
- (4) 參看漢書食貨志上 (特別是蕪銷的話)
- (5) 嚴靈峯中國經濟問題研究頁四五
- (9) O. C. Chang: "China's Food Problem" pp26

第三章 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

中國文學，自東漢提倡四六駢體以後，就未逃出過咬文嚼字的圈套。韓昌黎雖是有過一次的改革，但結果還是沒有多大的進展；兼且韓氏在文學上加了一個『師古』的口號，至使中國的文學，到了清末還是模倣古人。模倣古人，便沒有創作性，沒有生氣。在這樣『半死不活』的文學空氣中，學術思想必不會突飛猛進的。因為文學是表現思想的工具；工具不好，思想自然也大受阻礙。而且一個人的能力有限，他既用了許多工夫去模倣古人，去咬文嚼字，試問他還有多少餘力去思想，去發明呢？同時他既天天沉迷在模倣的工作裏，自然『模倣成性』，不肯創作了！中國學術界自秦漢以來，便沒有甚麼大的發展，這是一個原因。

歐洲文學傳到中國來後，中國人漸漸感覺到自己文化的缺陷，於是那些新思想家就起來提倡效法西洋。他們看見自己學術的沒有生氣，他們看見有思想的人都消磨在咬文嚼字的工夫裏，他們又看見西洋語言文字合一的好處，所以就思有以改革。最先去提倡革新的，是王國維氏，梁啟超氏，譚嗣同氏等。王氏可以說是最先澈底明白文學價值之一人；他在『文以載道』風氣甚盛的

時候，竟能夠以『描寫人生』做文學的目的，竟能夠說『一代之文學』，不能不算是識膽過人。後來他轉變了研究的對象，對文學改良一方面遂不能有多大貢獻。至真能影響一時，能夠做文學革命的先驅，我們就不能不推崇梁啟超、譚嗣同諸氏了。梁氏寫文章，完全不像桐城派的古文；他自己說他寫文章——

『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頁一四二）

他不但創造一種新文體及輸入日本文的句法，他更能把戲曲小說與論記文平等相待，能夠領會文學的真精神。所以錢玄同氏說：

『梁啟超先生實為近來創造新文學之一人。……鄙意論現代文學之革新，必數及梁先生。』

（胡適文存頁三七）

而且梁啟超、譚嗣同等氏，又提倡過漢字改革；譚氏在他的仁學，更主張廢除漢字，實在是識膽過人。因一國學術的盛衰，完全是由於教育的普及與否；想求教育的普遍，非將艱深的漢字改成拼音文字不可。所以嗣同先生的主張，實在是補救時弊的良藥。戊戌政變之後，國人對於文字的問題，漸加注意。當時許多人發起了一個國語運動，研究拼音字母，創作簡字字譜，勢力頗大。一

九一一年，民國成立，這個國語運動就大為發達：教育部更招集了一個『讀音統一會』，議定了注音字母三十九個；民國七年，教育部更正式公佈注音字母，民國八年，又重新頒定注音字母次序。國語運動到了這個時間，可以說是到了全盛時期。一時有名的新思想家，如吳稚暉氏，錢玄同氏……都極力替國語運動宣傳；而且當時上下一致，對這個運動表示同情。後國語運動便漸漸衰落，到了現在便完全沈寂了。

民國五年間，在國語運動——『文字改革運動』——最興盛的時期，文學革命開始了。文學革命和國語運動有同一的目的：求文字的普遍；但文學革命運動，更進一步要打倒那『半死不活』的古文，更進一步要建設有生氣的國語文學。參加文學革命的文人學者很多：他們的領袖是胡適氏和陳獨秀氏，他們的健將有錢玄同氏，周作人氏，魯迅氏，劉復氏……

文學革命的第一砲，要算胡適氏的『八不主義』的提出了。他的『八不主義』是：

(一) 須言之有物——不做沒有情感，沒有思想的文章

(二) 不摹倣古人

(三) 須講文法——不做不合文法的文章

(四)不作無病之呻吟

(五)務去爛調套語

(六)不用『典』

(七)不講對仗

(八)不避俗語俗字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

胡氏這『八不主義』一提出，有很大的影響。但胡氏的主張，不過是消極的改良。陳獨秀氏便不同了：他要甘冒全國學究之敵，去高張『文學革命』軍的大旗，提出『三大主義』：

(一)推倒彫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
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二)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
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三)推倒迂晦的艱澁的山林文學，
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陳獨秀文學革命論)

陳氏更說他願拖『四十二生的大砲』，爲文學革命的前驅；於是他所主編的新青年，更不停地提

倡文學革命。

民國六年胡適博士從美國回來，就在各處演講文學革命。這個時候，他把他的『八不主義』，改成了肯定的口氣，總刮作四條：

(一)要有話說，方纔說話。

(二)有什麼話，說什麼話；話怎麼說，就怎麼說。

(三)要說我自己的話，別說別人的話。

(四)是什麼時代的人，說什麼時代的話。(胡適文存頁七九)

後來他又寫了一篇建設的文學革命論，用十個字來代表他們的主張。這十個字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他又指出創造新文學的進行次序，他以為應分三步：第一步是先預備下創造新文學的工具，換句話說，就是多讀和多作白話文學；第二步是多繙譯些西洋的文學名著來做我們的模範，使我們能夠有一種好的文學的方法；第三步是自己去創作，去創造中國的新文學。

民國七年冬間，陳獨秀氏又集合同志，創辦每週評論，與新青年一同的用白話寫文章。當時國內智識階級，表同情於文學革命的日多一日；北京大學的學生羅家倫氏，傅斯年氏，汪敬熙氏等，便出了一份月刊——新潮——來響應胡陳諸氏。

民國八年五月四日，驚心動魄的學生運動開始了。當時學生運動的團體，爲了宣傳的原故，刊行無數的小報紙。這些小報紙，都是用白話文體的。同時白話的新雜誌，也日多一日。這樣一來，文學革命運動的進展，大有一日千里之勢。學生運動是促進了文學革命的成功，是不能否認的事。胡適氏也說：

『民國八年的學生運動雖是兩件事，但學生運動的影響能使白話的傳播遍於全國，這是一大關係；況且「五四」運動以後，國內明白的人漸漸覺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們對於新潮流，或採取歡迎的態度，或採取研究的態度，或採取容忍的態度，漸漸的把從前那種仇視的態度減少了，文學革命運動因此得自由發展，這也是一大關係。』（胡適五十年

來中國之文學）

民國九年，白話文更佔優勢了。各日報多有白話文的副刊，其中最重要的是：北平晨報的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和上海時事新報的學燈。（晨報和時事新報，都是『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副刊和學燈都在近年來學術思想上有相當的貢獻。）民國九年以後，白話文更爲盛行，到了現在，已成了一個白話文的世界了！

X

X

X

文學革命和其他的革命一樣，是遇過很多反對的。林琴南氏就是第一個向文學革命提出非難了。林氏在文學革命開始的時候，就寫了一篇論古文之不當廢來攻擊文學革命運動；後來他又寫了妖夢，荆生等幾篇小說，來痛罵北京大學的文學革命者。他又寫信給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氏，責難文學革命派，說他們是侈爲不經之談，盡反常軌；覆孔孟，剷倫常，違忤五常，叛親讎倫……他又說他們用『土語爲文學』，用『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做文章，兼且盡廢古書，實在是罪大惡極。蔡氏也就作書向他反駁。後來林氏又寫了一篇論古文白話之相消長，斷定古文之不會燼滅；他說：

『古文一道，曲高而和少，宜宗白話者之不能知也。……吾輩已老，不能爲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請諸君拭目俟之。』

林氏可以算是代表保守派的最後掙扎，但這種掙扎終於失敗了。到了民國十年，文學革命運動又遇着第二個敵人——折衷派的學衡雜誌。

學衡派的中堅人物是胡先驥氏等一班留學生，他們的宗旨是『昌明國粹，融化新知』；換句話說，他們主張在古文的範圍以內改良，不贊成文學革命。胡先驥氏說：

『某不佞，亦曾留學外國，寢饋於英國文學，略知世界文學之源流，素懷文學改良之志，

且與胡適之君之意見多所符合。獨不敢爲鹵莽滅裂之舉，而以白話推倒文言耳。……」

(胡先驥中國文學改良論)

這最能代表折衷派的意見。然而，時代的潮流已注定文學的革命，折衷派的議論也不能有多大的影響。民國十一年胡適氏在他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便宣告了文學革命的完全勝利。他說：

『學術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討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

真的，文學革命已過了討論的時期；不過學術還未算反對黨的尾聲，文學革命還有它最後的敵人——章士釗的甲寅周刊。甲寅周刊在民國十四年出版，那時章士釗正在做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所以聲勢頗大。但文學革命運動已深入人心，新文學已漸漸立定基礎，已漸漸根深蒂固了；章士釗氏的最後奮鬥，終不能搖動新文學絲毫。於是吳稚暉氏正式宣告舊文學的死亡，寫了一篇友喪，要替章氏發喪！此後文學革命運動，再沒有反對的敵人了。

x

x

x

在這幾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界最重要的運動，正如上文所說，就是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範圍很廣闊，文學革命運動也不過是它的一部分。它的根本意義，就是一方面根本承認中國

舊有文化的缺陷，同時提倡接受西洋的文化。所謂西洋的文化，有兩個特徵：（一）科學，（二）『德謨克拉西』。在這幾十年來，中國思想界沒有一天不受『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的影響；在五卅運動以後，其影響更日深一日。新文化運動，就是提倡這兩件東西。

新文化運動始於戊戌維新運動的時候；但到民五才正式的提倡。新文化運動的中堅人物，當然就是文學革命運動的一班人；新文化運動的反對者，自然也就是章士釗等一流人物。不過章氏等的反對，也祇是曇花一現，轉瞬就幻滅了。

新文化運動以來，學術思想上的最重要的事業，如文學革命，如實驗主義的提倡，如辯證法唯物論的引進……都是新文化運動範圍以內的東西。所以說：新文化運動是現代學術思想史上最重要的運動。

新文化運動的反動分子如章氏等（章氏的甲寅雜誌，也嘗做過一個時期的領導者；但到了甲寅周刊時代的章氏，他就成了一個反動分子。思想家趕不上時代，就不能不落後和失敗，可嘆。）雖是無能為力，但新文化運動始終遇着牠的唯一敵人——折衷派的東方文化學者。折衷派的東方文化學者，有許多是新文化運動的先驅，後來卻轉了態度，讚揚東方舊有的文化。（不過他們並不是反對新文化）梁啟超先生就是一個例：（新民叢報時代的梁氏是西方文化的提倡者；

但歐遊心影錄的作者梁氏，卻變了一個東方文化學者。所以吳稚暉氏在反對梁氏提倡東方文化理論時說：『這種話頭是……二十年前梁卓如爲了張之洞說的，不料到了今天還要陳庸腐臭的吳稚暉爲了梁啓超張嘉森說，真算倒楣。』五四以來，學術思想界的論戰和討論，如人生觀的論戰，東西文化的討論，政治問題的討論……都不過是東方文化學者與新文化運動者的爭辯。在這種爭論裏，兩方都有充足的理由，誰勝誰敗，現在還未能預料。不過科學和『德謨克拉西』影響之深，却是不能否認的事；而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運動，已完全成功，同時新文化運動其他部分的日有進展，這都是不能不承認的事實了。

參考書

胡適文存（民十亞東出版）

胡適文存二集（民十三亞東出版）

獨秀文存（民十一亞東出版）

陳炳堃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民十九太平洋出版）

X

X

X

第四章 實驗主義及其他

現代中國學術思想的一大變革是實驗主義的引進。實驗主義的引進，可以說是中國思想走上科學大路的新紀元。

實驗主義 (Pragmatism) 有三個根本的要點：

第一：實驗主義是一種思考的方法，一種科學的方法，一種實驗室裏的方法。杜威氏論思想，把思想分作五步：(一) 起於疑難的境地；(二) 指定疑難之點究竟在什麼地方；(三) 假定種種解決疑難的方法；(四) 決定那一種假設是適用的解決；(五) 證明這種假設是真實可靠的還是謬誤的 (參看胡適文存頁四五三—四六二)。這就是實驗室裏的思想方法。

第二：實驗主義的方法論，是具有『歷史的態度』的。所謂『歷史的態度』就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研究事理，觀察它的來源，考究它的演化。這就是達爾文物種由來的進化觀念的應用。

第三：實驗主義的方法，是去探索每個問題或觀念的實際上的效果，拿這效果來解釋每個觀念，若一個觀念是真的，在實際上有什麼好處呢？如果我們證明這一個觀念是真的，那一個觀念

是假的，試問在實際上對人有什麼差別呢？若探索不到什麼好處或差別，那麼所有的研究，所有的爭論，都等於廢語。所以實驗主義是很注意於實際的效果。（譯文章的人有把 Pragmatism 譯爲『實用主義』，就是這個原故。）

因爲實驗主義有這一個注意效果的特質，所以哲學到了實驗主義領袖杜威的手裏，就曉得把關於來生糾結的問題掉給宗教，把關於認識作用深奧的疑難掉給心理學，而自身則全力傾注於光照人類的目標，以及調協提高人類的生活（威爾都蘭古今大哲學家之生活與思想，楊譯本頁七八九）。

杜威說：『哲學如果不弄那些哲學家的問題了，如果變成對付人的問題的哲學方法了，那時候便是哲學光復的日子到了。』

實驗主義的方法雖是實驗室裏的方法，但實驗室裏所推求出來的律例，也不是絕對的，不是天經地義的，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牢固不拔的。這一點應要特別注意。科學的律例不過是一種最妥善的假設；等到發現了新的事實以致這個假設不能適用；或有更好的假設發現時，這個假設就不再成爲律例了。這就是學術的進化。

實驗主義的中心思想，不外是上面說的三點。其所以在中國占有勢力，也就是因爲這三點；

其影響中國學術思想界最大的，也就是這三點了。

實驗主義介紹到中國來，正是五四運動開始的時候。實驗主義同它現在的領袖——杜威——一齊到中國來的。在民國八年，五四的前三天，杜威親自跑到中國來了；他在中國住了兩年多，才回去美國。在這兩年多的期間，他到過十一省的地方；每到一處，他必演講和宣傳他的實驗主義。所以他在這兩年中所給予中國思想界的印象是很深的。並且當時剛剛是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的頭兩年，一班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如胡適博士等，都替杜威宣傳甚力；因為科學方法也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直到現在，青年和學者直接受實驗主義的影響，因而走上科學的路的，正是不能勝數。而今後受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影響的，必也不可限量。所以胡適博士在送杜威教授回國的時候，贊揚杜威說：

『……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我們還可以說，在最近的將來幾十年中，也未必有別個西洋學者在中國的影響可以比杜威先生還大的。』（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

胡威的說話完全不是武斷的，杜威先生在方法論上的影響確有這麼大。這十餘年來，國內知名的學者，幾乎都是直接或間接受杜威先生的影響。實驗主義是這十餘年來學術思潮的主流之一，所

以不對實驗主義的方法論有詳細認識的，可以說是不明白現代中國的學術思想了。

x

x

x

杜威教授來華，胡適博士的提倡，雖然都是和實驗主義的盛行有很大的關係，但中國時代的需求，卻是實驗主義盛行的主要原因。這點不可不注意。

x

x

x

與實驗主義有同樣大的影響的哲學方法是赫胥黎的存疑主義。存疑主義和實驗主義可以說是達爾文演化論的雙生兒。在中國思想界中，凡是相信存疑主義的大抵都是相信實驗主義的。這兩種主義在中國的影響最大。胡適博士也說：

『我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個是赫胥黎，一個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樣懷疑，教我不相信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樣思想，教我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教我把一切學說理想都看作待證的假設，教我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這兩個人使我明瞭科學方法的性質與功用。……』（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中國學者像胡氏這樣的，實在不少啊！

存疑主義 (Agnosticism) 的中心思想，就是『祇有那證據充分的知識，方才可以信仰，

沒有充分證據的，祇可存疑，不常信仰。」（胡適胡適文存二集卷二頁二三六）所以對諸一切假設的事實或論調，若果不能證明牠是真，但同時也不能證明它是假，就應存疑。換句話說，若要提出一種論調，惟一的方法就是拿出充分的證據來。所以存疑主義者的口號是：

『拿證據來！』

存疑主義和實驗主義並不是兩個不同的學說，它們實在是一件東西的兩面：它們都是科學的方法論，不過存疑主義是消極的破壞的方面，而實驗主義是積極的建設的方面。這兩方面的工作，都是中國所需要的。

x

x

x

哲學家到中國來的不單是杜威，羅素也來過中國講學。羅素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也不少。羅氏最大的影響，不是他在哲學上的主張，卻是他對中國文化的讚揚。（但他所以讚揚中國文化，也是基於他的哲學的。）在這十餘年來，學術界有許多關於東西文化問題的爭論（參看本文第八，第九，和第十一章）。凡是主張西洋文化的，多是赫胥黎和杜威的信徒；凡是主張東方文化的，必是受羅素的影響。所以杜氏來中國，把西方文化的寶貝——『賽恩斯』——送給我們；羅氏來中國，卻叫我們不要忘記我們自己文化的寶貝。他們的貢獻是相反的。

羅氏以爲我們不宜再走歐洲國家的前轍，我們不要再求發展一個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的國家，我們現在的責任是發揚我們舊時的善美的文化。他再三的說：

『中國人有較吾人高尚之處；苟在此處，以保存國家獨立之故，而降級至吾人之程度，則爲彼計，爲吾人計，皆非得策。』（羅素中國之問題頁二四一）

他更十分誠懇地對我們說：

『苟中國之改良家……開創一種較現今更良之經濟制度，則中國對世界可謂實行其適當之職務；而於吾人失望之時代，與人類以全新之希望。余欲以此新希望，喚起中國之新年；此希望非不能實現者。唯其能實現也，故中國當受愛人類者極高之推崇。』（同上頁二五二）

參考書

胡適實驗主義

胡適五十年來之世界哲學

羅素中國之問題

第五章 疑古思潮的澎湃

近十年來可以說疑古思潮盛行的時代。疑古思潮的目的在辨僞——辨僞書，辨僞事，辨僞史；疑古思潮的事業，起於民國九年；疑古思潮的代表作家，是錢玄同氏和顧頡剛氏；疑古思潮的主要作品，大都收入了顧氏編著的古史辨（第一冊至第四冊）。

疑古的思潮並不始於這一班人的，今文學者疑古的功勞也是不少。不過敢樹起疑古的旗幟，抱着『爲真理而求真理』的目的，我們就不能不推錢玄同氏（自民國十四年八月起，玄同先生便廢錢姓而以疑古玄同爲名）和顧頡剛氏。然追溯這種辨僞思潮的淵源，我們就曉得它是今文學派，文學革命，和實驗主義三大思潮所結合而產生的。

顧頡剛氏說：

『長素先生受了西洋歷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響，知道中國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戰國諸子和新代經師的作僞的原因，使人讀了不但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僞史的背景，就從僞史上去研究，實在比較以前的辨僞者深進了一層。』（顧氏著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頁七八）

「我的推翻古史的動機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啟發，到這時（民九）而更傾心於長素先生的卓識，但我對於今文家的態度總不能佩服。」（全上頁四三）

可見疑古思潮實在是受今文家的影響和啟發，但疑古的人物，對今文家不是爲學術而求學術的態度，是絕對反對的。所以疑古氏說：

「康氏的偽經考，本因變法而作；崔師則是一個純粹守法之經學老儒，篤信今文過於天帝。他們一個是利用孔子，一個是抱殘守缺，他們辨偽的動機和咱們是絕對不相同的。但他們考證底結果，我卻認爲精當者居多，此意至今未變。」（古史辨頁三十）

顧氏也說：

「我覺得他們拿辨偽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爲運用政策而非學問。」（古史辨第一冊自序頁四十三）

疑古派的學者，除了受康有爲氏的影響之外，受胡適博士的影響最深。胡氏的影響，並不在他民九，十一月給顧氏的一封四十八個字的短信底引發，而在他方法論上的影響。所以顧氏說：

「適之先生帶了西洋的史學方法回來，把傳說中的古代制度和小說中的故事舉了幾個演變的例，使人讀了不但要去辨偽，要去研究偽史的背景，而且要去尋出它的漸漸演變的線

索，就從演變的線索上去研究，這比了長素先生的方法又深了一層了。」（同上頁七十八）

『聽了適之先生的課，知道研究歷史的方法在於尋求一件事情的前後左右的關係，不把它看作突然出現的。……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許多散亂的材料，再用了這些零碎的科學方法實施於各種散亂的材料上，就歡喜分析，分類，比較，試驗，尋求因果，更敢於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據而發表新主張。』（同上頁九十五）

這一種科學的方法，正是實驗主義的方法。古史辨裏面有許多獨到的發明，可以說是完全是這種方法的應用。

除了這兩種思潮的影響外，文學革命所做的思想解放的工夫，對疑古思潮的影響自然是大。所以顧氏說：

『要是不遇見孟真和適之先生，不逢到新青年的思想革命的鼓吹，我的胸中積着的許多打破傳統學說的見解，也不敢大膽宣布。』（同上頁八十）

錢，顧二氏，生在這三種思潮盛行的時代，更受歷代學者辨偽文獻的影響（如唐之劉知幾，柳宗元；宋之司馬光，歐陽修，鄭樵，朱熹，葉適；明之宋濂，胡應麟；清之顧炎武，胡渭，毛奇齡，姚際恆，閻若璩，萬斯大，萬斯同，袁枚，崔述，……）自然能够標新立異，言前人之所

不敢言，創立疑古的學說。可見疑古思潮的澎湃，雖是錢顧二氏的努力，但時勢所激盪卻是主要的原因。顧氏說得好：

『這個討論何嘗是我的力量呢，原是在現在的時勢中所應有的產物。』（同上頁七九）

疑古思潮的鵠的是在辨偽，辨偽的工夫可分兩方面講：一方面是把前人辨偽的文獻加以整理，加以介紹；一方面是自己繼續前人的工作，把一切偽事偽書和偽史都揭破出來。疑古玄同氏與顧頡剛氏的辨偽工夫，正是從這兩方面着手。

關係第一方面的工作，最大的工作可算的蒐集古今辨偽的著作，編輯辨偽叢刊。最初僅限於辨『偽書』的著作（古史辨第一冊頁二一）；後來顧鏡二氏都主張把辨『偽事』的文獻也編入辨偽叢刊，並且將該刊分為兩編，『甲編』專集辨『偽事』的書籍，『乙編』專集辨『偽書』的文章（同上頁二三及頁二五）；但辨『偽事』的書，內中也帶辨『偽書』的甚多，而辨『偽書』的文字，同時辨『偽事』的亦不少，所以最後還是把這兩編打通了；不分辨『偽書』和辨『偽事』的界限。（同上頁三一）

辨偽叢刊的計劃雖是很偉大，但直到民國十八年冬間，才由北平景山書社刊行，預定每月最少出一種。現在出版的，有子略（宋高似孫著），四部正譌（明胡應麟著），古今偽書考（清姚

際恆著)……多種，都是由顧頡剛氏校點或編集的。

顧氏和疑古氏的最大貢獻，不在編輯辨偽叢刊，而在他們自己辨偽的工夫。他們辨偽的工夫，可分爲辨『偽史』，辨『偽經』，和辨『偽子』三方面。但三方面當中，以辨『偽子』的工作做得最少。這大約是前人對子書懷疑的膽量較大，所以對子書的發明已多，所以有許多地方，已用不着再費時力去研究。同時，他們正忙於辨『偽史』和辨『偽經』的工作，是以對子書的辨偽，便不免要忽略了。

在經學的辨偽上，他們最大的貢獻是辨明六經與孔子的關係。他們承認今文學派『六經不是周公的舊典』的理論。但他們更進一步，把今文家『六經皆是孔子的託古的作品』的觀念根本推翻。然則六經究竟是怎樣來呢？六經與孔子的關係究竟真相如何呢？疑古玄同氏有很詳細的說明。他的假定是：

『(1) 孔丘無刪述或制作「六經」之事。

(2) 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樂經」本無此書)。

(3) 把各不相干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爲「六經」的緣故，我以爲是這樣的：因爲論語有「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和「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兩節，於是生出「孔子以詩，

書，禮，樂教」(史記孔子世家)之說，又因此而造出「樂正崇四術，順先生者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禮記王制)之說。這一來，便把詩經，尚書，儀禮三部書配在一起了。因為「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邵懿辰禮經通論說)，故實雖三部，名則四部。又因為孟軻有「孔子作春秋」之說，於是又把春秋配上，惟何以配入易經，我現在還沒有明白。……

(4)「六經」底配成，當在戰國之末……

(5)自從「六經」之名成立，於是荀子儒效篇，商君書農戰篇，禮計經解，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記(甚多)，漢書藝文志，白虎通等，每一道及，總是六者並舉；而且還要瞎扯了什麼「五常」「五行」等等話頭來比附了！……」(古史辨第一冊頁七。)

「六經和孔丘，略如上文所云。那麼，六經究竟是些什麼性質的書呢？我以為——

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其中小部分是西周底詩，大部分是東周(孔丘以前)底詩。什麼人輯集的，當然無可考徵了。至於輯集的時代，我卻以為在孔丘以前，孔丘說，「詩三百」，「誦詩三百」，則他所見的已是編成的本子了。……

書。似乎是「三代」時候底「文件類編」或「檔案彙存」，應該認它為歷史。但我頗疑心

它並沒有成書……

禮。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偽書，這是毛奇齡，顧棟高，袁枚，崔述諸人已經證明的了。周禮是劉歆偽造的。兩戴記中，十分之九都是漢儒所作的。

樂。樂本無經……

易。我以為原始的易卦，是生殖器崇拜時代底東西；「乾」「坤」二卦即是兩性底生殖器底記號。初演爲八，再演爲六十四，大家拿它來做卜筮之用；於是有人做上許多卦辭，爻辭，這正和現在底「籤詩」一般……孔丘以後的儒者，借它來發揮他們的哲理（這也是「託古」），有做象傳的，有做彖傳的，……配成了所謂「十翼」。

春秋。王安石（有人說不是他）說它是「斷爛朝報」。梁啟超說它是「流水賬簿」，都是極確當的批語。孟軻因爲要借重孔丘，於是造出「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的話，就這部斷爛朝報，硬說它有「義」，硬說它是「天子之事」……

（同上頁七六至七八）

顧氏的假定，與疑古氏的相差不遠。他說：

「我以為孔子祇與詩經有關係。但也祇勸人學詩，並沒有自己刪詩。至於易，書，禮，春

秋，可以說是與他沒有關係；即使說有關係，也在「用」上，不在「作」上，例如看報不即爲主筆，聽戲不即爲伶人。」（同上頁五六）

孔子未曾制作或刪正六經，差不多可以說已是成了定論。最近幾年來作家承認這個假定的甚多，但疑古派最大的貢獻不在這一點，而在辨「僞史」的工作。所以顧頡剛氏所編著的辨僞文集，不用辨僞爲名，而獨注重辨僞史的單方面，叫它做古史辨，就是這個原故。辨僞史的工作，在這十年中，可以說是給顧氏占了第一個位置了。（疑古先生在這方面也不及顧氏）

顧氏對古史的中心思想是「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他的方法是根據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中的古史；他的假設是：古史是層累地造成的，發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統恰是一個反背。這個假設也可以分開兩點來說。第一：「時代愈後，傳說的古史期愈長」。所以在西周以至春秋初年的時候，當時的人以禹爲最古的人王；到了東周的末年，堯舜出現了，堯舜出現之後，禹使從人王的地位一降而爲普通的人，而堯舜就變成了兩個道德最高，功績最大的古王；到了戰國時代，秦國在堯舜的上頭加了黃帝，許行一輩人又在黃帝上頭添了神農；到了秦，李斯等又添上三皇；到了漢代以後，盤古氏也出現了。古史就是這樣堆積而成的：「時代越後，知道的古史越前；文籍越無徵，知道的古史越多」；第二：「時代愈後，傳說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

例如舜，在孔子時祇是一個『無爲而治』的賢君；到了戰國時，在堯典裏所表現的舜，已是一個『家齊而後國治』的聖人；到了孟子時，更成了一個孝子的模範了。（參看古史辨第一冊頁五九至六六）

古史經他這樣一辨，經他把偽書和真書中的偽史完全推翻，所謂五千年的中國歷史，祇餘下二千餘年。中國古史經過這次的大革命，可以說是另起一個新局面。在最近的將來，在地下發掘未能建設中國古史之前，中國自東周以上祇好說是無史。『現在所謂很燦爛的古史，所謂很有榮譽的四千年的歷史，自三皇以至夏商，整整齊齊的統系和年歲，精密的考來，都是偽書的結晶品』。（同上頁三五）

顧氏所用的方法，在上面已說過，是根據各時代的時勢來解釋各時代的傳說的古史。換句話說，就是追溯古史中一切偽事的來源和變化。顧氏嘗討論偽史的來源和變遷說：

『……其始不過一人倡之，要在這時辨來，自是很易，不幸十人和之，輾轉應用，不知其所自始，甚至愈放愈胖，說來更像，遂至信爲真史。現在要考那一個人是第一個說的，那許多人是學舌的，看他漸漸的遞變之跡。』（同上頁三六）

『我們看史蹟的整理還輕，而看傳說的經歷卻重。凡是一件史事，應看他最先是怎樣，以

後逐步的變遷是怎樣。」

可知他的根本方法，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是以研究民間文字的方法來辨僞史。胡適氏以爲他這種方法是顛撲不破的，是愈用愈見功效的。（努力週刊讀書雜誌第十八期）這種歷史的演進的方法，顧氏不單是用之於辨古史，對諸研究個人的傳記和其他史事，他都是用這一種方法。他的春秋時代的孔子和漢代的孔子（古史辨第二冊頁一三〇至一三九），便是一個例。在這篇文章他的結論是：

『春秋時的孔子是君子，戰國時的孔子是聖人，西漢時的孔子是教主，東漢後的孔子又成了聖人；到現在又快變成君子了。』（古史辨第一冊頁一三九）

用這個方法研究歷史，是常常有獨到之處的。

疑古玄同氏和顧頡剛氏的理論和方法，一提出來之後，便有人提出反對了。最先提出反對的是劉詠藜氏和胡董人氏等；但他們的反對，都是向疑古氏對六經的假定和顧氏對禹的假定來攻擊。假使劉胡二氏所說的都對，他們辨僞的工作，還不至於整個動搖。最近有幾篇文章向顧氏的根本地方——辨僞方法——上去攻擊，這卻使顧氏難於應付了。

第一篇是張蔭麟氏的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科學衛第四十期）。張氏除了向顧氏對禹和

堯舜的假定作批評外，並且指出顧氏根本方法的謬誤，他說：

『凡欲證明某時代無某某歷史觀念，貴能指出其時代中有與此歷史觀念相反之證據。若因某書或今存某時代之書無某史事之稱述，遂斷定某時代無此觀念，此種方法謂之「默證」Argument from silence。默證之應用及其適用之限度，西方史家早有定論。吾觀顧氏之論證法，幾盡用默證，而什九皆違反其適用之限度。……』（張蔭麟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

第二篇是梁園東氏的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七卷第二十二及二十四號。）梁氏這篇

文章，向顧氏的方法作根本批評，可以說是顧氏辨偽史工作中最厲害的批評。梁氏頭一點批評顧氏的，是說他根本沒有方法，沒有史學方法。他說：

『……司馬遷整理古史的方法，是以「雅馴」做標準，其言雅者始著錄，否則不取，這種方法以現在看，無論誰都可知道不是研究歷史的方法……崔述「考信」的根據，不要細講，人都明白他完全是根據漢學家所認定可靠可信非出於偽造的「古經」……首先，我們要想明白顧先生是和司馬遷崔東壁走了同一法門……所謂顧先生仍走了司馬遷崔述的路，是說原先司馬遷崔述整理上古史，沒有方法判別真史偽史，纔不得不「請教古人」。司馬遷請的

是「薦紳先生」或「儒者所傳」，崔東壁請的是「真古經」，顧先生呢？仍然也是請的「古人」，不過比司馬遷多分別了一個「真古人」「僞古人」，比崔東壁多擴大了一點，不一定是「真古經」，是所有的「真古書」罷了！……判定「古史」的真僞，祇是依賴古書的真僞，這就算是「史學方法」麼？……顧先生整理古史也和司馬遷崔東壁一樣，「沒方法」！……」

（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

梁氏更進一步對顧氏所用的基本方法——「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觀察歷史上的傳說」——和顧氏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假設批評。梁氏就普通歷史的現象來證明顧氏的幾個重要假設是不能成立的，繼而斷定顧氏「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的觀念將成為顧氏從此不能再整理古史下去的原因，非去掉不可。（原文太長，不能引了。）他並且說用研究民間故事的方法來研究歷史是錯誤的：「……顧先生大概因為研究歌謠太多了，把歷史都當成歌謠或民間故事看！歌謠自然沒有什麼依據，祇好從他演痕變跡上以捉摸真象，但歷史那裏是這種樣子！古史固多傳說，但對於人類必有經歷的傳說，那能和受時代反映出來的歌謠故事等量齊觀！無怪乎顧君要以上古史是可以由人隨便「層累地」造的了，原來祇是造一隻故事，即跳的飛的怎麼不可以呢？」（同上）

學問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學說的信仰是不應該隨便的。疑古思潮的可以信仰和跟隨與否，完全是一個人自己的問題。但無論你是信還是不信，你都應該先有一種存疑的態度。顧氏在他的古史辨第一冊自序裏說得好：

『我不願意在一種學問草創的時候收得許多盲從的信徒，我祇願意因了這書的出版而得到許多忠實於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進展的諍友。』（自序頁一〇三）

參考書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一冊（民國十五年六月樸社出版）

顧頡剛編著古史辨第二冊（民國十九年九月樸社出版）

第六章 國故整理與其批評

文學革命運動之後，一般文學革命的領袖人物，不是努力於創作和翻譯新文學，就是回頭向所謂「國學」方面去努力。胡適博士也拿起從杜威學回來的實驗主義，向所謂「國故」裏實驗——整理——了。於是所謂整理國故運動就這樣興起來。同時梁啟超氏等（如研究系的一班人）和許多國文教師和許多學者，都捨棄了其他的事業而鑽到舊紙堆裏，子曰詩云的大業好像有點中興。這種事業的結果也應計算一下了。

在這十餘年來，在國故整理上有最大的貢獻的，仍要推梁啟超氏。梁氏第二次專心於著述上是始於民國八年，在他遊歐回來之後。他的著述，題材雖是沒有超出他在新民報時所討論的，但他的成就是十分值得敬仰的。梁氏在史學方面的貢獻更大。他在這十多年內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商務），中國歷史研究法續編（商務），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務），清代學術概論（商務），大乘起信論考證，墨經校釋（商務），墨子學案（商務），……都是不可多得的大作。在這許多作品中，他在史學方法的貢獻最大。啟超先生實在抱有一個改造中國歷史的雄心，可是他沒有用

他畢生的心力，完全集中於這方面，遂至他的中國學術史也僅成了一小部分便死去了！若果他能夠集中他的心力在史學方法，他的貢獻必更偉大。

他討論史的改造道：

『……舊史中無論何體何家，總不離貴族性，其讀者皆限於少數特別階級——或官閥階級，或智識階級。故其效果，亦一如其所期助成國民性之畸形的發達，此二千年史家所不能逃罪也。此類之史，在前代或爲其所甚需要。非此無以保社會之結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潰滅。雖然，此種需要，在今日早已過去，而保存之則惟增其毒。在今日惟個性圓滿發達之民，自進而爲種族上地域上職業上之團結互助，夫然後可以生存於世界而求有所貢獻。而歷史其物，即以養成人類此種性習爲職志。』（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五一頁）

『……以生人本位的歷史代死人本位的歷史，實史界改造一要義也。』（同上頁五二）

『……今後史家，一面宜將其舊領土一一劃歸各科學之專門，使爲自治的發展，勿侵其權限，一面則以總神經系——總政府自居，凡各活動之相，悉攝取而論列之。』（同上五五頁）

『吾儕今日所渴求者，在得「近於客觀性質的歷史。」（同上五五頁）

「吾儕今日對於此等史蹟，殆有一大部分須爲之重新估價。……以上兩種勞作，一曰蒐補的勞作，二曰考證的勞作，皆可謂極不經濟的——勞多而穫少的。……吾國史苟不經過此一番爬剔洗鍊，則完善之作，終不可期。……」（同上頁六。）

「……善爲史者之馭事實也：橫的方面最注意於其背景與其交光……縱的方面最注意於其來因與其去果……」（同上頁六二。）

如果一個人能夠依着啟超先生所定的六個原則來改造中國歷史，自然能夠在史學界上創一個新局面。梁氏更舉出鑑別古書很精確的十二條公例：

- 『一 其書前代從未著錄或絕無人徵引而忽然出現者，什有九皆僞。……』
- 二 其書雖前代有著錄，然久經散佚，乃忽有一異本突出，篇數及內容等與舊本完全不
同者，什有九皆僞。……』
- 三 其書不問有無舊本，但今本來歷不明者，即不可輕信。……』
- 四 其書流傳之緒，從他方面可以考見，而因以證明今本題某人舊撰爲不確者。……』
- 五 真書原本，經前人稱引，確有左證，而今本與之歧異者，則今本必僞。……』
- 六 其書題某人撰，而書中所載事蹟在本人後者，則其書或全僞或一部分僞。……』

七 其書雖真，然一部分經後人竄亂之蹟既確鑿有據，則對於其書之全體須慎加鑑別。

……

八 書中所言確與事實相反者，則其書必僞。……

九 兩書同載一事絕對矛盾者，則必有一僞或兩俱僞。……

十 各時代之文體，蓋有天然界畫，多讀書者自能知之。故後人僞作之書，有不必從字句求枝葉之反證，但一望文體即能斷其僞者。……

十一 各時代之社會狀態，吾儕據各方面之資料，總可以推見岸略。若某書中所言其時代之狀態，與情理相去懸絕者，即可斷為僞。……

十二 各時代之思想，其進化階段，自有一定。若某書中所表現之思想與其時代不相銜接者，即可斷為僞。……』（同上頁一五三至一五八）

啟超先生在這裏給予我們如此宏富，毋怪乎胡樸安氏要說這本書『為中國史學界開一新天地』

（胡樸安最近四年中國思想界之傾向與今後革新之機運）了！

x

x

x

自新文化運動以來，應用新方法來治理國故，最先而又最有成績的，是胡適博士了。胡氏著

作也不少，所著的有胡適文存三集（亞東），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商務），英文本的先秦名學史（亞東），白話文學史（新月），嘗試集（亞東），神會和尚遺集（亞東）……但在整理國故上，他最大的貢獻可算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和收在他的文存第一集的墨子小取篇新詁。

讓我們看胡氏怎樣批評他自己的哲學史能，他說：

「……但我自信，中國治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事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事。這一部書的功用能使中國哲學史變色。以後無論國內國外研究這一門學問的人都躲不了這一部書的影響。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胡適文存三集頁二一

二）

看了這幾行字，我們就可以曉得它的價值，因為它是用一種新方法和新態度去治國故的急先鋒呢！

除了它的方法外，它最大的貢獻在甚麼地方呢？它最好的地方是在墨學。長於治墨的啟超先生看了，也「除了讚歎之外，幾乎沒有別的說」（梁啟超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久已不爲人注意的墨學，經過畢（沅）孫（詒讓）的整理，再加上梁（啟超）胡（適）的發明，便昌明興盛起來了。（十餘年來中國子學上的最大貢獻，亦不過如此。）

中國古代知識論，最精密的文獻是墨子內的經上下，經說上下，和大取，小取六篇。而胡氏站在實驗主義的立場，從知識論上研究中國哲學史；那麼胡氏對墨學——尤其是『墨辯』的貢獻，自然是意料中事。

胡氏解釋『墨辯』的知識論，分析『知』的三個分子（材，接，明），『知』的三種（聞，說，親），『辯』的兩大觀念（故，法），『辯』的七種法子（或，假，效，辟，侔，援，推）……（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第八篇）都有獨到的地方。他的墨子小取篇新註，發明墨學的地方不少；他把小取篇分成九節，在這九節中找出一條系統，實在是一種成功的分析。他的分法是：

第一節，總論辯。

第二節，論辯之七法。

第三節，論辟，侔，援，推，諸法之謬誤。

第四節，論立辭之難，總起下文。

第五節，釋『物或是而然』。

第六節，釋『乃是而不然』。

第七節，釋『或不是而然』。

第八節，釋「一周而一周」。

第九節，釋「或一是而一非」。

胡氏在這一方面的特長是不容否認的。

x

x

x

自從古學的大師漸漸的過去了，同時新文化運動又在國內佔了優勢，所謂「國學」似乎是遇到了厄運，許多老人家都憂慮它的淪亡，但經梁胡諸氏的整理工夫，它似乎又要高高的擡起頭來了。這一種究竟是好現象還是壞現象呢？

在二十多年前便立意不看中國書的吳稚暉氏，對這種國故整理的運動，就頭一個提出反對了。他說：

「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鴉片相依爲命，小老婆吸鴉片，又同升官發財相依爲命。國學大盛，政治無不腐敗。因爲孔孟老墨是春秋戰國亂世產物。非再把他丟在毛廁裏三十年，現今鼓吹成一個乾燥無味的物質文明，人家用機關槍打來，我也用機關槍對打，把中國站住了，再整理什麼國故，毫不嫌遲。（吳稚暉《鐵洋八股之理學）

吳氏把國故看成一種古董，古董是應該保全的，不過祇係幾個古董高等學者的事，若引導青年

去鑽入這古董堆了，確是一種罪過。吳氏對於強迫青年去念甚麼漢書藝文志，甚麼四書五經……是極力反對的。他以為這是等於把青年堆在灰字籠裏。所以他對章炳麟氏的徒子徒孫，當然是不屑批評；就是帶着新頭腦的梁啟超氏，也是極力反對的。所以他大聲疾呼道：

「……在三十年內姑且儘着梁先生等幾個少數學者抱殘守缺，已經足夠，不必立什麼文學院，貽害多數青年；更不必叫出洋學生帶了許多線裝書出去，成一個廢物而歸。充其量都成了胡適之胡先驥諸位先生，也不過做一個洋八股的創造人而已。」（同上）

近年來一班有新思想的文學家，都有反對國學的趨向。前幾年何炳松氏寫了一篇論所謂『國學』（見小說月刊第二十卷第一號），鄭振鐸氏也寫了一篇且慢談所謂『國學』（同上）的提出打倒烏煙瘴氣的『國學』的口號。其他反對國故整理運動的文章也日多一日。就是從事於國故整理的胡適博士，也覺得這種整理國故的事業不是有益於青年的，所以他說：

「現在一班少年人跟着我們向故紙堆去亂鑽，這是最可悲歎的現狀。我們希望他們及早回頭，多學一點自然科學的知識與技術；那條路是活路，這條故紙的路是死路。三百年的第一流的聰明才智消磨在這故紙堆裏，還沒有什麼好成績，我們應該換條路走走了。等你們在科學試驗室裏有了好成績，然後拿出你們的餘力，回來整理我們的國故，那時候，一拳

打倒顧亭林，兩腳踢翻錢竹汀，有何難哉！」（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

近人對國故的意見改變，實在是思想上的「大蛻變」。所以今後我們不希望再多產生古董學者；關於這些古董，我們可以讓那少數的梁啟超的同志玩弄，關於那「爛紙堆」的老鬼，也祇好讓胡適一班人去捉個痛快（參看胡適整理國故與打鬼）。至於我們青年，對國家的責任很大；在最近的時候，對這些古董，最好是抱着一個「敬而遠之」的態度啊。

至於那些整理國故的學者，我還是希望他們多做些建設的工夫。王國維先生在建設方面做了十分多工作，在今日談整理國故的，除了一二人外，都遠遠不及他所成就的偉大。可惜他在數年前跳下昆明池死了；他死之後，在許多國故整理家中，竟沒有一個人能夠繼續他建設的工作。所以把這十餘年的國故整理事業算一算，學者的建樹不多。今後我們若仍要整理國故，我們應繼着王氏的精神，多做些建設的工夫。

參考書

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民十一商務出版）

胡適胡適文存（民十亞東出版）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民八商務出版）

第七章 唯物的辯證法

近代有兩個重要的思想方法，就是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論。實驗主義已由杜威胡適諸氏介紹到中國思想界來，現在已經開花結果了。至於辯證法的唯物論呢，它雖經陳獨秀氏等的一度提倡，但直到了現近的幾年，方才大為興盛。

要討論辯證法的唯物論，最好先解釋甚麼是辯證法。『辯證法』在英文是Dialectic Method，意思是辯論的方法。在辯論的開始，必有正反兩方面。各方面提出理由證實自己的命題，並且提出理由來攻擊對方的命題。辯論終結的時候，兩方面的命題的弱點都呈顯出來，兩方面的命題都需要修改；於是兩個命題都不能夠依舊地存在，結果這兩個命題綜合起來，就產生一個新命題。辯證法的開山祖黑格兒，就從這辯論底程序中，體察出辯證法的道理來。他以為一切思想和事物的狀態，都和辯論一樣，具有一種對立或矛盾的關係；因為是在矛盾和對立的狀態，所以就不斷地互相反抗，互相衝突；反抗和衝突之後，就綜合起來，成了合理的新的現象。世界的事物無時不是這樣對立着，反抗着，綜合着，變化着。這種變化是向前的；所以世界是不停地進展

着。人類的歷史就是永遠這樣變動和前進，將沒有什麼止境的。這一種由對立的關係，而互鬥而變化和進展的程序，黑格兒叫它做辯證法。

黑氏是一個唯心論者；唯心論者相信思維規定存在，相信精神支配物質，所以他的辯證法，是主張一切事物底對立，互鬥，進展的過程，完全是起於精神底對立，互鬥，進展的變動的。到了黑氏的後繼者，就分開了左右兩派。左派的代表要算是費愛巴哈（Feuerbach）了。費氏和黑氏的主張便不相同；費氏是唯物論者，他說：

『思維（Denken）和存在（Sein）的真正關係是：「存在是主語，思維是客語」。思維是從存在來，而存在不是從思維來的；存在是從自己來的，靠自己而存在，它的理由，就是存在自己。』（費愛巴哈哲學改革論）

馬克斯氏取了費氏這種唯物觀，加上了黑氏的辯證法，就成功了他底唯物的辯證法了。所以辯證法的唯物論就以物質底對立，互鬥，進展的程序做宇宙的根本；至於精神呢，就完全是受物質的影響的。所以馬氏說：

『各種含有特性的感覺，幻想，思維方法，生活觀等上層建築，統統造在財產權的形式上，即社會的生存條件上。』

辯證法的唯物論，也和實驗主義一樣，是科學的方法。河上肇氏說：

『……唯物史觀是科學的觀察人類社會的現象。所謂科學的，其意義尙不充足，實是自然科學的觀察人類社會的現象。』（河上肇經濟學研究第十三章）

辯證法唯物論也是歷史的方法，但在這一點它就與實驗主義大大不同了。實驗主義是用歷史演進的見解來研究事理；辯證法唯物論是用唯物史觀的見解來研究事理；二者是不相同的。所謂唯物史觀，可以用馬克斯氏的共產黨宣言的第一句來表示它的意思。這句話是：

『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爭鬥歷史。』

換句話說，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都是依着對立，互鬥，進展的程序的。

x

x

x

介紹辯證法的唯物論於中國學術思想界，而又肯做它的忠實信仰者，要算陳獨秀氏是第一人了。然而，陳氏一方面提倡辯證法的唯物論，一方面又參加其他工作，所以他的影響不大。（遠不及胡適氏對實驗主義的提倡。）

陳氏提倡辯證法的唯物論，是處處受人攻擊的。胡適氏就是持反對論最有力的一人。（許多人攻擊辯證法的唯物論，完全是站在政治的立場，有些更沒有認清楚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甚麼，便

瞎去談辯證法，這都是錯誤的。辯證法的唯物論是一種思想的方法，其本身完全和政治沒有關係的。唯物辯證法的本身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但因為政治的原故來反對它便大失學術的宗旨了。這裏所舉的反對論者，單提胡適博士，就是因為他純然站在學術立場來說話，所以較有價值。在人生觀論戰的論文集——科學與人生觀的「序言」中，陳胡兩氏就有一個實驗主義與辯證法唯物論的論戰。陳氏在他的序言的結論裏說：

「我們相信祇有客觀的物質原因可以變動社會，可以解釋歷史，可以支配人生觀，這便是「唯物的歷史觀」。我們現在要請問丁在君先生和胡適先生：相信「唯物的歷史觀」為完全真現呢，還是相信唯物以外像張君勱等類人所主張的唯心觀也能夠超科學而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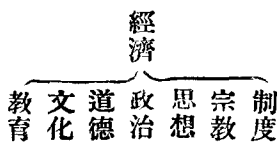
（陳獨秀科學與人生觀序）

胡氏就寫了一篇答陳獨秀先生來說他的主張，他說：

「……獨秀說的是一種「歷史觀」，而我們討論的是「人生觀」。人生觀是一個人對於宇宙萬物和人類的見解；歷史觀是「解釋歷史」的一種見解，是一個人對於歷史的見解，歷史觀祇是人生觀的一部分。……我個人至今還祇能說，「唯物（經濟）史觀至多祇能解釋大部分的問題」。……」（胡適文存二集卷二頁四四）

陳氏也寫了一篇答適之，篇中一方面駁胡氏的意思，一方面對唯物史觀有很詳細的說明。關於辯駁的一部分我們不必引述了；至於他對唯物史觀的說明，特引在下面，使我們對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有較深切的認識。他說：

「社會是人組織的，歷史是社會現象之記錄，「唯物的歷史觀」是我們的根本思想，名爲歷史觀，其實不限於歷史，並應用於人生觀及社會觀。……第一，唯物史觀所謂客觀的物質原因，是指物質的本因而言，由物而發生之心的現象，當然不包括在內。世界上無論如何徹底的唯物論者，斷不能不承認有心的現象即精神現象這種事實……唯物史觀的哲學者也並不是不重視思想文化宗教道德教育等心的現象之存在，惟祇承認他們都是經濟的基礎上面之建築物，而非基礎之本身；這是因爲唯物史觀的哲學者，是主張如左表：



之一元論，而非如左表：

經濟

宗教

思想

政治

道德

文化

教育

之多元論。……』(陳獨秀答適之)

但辯證法的唯物論要直到最近幾年來才有進步，這幾年來書店所出版關於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書籍，居然日多一日；可惜這些書籍，十九都是翻譯，創作幾乎沒有。不過從此也可以看出辯證法唯物論的影響，到今天已是很大了。

胡適氏等實驗主義的信徒還是始終反對辯證法的唯物論。他在去年冬間介紹他自己的思想時說：

『從前陳獨秀先生曾說實驗主義和辯證法的唯物史觀是近代兩個最重要的思想方法，他希望這兩種方法合作一條聯合戰線。這個希望是錯誤的。辯證法出於海格爾的哲學，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前的玄學方法。實驗主義是生物進化論出世以後的科學方法。這兩種方法所以根本不相容，祇是因爲中間隔了一層達爾文主義。達爾文的生物演化學說給了我們一個大教訓：就是教我們明瞭生物進化，無論是自然的演變，或是人爲的選擇，都由於一點一滴的變異，所以是一種很複雜的現象，決沒有一個簡單的目的地可以一步跳到，更不會有一步跳到之後可以一成不變。辯證法的哲學本來也是生物學發達以前的一種進化理論，依他本身的理論，這個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階段應該永遠不斷的呈現。但狹義的共產主義者卻似乎忘了這個原則，所以武斷的虛懸一個共產共有的理想境界，以爲可以用階級鬥爭的方法一蹴即到，既到之後又可以一階級專政方法把持不變。這樣的化複雜爲簡單，這樣的根本否定演變的繼續，便是十足的達爾文以前的武斷思想，比那頑固的海格爾更頑固了。』（胡適介紹我自己的思想）

胡氏的意思，有一半是正確，有一半是錯誤。辯證法的唯心論沒有錯是玄學方法，但唯物辯證法是生物進化論成立以後的科學方法，這是不能否認的事。胡氏不贊成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可以的，

若因此便說它不是科學方法便屬於謬誤。

x

x

x

實驗主義的引進，在中國學術思想上已開花結果（此後還要繼續地開花結果的）；整理古史，整理國故，就是它最明顯的果實。但辯證法的唯物論者，在中國學術上有過甚麼大的貢獻呢？其貢獻也是在史學——社會史——方面，我們可以舉郭沫若氏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為代表。它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第一本成功作品。

古史辨的貢獻是在破壞偽古史，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目的在建設真古史；它們在現在所得的結論，雖然都不必是定論，但它們已為後來研究古史的人打開一條大路了。

x

x

x

自從郭氏的大著出版之後，唯物辯證論者的系統著述已一天比一天多。但他們的著述，都集中於中國經濟性質的探討和對實驗主義者的批評。關於第一點，我們在下文『社會史之論戰』一章裏再行詳述；在這裏，我們祇把辯證法唯物論者對實驗主義者的攻擊，作簡略的敘述。

因為胡適氏是實驗主義的倡導者，所以批評實驗主義的人，如李季氏（著有胡適哲學史批判）和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等書——葉青氏（著有胡適批判——見二十世紀第一卷），彭述之氏，胡秋原

氏等，都向胡適氏及他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大綱批評。

站在辯證法唯物論的立場來反對實驗主義的人，對實驗主義攻擊最重要的理論是說實驗主義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哲學方法。例如彭述之氏說：

「實驗主義就其全部精神看來，正是美國資產階級精神的反映，此種精神的主要點就是專重「實際的效果」，即「實際的利益」，若要更通俗化起來，就是專注重於\$（金元），這就是「真理」……換言之，實驗主義就是美國資產階級「拜金主義」的抽象化。這是現代資本主義時代的「法利賽主義」。」（彭述之評胡適之的實驗主義與改良主義——見體書雜誌卷二期）

李季氏更帶着謾罵的口氣說道：

「實驗主義固然是一種方法，但同時也是一種哲學。如果客氣一點說，我們可以和塔爾海瑪一樣，稱之為一種「商業哲學」(Philosophie des Handelns，如果不客氣的話，簡直可稱之為一種「市儈哲學」)。……不獨因牠是美國資產階級企業精神——即唯利是視，即效用或效果為真理唯一的標準——的充分表現，取得這個尊號，毫無愧色，而牠對於一切問題的態度，無不顯出這種面目。」（李季氏辯證法還是實驗主義序言）

攻擊實驗主義的第二個論點是說實驗主義是反科學的。彭述之氏等用（一）「實驗主義是狡滑的多元的唯心論」（二）「實驗主義根本否認客觀的真理」兩個理由推論牠是反科學的。他們並且說：

「實驗主義，從哲學的觀點上看來，是一種變相的中世紀式的「煩瑣哲學」，從經濟的政治的觀點上看來，是一種「法利賽」式的「實利主義」與美國式的「改良主義」。這個學派，在表面上帶着民主主義和似是而非的激進的科學的面具，然而實際上却是十分保守的，專斷的，反動的，違反科學精神的。」（彭述之評胡適之的實驗主義與改良主義）

還有一點他們極力攻擊的，就是實驗主義所主張的「一點一滴的演變」——改良主義。彭述之氏說：

「可見實驗主義者此種混淆「演進與革命」的區分，其用意不外是企圖根本否認「革命」，而證明祇有「演進」即祇有「改良」，這對於已經統治全社會的資產階級，特別是已經差不多統治全世界的美國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當然是十分有利益的。」（同上）

同時雷仲堅氏也說：

「他與他國的改良主義者一樣，都假借達爾文主義的旗幟，來作他們反對社會主義的護

符。』(雷仲堅辯證法及進化論在歷史上及理論上之比較的研究——新社會卷一期二)

他們認定胡適博士和其他實驗主義改良論者，根本不明白達爾文主義：

『達爾文進化論並不是完全如博士所說的「一點一滴的變異」，胡博士這樣斷章取義地來歪曲達爾文主義，閹割達爾文主義，已經太苦了，然而霹靂一聲，德·佛里斯的突變論出，什麼人也知道那「一點一滴的」準化以外還有突然變異，而自然歷史上的一切事實，無不證明那可惡的辯證法哲學之真實，胡先生假造的根據，捏造的護符，已經瞞不着真理先生的檢查，祇得撲通倒地了，這才要叫博士叫苦連天哩。』(胡秋原曾國的哲學——見讀書雜誌第一卷)

王禮錫氏更認胡氏否認突變，否認革命使他的實驗主義沒有方法成爲一種「科學的方法」。他說：『他絕不了解貧與富，疾病與健康等等之對立。他絕不了解美國地下工人和煤油大王之間的生活的懸隔。他絕不了解在這些世界中帝國主義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怎樣在發展他們的矛盾，在帝國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怎樣在發展他們的矛盾。他絕不了解也絕不願了解這些矛盾將怎樣用突變——革命的方式去解決！所以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非科學的；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論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他祇能引導假的思想入於迷途。』(王

X

X

X

此外，實驗主義者胡適氏在介紹他自己的思想時對辯證法的批評，也是唯物辯證論者所攻擊的中心。在各種反攻的論文中，胡秋原氏貧困的哲學內「胡適之批評辯證法的批評」一節，最為厲害。胡秋原氏一方面說明黑格爾之絕對唯心論有無限豐富之正確部分，他說：

「無論如何，黑格爾哲學中沒有一點折衷主義的原子，這是毫無可疑的功績。」

同時，他說明黑氏辯證法之真意義，和胡適氏所說的不同：他以為黑氏辯證法不祇是一種新形式論，不祇是「正—反—合」的三公式（Triade）。另一方面，他說明唯物辯證法並不是原樣的黑格爾的辯證法，而唯物辯證法絕不和生物進化論發生衝突。他說：

「達爾文主義與馬克斯主義是十九世紀的兩大發見，這兩種學說不僅不相衝突，而且是必須結合起來（再加上哥白尼的太陽系統說），才能構成一個整個的科學宇宙觀的。不待言，每個唯物史觀者都對於達爾文抱着無限的敬意……恩格斯在馬克斯墓碑的演說中實在最簡潔地說出這兩大思想家的意義了；「達爾文發見了生物界發達之法則，同樣，馬克斯發現人類社會上發展的法則了。」……」

胡適氏雖然對這些反攻仍抱着沈默的態度，但辯證論者已認為戰端已發了。一方面他們承認胡氏介紹自己的思想的言論，是『向辯證法宣戰』（讀書雜誌期六胡秋原貧困的哲學五七）一方面他們更認向實驗主義評擊，不獨是他們的權利，也就是他們的義務。（讀書雜誌卷二期六李季的『序言』頁一）

五）這一場論戰的來臨，恐怕是不能避免了！而讀書雜誌的編者，更顯明地在牠的第二卷第一號提出『哲學論戰』這四個字了。

參考書籍

科學與人生觀（泰東出版）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現代出版）

李季胡適中國哲學史批判（神州國光社出版）

讀書雜誌（神州國光社出版）

二十世紀（辛壘出版）

下

篇

第八章 引言

正如辯證法所指示給我們的，歷史的進化——尤其是思想的蛻變——是由於互相矛盾——互相衝突，互相反抗，而綜合進展的。新文化運動的過程，給予我們一個實例。每逢一個新的思潮的擡頭，必先與舊的思想相衝突，形成各種學術上的論戰。在這短短的十餘年中，中國思想界已有過六個重要的論戰。這六大論戰，雖未盡是劃分時代的論戰，但都在中國學術思想的變程中，佔有歷史的重要性的。這六大論戰是：（一）文體的論戰；（二）人生觀的論戰；（三）文化問題的討論；（四）文藝的論戰；（五）政治問題的討論；和（六）社會史的論戰。此外，還有一個剛剛開始的論戰，就是第七章最後一節裏所說的『哲學的論戰』。

文體的論戰，是『新青年』派和林琴南，章士釗之流的駁辯，其主要的爭論是語體和文言，其歷史上的意義是文學革命的成功，『德謨克拉西』在中國思想界的擡頭。

人生觀的論戰，對壘者是唯心論者和唯物論者，其主要的爭論是科學能否解決人生的問題，其歷史上的意義是實驗主義的擡頭，『賽恩斯』先生的紹介成功。

文化問題的討論，是胡適和其他西方文化論者與梁漱溟等的論辯，其主要的爭點是中國究竟應否拋開了自己根本的精神而迷信西洋文化的『德』，『賽』兩先生，其歷史上的意義是唯心論者的重新擡頭，東方文化論者得到了一個新的立場。

文藝的論戰雖然祇是個人本位主義文學家和社會本位主義文學家的互相攻擊，但它實代表了辯證法的唯物論的擡頭，和社會本位主義的勝利。

政治問題的討論，是正在爭論着的筆戰。今日中國應走那一條路以自救？甚麼是中國的出路？這些問題，亟待一個解答。所以在最近的幾年內，胡適等西洋文化論者提出個人本位的民主政治，以爲這是中國問題的解答。而梁漱溟等則認民族自救的唯一途徑在本着我們東方文化的優點，以改造我們的文化。

社會史的論戰是唯物辯證論者的論戰，它的爭點是今日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還是封建社會，它代表了主張國民革命者和主張無產階級革命者的筆戰。

這幾個論戰的研究，可以使我們對中國最近學術思想的蛻變，有較深切的認識。但文體的論戰，已在本書第三章裏有詳細的紀述，而剛剛開始的哲學的論戰，在第七章裏也已提及，都不必重述了。

第九章 人生觀的論戰

唯心唯物底爭辯，自二三十年前哲學思想開始發達的時候，直到今天，都是在哲學思想上，佔極重要的地位的。近代西洋思想上的兩大思潮：柏格森的直覺主義和杜威的實驗主義，就代表了唯心唯物的兩大派別。而我國漢學和理學的爭辯，也就是唯物唯心的論戰的一部分吧。在震動一時的人生觀的論戰裏，張君勱氏就是站在柏氏的立場了。而他的對方，就是拿出實驗主義的論調來做軍器的丁在君氏。

民國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張君勱氏在清華大學演講，題目是人生觀；同年四月十二日，丁在君氏寫了一篇玄學與科學來駁張氏，於是所謂『人生觀的論戰』就開始了。當時有名的學者，加入這場舌戰的甚多。

張氏的人生觀的中心思想是：科學有一定的法則而人生則無是非真偽的標準，所以科學不能解決人生。他舉出科學與人生觀不同的五點：

『第一，科學爲客觀的，人生觀爲主觀的。……』

第二，科學爲論理學爲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觀則起於直覺。……

第三，科學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觀則爲綜合的。……

第四，科學爲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觀則爲自由意志的。……

第五，科學起於對象之相同現象，而人生觀起於人格之單一性。……」（譚君勳人生觀 從這

五點他就推得他的結論說：

「……故科學無論如何發達，而人生觀問題之解決，決非科學所能爲力，惟賴諸人類之自身而已。……」（同上）

地質學家的丁氏看了，自然不能滿意，於是他的玄學與科學就在努力週報上發表，這場筆戰就正式開火了。

丁氏的玄學與科學，除了謾罵的言辭和枝葉的論點外，有力的駁語不多。但也有幾點頗能與張氏的言論針鋒相對。例如他駁他「人生無是非真僞之標準」的幾句話，甚有理由。他說：

「……人生觀現在沒有統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統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實理由來證明他是永遠不能統一的，我們總有求他統一的義務。何況現在「無是非真僞之標準」，安自得就是無是非真僞之可求？不求是非真僞，又從那裏來的標準？要求是非真僞，除去

科學方法，還有甚麼方法？」（丁在君玄學與科學）

丁氏攻擊張氏所提出的人生觀與科學的五異點，也很有力。他說：

「……他說人生觀不爲論理學方法所支配；科學回答他，凡不可以用論理學批評研究的，不是真知識。他說「純粹之心理現象」在因果律之例外；科學回答他，科學的材料原都是心理的現象，若是你所說的現象是真的，決逃不出科學的範圍。他再三的注重個性，注重直覺，但是他把個性直覺放逐於論理方法定義之外。科學未嘗不注重個性直覺，但是科學所承認的個性直覺，是「根據於經驗的指示，從活經驗裏湧出來的。」（參觀胡適「五十年世界之哲學」）他說人生觀是綜合的，……科學答他說，我們不承認有這樣混沌未開的東西，況且你自己講我與非我，列了九條，就是在那裏分析他。……」（同上）

丁氏更從心理學智識論的立場來證明人生觀與科學是分不開的。一個人的思想不論複雜到如何田地，總不外乎覺官的感觸和腦經的聯想，這都是受科學法則所支配的；所以凡是心理的內容，真的概念推論，都是科學的材料。因之，「科學不能夠解決人生」的一句話，便廢推倒了。丁氏站在唯覺主義的立場來說話，未嘗沒有片面的道理。

張氏又寫了一篇再論人生觀與科學並答丁在君來反辯。在這篇文章裏，他再用理由來詳述他

的中心思想——『科學有一定的法則而人生則無是非真偽的標準的』。但他的理由總逃不出他原來的意思——『凡爲科學方法所支配者，必其爲固定之狀態。純粹心理，頃刻萬變，故非科學方法所能支配。』他說：

『人類好於一切現象求其因果之相生，於是有知識，有科學。然欲以因果律概括一切，則於人生現象中，如懺悔，如愛，如責任心，犧牲精神之屬於道德方面者，無法以解釋之。

（張君勸人生觀之論戰）

同時他極力向丁氏的唯覺論攻擊，並且再三說明心理學不過是精神科學，完全沒有固定狀態可求，不受因果律和邏輯的支配。

此後丁氏又寫了一篇玄學與科學——答張君勸，從此論戰紛紜；加入丁氏方面的，大都是受過近代科學洗禮的人，其中以唐鉞等最爲值注意。唐氏的心理現象與因果律和一個癡人的說夢兩文，尤爲精采。幫忙張氏的，人數較少。（完全同情於張君的，可以說是沒有。）批評丁氏最利害的是林宰平氏的讀丁在君先生科學與玄學和張東蓀氏的勞而無功。此外站在客觀的立場，兩方面都批評的有梁啟超，陸志章，孫伏園……。

論戰終於停止了，一切都沈寂了，這一次筆辯的盛況似乎僅是給編學術史的人去追憶，戰時

一切的錯誤（如謾罵……）和好處都漸漸的幻滅了。事情好像應了柏格森的話——「……哲學上駁辯的光陰常是虛耗的。許多思想家互施的許多攻擊至今剩下來些什麼呢？沒有，或者無疑的少得很。有價值而長存的祇是各人所供獻少許正面的真理而已。一個真實的陳述自會去替代錯誤的觀念，不消煩勞我們去駁辯什麼，自是一個最好的駁辯。」（*Rule* p. 47）

x

x

x

然而，真實的陳述是在這場駁辯中走出來，這就是吳稚暉氏的一個新信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這一篇文章本身有沒有錯誤，是另一個問題；不過這篇文章對青年的影響，和在學術思想上所佔的位置，都是不容忽視的。

吳氏的人生觀，是根據他的宇宙觀的。他把世間上的一切——現象世界，精神世界，萬有世界，沒有世界……——完全用『一個』來包括了。這『一個』是活的；所有在這『一個』裏面的東西都是活的。（人是活的，蒼蠅是活的，毛廁的石頭也是活的。因為凡是有質力同時又有感覺的東西是活的，石頭一走進化學室裏，自然可以表現出它的化合的親和的質力，這無異於感覺，所以它也是活的。可知萬有都有生，而且『無』也是活的。）所以他說：『宇宙是一個大生命』。但這個大生命——『一個』——是怎樣演化而成現在的狀況呢？他說：

「在無始之始，有一個混沌得着實可笑，不能拿言語來形容的怪物，住在無何有之鄉，自己對自己說道，悶死我也！這樣的聽不到，看不見，聞不出，摸不着，長日如此，成年如此，永遠如此，豈不悶死人嗎？說時遲，那時快，自己不知不覺便破裂了。……頃刻變起了大千宇宙，換言之，便是說兆兆兆的我。他那變的方法，也很簡單。無非拿具有質力的若干「不思議」量，合成某某子。合若干某某子，成爲電子。合若干電子，成爲原子。合若干原子，成爲星辰日月，山川草木，鳥獸昆蟲魚鼈。你喜歡叫他是綿延創化也好，你滑稽些稱他是心境所幻也得。終之他是至今沒有變好，並且似乎還沒有一樣東西，值得他愜意，留了永久不變。這是我的宇宙觀。」（吳稚暉一個新言仰的宇宙觀及人生觀）

在這演進的路程中，宇宙是向着一個目標的。這個目標是「真美善」。從這樣的宇宙觀他就建立了他的人生觀了。

甚麼叫做人？吳氏以爲人不過是「外面止贖兩隻腳，卻得到了兩隻手，內面有三斤二兩腦髓，五千零四十八根腦筋，比較占有多額神經系質的動物。」甚麼叫做生？生不過是在世界的大舞臺上登場演戲一回事吧。概括起來說：

「所謂人生，便是用手用腦的一種動物，輪到「宇宙大劇場」的第億接八京六兆五萬七千

幕，正在那裏出臺演唱。請作如是觀，便叫做人生觀。」（同上）

人生的根本是飲食男女，但這些食色的本性，並沒有什麼善惡，也絕不是什麼神秘的精神生活，都『無非漆黑』團先生變動綿延，要扮演萬有的作用罷了。』

飲食男女可以分開喫飯，生小孩，招呼朋友三方面，吳氏的人生觀也分這三方面講。第一，他先講『清風明月的喫飯人生觀』。換句話說，這就是生活的問題。生活問題又可分精神生活——『清風明月』——和物質生活——『喫飯』——兩點，吳氏對這兩點都重視；他希望人人的生活都能解決，他定了喫飯的四個標準：

『（一）是喫飯要用自己的勞力換得才是。（到了大同世界，「各取所需」，也要將「各盡所能」做交換。不過人人道德高尚，去了算賬式的交換形迹而已。）

（二）是我的喫飯，若把阻礙別人的喫飯得來，就不對了。……

（三）是化了勞力喫不到飯，還是不願意奪別人的飯來喫，也便算做難能可貴。

（四）是能夠想出許多飯來給人喫，自然最好。但反過來，奪了許多人的飯，給我親愛的去不勞而喫，那就更不對。』（同上）

第二：他講他的『神工鬼斧的生小孩的人生觀』。他極注重男女的大慾，他並不注重結婚的

形式，夫婦的虛名。他相信科學終有一天，進步到使雜交可能；他以為在大同的世界，是一個雜交的世界，那裏——

『性交之事，真與兩個朋友會談相等。……不正之性交需要，亦無從彼此相強。』（同上）

第三：他講他的『覆天載地的招呼朋友人生觀』。這裏所謂『朋友』是指一切『非我』而言。『招呼朋友』就是對付非我。在生小孩人生觀和吃飯人生觀裏吳氏已把對付自己說明。在這裏他要講對付非我了。招呼朋友的工具中，直覺是頂重要的一種。他對直覺的見解，與一般的舊玄學家不同；他以為直覺是受理智所支配的，他說：

『直覺罷，良知罷，非量罷，良心罷，都明明是理智支配的東西；並不是什麼靈機活動，麻煩得了不得的神物。』（同上）

然則關於直覺和本能的起源，他又怎樣解說呢？他說：

『……人，分得機械式之生命（質與力），本乎生命之權力，首造意志；從而接觸外物，則造感覺；迎拒感覺，則造情感；恐怕情感有誤，乃造思想而為理智；經理智再三審查，使特種情感，恰像自然的常如適當，或更反糾理智之蔽，是造直覺；有些因其適於心禮，而且無需審檢，故留遺而為本能。』（同上）

『譬如我們要出臺唱戲，我們若不是在後臺習練了好久，然後出臺，那無人不曉得要鬧笑話。若習練得極熟，及到出臺，居然演手堵脚，使槍弄棒，好像行所無事，出於本能，才像個局面。豈有宇宙間的萬物，在宇宙大劇場裏演戲，能夠不如此，就好登場麼？因此，鳥能飛，獸能走，鵲能築巢，蜂能製房，小孩能吃奶，皆積了恆河沙數代的習練遺傳，方挾此本能，使登臺後，不爲人罵爲怪鳥廢人。……本能者，所以適其登臺。在臺上又各自運用情感理智，天天改良，使彩聲日高，一代一代積下去，再成新本能。叫宇宙大劇場兆兆兆幕後，脚色愈好。這是漆黑一團老祖爺爺傾向真美善的原則。……本能便是情感要登臺，經理智習練成的動作，作爲不能候登臺後再整備的應用品。直覺便是情感要盲進，經理智在恆河沙數時代，及恆河沙數環境，細細審查過，遺傳了，經驗了，留爲情感一發，不及思索時的救急扶持品。……牠也要靠着情感理智，更迭作用，做一個恆河沙數不斷的演進。沒有理智常川的助他演進，那直覺就可以顯出無辦法，無意味，鬧起直覺的破產。』(同上)

吳氏更舉惻隱的直覺和羞惡的直覺做比方，來證明他的理論。

吳氏的新人生觀，概括起來說，有兩個基本的觀念：就是相信物質（科學）和相信將來。他

嘗說明他的新信仰道：

『(一)我是堅信精神離不了物質。

(二)我是堅信宇宙都是暫局。然兆兆兆境，沒有一境，不該隨境努力。兆兆兆時，沒有一時，不該隨時改進。……

(三)……至於一般普通人，可堅決的，斷定古人不及今人，今人又不及後人。

(四)我所謂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不是單就善的一方面說。是說善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惡也古人不及今人，今人不及後人。……

(五)我信物質文明愈進步，品物愈備，人類的合一，愈有傾向；複雜之疑難，亦愈易解決。……

(六)我信道德乃文化的結晶，未有文化高而道德反低下者。……

(七)我信「宇宙一切」，皆可以科學解說。但欲解說一切之「可」，永遠不能。……』
(同上)

本善這幾條信條，吳氏提出四個要點：(一)人生觀不是人死觀，(二)人生觀不止我生觀，(三)人生觀共同他生觀，(四)人生觀才有宇宙觀。最後他以促進世界大同，覆天載地的大責任，加諸人

生，並且說：

『悠悠宇宙，將無窮極，願吾朋友，勿草草人生。』（同上）

x

x

x

這次人生觀的論戰和吳氏的新信仰的人生觀，都是有歷史的意義的。張君勱氏和丁在君氏的爭論，不過是『擁護理學與排斥理學的歷史的一小段』。吳氏的新信仰，一方面固然是反對理學，但他更進一步，希望一般人拋開理學樸學無謂的爭論，叫醒一般人向科學走，努力去創造物質文明，建立一個新時代。（參看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所以這一場討論，和吳氏這一篇文章，可以表示出中國學術思想的一大蛻變，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

參考書

科學與人生觀（亞東圖書館出版）

人生觀的論戰（泰東書局出版）

吳稚暉吳稚暉學術論著（上海出版合作社出版）

胡適幾個反理學的思想家（見胡適文存三集）

第十章 東西文化的討論

閉關自守的中國，經不起西方文化怒潮的激盪，歐洲船堅礮利的鼓動，終於把眼打開，對西方文化注意一下。於是『西學爲用，中學爲體』，『擇取歐西之長，以補我之不及』，『西人的文明，是真正理想的文明，我們應要全盤接受』……的口號，一句一句的被名人喊出來。時務報出版了，新民叢報出版了，新青年雜誌出版了；大家一天比一天的向西方文化接近。

歐戰叫醒了一般人的迷夢，物質文明被許多人宣告了破產。於是國中許多學者，都要把中西文化拿來重新估價，重新比較。東西文化的討論，因而盛極一時。

梁啟超先生自從民國八年從歐洲看完世界大戰收場的情形回來後，就寫了一篇歐遊心影錄，正式宣佈科學的破產。他說科學的發達，結果就形成了一種純物質的純機械的人生觀。而且那些唯物派的哲學家，根據實驗心理學，硬說人類精神也受自然法則所支配。那麼人類意志的自由就被否認，人類善惡的責任就消失了；其結果，是自由競爭，是弱肉強食，是不堪設想。他說：

『總之，在這種人生觀底下，那麼千千萬萬人前脚接後脚的來這世界走一趟住幾十年，幹

什麼呢？獨一無二的目的就是搶麵包喫。不然就是怕那宇宙間物質運動的大輪子缺了發動力，特自來供給他燃料。果真這樣，人生還有一毫意味，人類還有一毫價值嗎？無奈當科學全盛時代，那主要的思潮，卻是偏在這方面，當時謳歌科學萬能的人，滿望着科學成功，黃金世界便指日出現。如今功總算成了，一百年物質的進步，比從前三千年所得還加幾倍。我們人類不惟沒有得着幸福，倒反帶來許多災難。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拚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他嚮導，那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悽惶失望。影子是誰，就是位「科學先生」。歐洲人做了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卻叫起科學破產來。」（梁啟超歐遊心影錄）

梁啟超先生認為這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西方文化最大的貢獻是『德謨克拉西』和科學，現在科學的誤用已被認識，創立一個新局面是不能免的事。我們中國人在這個時間，對西洋文化應處一個什麼態度呢？啟超先生以為西洋文化中的科學方法我們不能不要；但我們的先哲有許多偉大的思潮，我們的文化有許多特別的優長，我們是有發揚光大這些優長的責任。梁先生說：

「第一步要人人存一個尊重愛護本國文化的誠意。第二步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學問的方法去研究他，得他的真相。第三步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來補助他，叫他起一種

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的系統。第四步把這新系統往外國擴充，叫人類全體都得着他好處。」（同上）

他更進一步指出發揚光大中國文化的重要，因為中國文化是調劑西方文化的良藥。所以梁氏不能不大聲疾呼叫道：

『……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着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着你來超拔他哩！』（同上）

我所以很詳細地敘述梁氏的意思，就是因為梁氏這幾段話，很足以代表中國大多數人的信仰。（而且也有不少外國人有這個意見。）張東蓀先生和張君勱先生等都有同樣的主張。這一班人被人家叫做『東方文化派的學者』（章士釗等也屬於這一派，他們的理論也大同小異。）

所謂『東方文化派的學者』的最大貢獻是梁漱溟氏的兩本巨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在前一本中，他首先就把平常人口頭上很濫用的『東西文化』一個名詞下了一個定義。他先說明『文化』道：

『文化并非別的，乃是人類生活的樣法。……但是在這裏還要有一句聲明 文化與文明有

別。所謂文明是我們在生活中的成績品……生活中呆實的製作品算是文明 生活上抽象的

樣法是文化。』(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頁五三)

文化既是生活的樣法，那麼文化的不同，也不過是抽象樣法的不同，生活中解決問題方法的不同。梁氏以爲解決生活中的問題有三個方法；換句話說，人生的態度有三條路向。這三條是：

『(一)本來的路向：就是奮力取得所要求的東西，設法滿足他的要求；換一句話說就是奮鬥的態度。遇到問題都是對於前面去下手，這種下手的結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滿足我們的要求，這是生活本來的路向。

(二)遇到問題不去要求解決改造局面，就在這種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滿足。……下手的地方并不在前面，眼睛並不望前看而向旁邊看；他並不想奮鬥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隨遇而安。他所持應付問題的方法祇是自己意欲的調和罷了。

(三)走這條路向的人，其解決問題的方法與前兩條路都不同。遇到問題他就想根本取銷這問題或要求。這時他既不像第一條路向的改造局面，也不像第二條路向的變更自己的意思，祇想根本上將此問題取銷。這也是應付困難的一個方法，但是最違背生活本性。因爲生活的本性是向前要求的。凡對於種種欲望都持禁欲態度的都歸於這條路。』(同上頁五三)

梁氏就根據這三條路向，來觀察東西文化。他說西方文化走第一條路向；中國文化，走第二條路向；印度文化，走第三條路向。他說：

『西方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爲其根本精神的。或說：西方化是由意欲向前要求的精神產生

「塞恩斯」與「德謨克拉西」兩大異采的文化。』（同上頁二四）

『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爲調和，持中爲其根本精神的。』（頁五五）

『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爲其根本精神的。』（頁五五）

定義下好了，梁氏就從哲學方面來分析東西文化（第四章）。他用孔子的哲學來代表中國文化的全部，有很多獨到之處。（很多人批評梁氏這本書〔如李石岑氏等〕就以爲用孔子來代表中國文化的全部是不對的，

這又是另一問題）他以為孔子的人生哲學完全是從周易上的形而上學產生出來的。周易的中心問題講變化，它的中心意思是『調和』……『大意以爲宇宙間實沒有那絕對的，單的，極端的，一偏的，不調和的事物；如果有這些東西，也一定是隱而不現的。凡是現出來的東西都是相對，雙，中庸，平衡，調和。一切之存在，都是如此。』（頁二一八）這種形而上學有一個根本的地方，就是無表示。孔子從這種形而上學上得到他的人生哲學。他的人生哲學有六個基本的觀念：

(一)讚美『生』——『孔家沒有別的，就是要順着自然道理，頂活潑頂流暢的去生發。』

(頁二二一)

(二)不認定，不表示的態度——『一般人是求其通的；孔子則簡直不通！然而結果一般人
之通卻成不通，而孔子之不通則通之至。』(頁二二四)

(三)一任直覺——『遇事他便當下隨感而應，這隨感而應，通是對的，要於外求對，是沒有的。我們人的生活使是流行之體，他自然走他那最對，最妥帖最適當的路。他那遇事而感而應，就是個變化，這個變化自要得中，自要調和，所以其所應無不恰好。』

(頁二二五)

(四)求『仁』——『敏銳的直覺，就是孔子所謂仁。』(頁二二六)

(五)不計較利害的態度——『……：「無所爲而爲」是儒家最注重用力去主張去教人的。
……：最與仁相違的生活就是算賬的生活。……：仁祇是生趣盎然，才一算賬則生趣喪

矣！』(頁二三四)

(六)樂的生活——『他這個生活是樂的，是絕對樂的生活。……：他原不認定計算而致情志
擊於外，所以他毫無所謂得失，而生趣盎然，天機活潑，無入而不自得，決沒有那一

刻是他心裏不高興的時候……」（頁一三七）

上面六個觀念，合起來講，就是直覺。但於直覺的自然求中之外，更以理智有一種揀擇的求中。所以孔家走的是雙的路；『單就怕偏了，雙則得一調和平衡。』這雙的路可以表示如下：

『（一）似可說是由乎內的，一任直覺的，直對前境的，自然流行而求中的，祇是一往的；

（二）似可說是兼顧外的，兼用理智的，離開前境的。有所揀擇而求中的，一往一返的。』

（頁一四四）

梁氏看見孔家這種偉大的人生態度，贊嘆不已，大有『聞其風而悅之』的情勢。但他也和啟先生一樣，曉得西洋文化的重要。他指出我們現在應持的三種態度：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態度，絲毫不能容留；

第二，對於西方文化是全盤承受，而根本改過，就是對其態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評的把中國原來態度重新拿出來。』（頁二〇二）

可知梁氏是很注意孔子的人生態度的。他並且預言世界未來文化就是中國文化。（『中國化復興之後將繼之以印度化復興。所是古文明之希臘，中國，印度三派竟於三期間次第重現一遭。』）

（頁二〇〇）

離寫這本書十一年後，梁氏在村治發表了一篇主編本刊之自白（民十九，六月，村治第一（第一期）和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覺悟，（村治第二十四期）他就更傾向於中國化了。（這是梁先生對西洋的「德謨克拉西」反對，並不是對「賽恩斯」明白的反對。）他說：

「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於其根本精神；拋開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斷送了自家前途。自家前途，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求進，而向上；不能離開向外以求，不能退墜降格以求。祇有發揮自己特長，站在自家原來立腳地上以奮鬥，離開不得這裏一步。」（梁

漢中國民族自救運動的最後覺悟

「……而後恍然，而後太息，西洋把戲之真不得而用之也！」（梁漢漢自白）

在這裏，梁氏變成一個完全中國文化派的學者了。

X

X

X

二梁的言論，都是不合西方文化派的學者（如胡適，吳稚暉……等等）的意見，所以反對二梁的文章很多。我們現在將批評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文章，放開不講，單講西方文化派學者的主張。西方文化派主張最激烈的，恐怕是陳獨秀氏了。陳氏在他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便大聲疾呼的擁護西方文化，擁護科學與「德謨克拉西」，和反對中國舊有文化。他說：

『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能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更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要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獨秀文存卷一三六二）

西方文化學者大約都有一個共同的意見：反對把東西文化來分成三條路向，反對『物質文明是西洋的而精神的文明是中國的』的話。他們以為東西文化祇有一條坦蕩蕩的向前的路，不過東方因為缺乏了那些逼迫和鞭策他們前進的環境，所以走得較慢，或竟至停滯不前。所以胡適先生說：

『東西洋文明的界線祇是人力車文明與摩托車文明的界線。』（胡適文存三集卷一頁五二）東西文化化的分別不過如此。如果用甚麼物質文明或精神文明來分析東西文化，就是不可救藥的謬誤。胡適氏在他的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說：

『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Spiritual）。』（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西方文明既不是限於物質，那麼它的真相是怎樣呢？胡氏說：

『這一系列的文明建築在「求人生幸福」的基礎之上，確然替人類增進了不少的物質上的享

受，然而他也確能很滿足人類的精神上的要求。他在理智的方面，用精密的方法，繼續不斷地尋求真理，探索自然無窮的祕密。他在宗教道德的方面，推翻了迷信的宗教，建立合理的信仰；……儘量用人的新想像力和新智力去推去行那充分社會化了的漸宗教與新

道德，努力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同上）

所以我們應盡量來歡迎西方的文明，因為它是『不知足』的，它是『充分運用人的聰明智慧來尋求真理以解放人的心靈，來制服天行以供人用，來改造物質的環境，來改革社會政治的制度，來謀人類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樣的文明應該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這樣的文明是精神的文明，是真正理想主義的 (Idealistic) 文明，決不是唯物的文明。』（同上）同時我們應捨棄我們舊有的東方文明，因為它是知足的，它是『受物質環境的拘束與支配，不能跳出來，不能運用人的心思智力來改造環境改良現狀的文明，是懶惰不長進的民族的文明，是真正唯物的文明。這種文明祇可以遏抑而決不能滿足人類精神上的要求。』（同上）

上述東西文化兩派的學者，雖然沒有正式宣戰過，但暗鬥是不少的。他們雖仍未鬥得個誰勝誰負來，但東西文化的討論，也和人生觀論戰一樣的具有歷史的意義。

參考書

梁啟超歐遊心影錄

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民十商務出版）

胡適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

第十一章 文藝的論戰

近世西洋文化的中心——個人本位主義，自歐戰以後，已漸漸失去一部分人的信仰；一切學術思想，都很明瞭地要轉變到社會本位主義。（社會本位主義，早已萌芽，但直到戰後才特別發達。）中國的學術思想，既是跟着西洋的思想而轉移；自然也受這種轉變的影響。在文藝方面，所受的影響更深；於是『革命文學』運動，就依着時代底需求而產生了。但革命文學運動，也和一切好的或壞的運動一樣，必會遇着反對的人；『語絲派』一班人（他們有許多是文學革命運動健將。）就是與這種新興運動相對立，相攻擊的敵人了。

在提倡革命文學的一方面，有創造社等一班人（如郭沫若氏，錢杏邨氏，成仿吾氏，馮乃超氏，蔣光慈氏……），創造月刊，文化批評，太陽月刊，流沙……都是他們的言論機關。在反對者的一方面，有『語絲派』的一班人，以魯迅氏為領袖。兩方互相攻擊，互相駁辯，成了五四以來文藝界的第二回大戰。在這論戰中，除了這針鋒相對文藝兩大派別外，還有『文學研究會派』（小說月報）和『新月派』等。（這次論戰始於民十七年，繼續約一年。）

所謂『革命文學』的精神，是社會本位主義；它的立腳點，是『普羅列塔利亞』（即無產階級）；它的哲學上的根據，是辯證法的唯物論；它的目的，是在揭破支配階級的罪惡；它的格言，是：『一切藝術都是宣傳』；它的態度，是積極的，是富於反抗性的；它的內容，是滿充着執誠的；……它的產生，是中國的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這都是提倡革命文學運動的人的主張，但他們能否做到他們所主張的，卻是另一個問題了。）

他們以為文學是革命的前驅，文學和革命是互為因果的。然而，事實告訴我們說：文學家是常常躲在象牙之塔去無病呻吟，他們的生涯是風花雪月，醇酒美人。那麼文學家不是要受革命家的詛咒嗎？文學一方面是革命的前驅，一方面又是革命的反動，這種矛盾的現象應怎樣解說呢？

郭沫若氏解釋道：

『革命本來不是固定的東西，每個時代的革命各有每個時代的精神，不過革命的形式總是固定了的。每個時代的革命一定是每個時代的被壓迫階級對於壓迫階級的徹底反抗。階級的成分雖然不同，反抗的目的雖然不同，然而其所表現的形式是永遠相同的。……每逢革命的時期，在一個社會裏面，至少是有兩個階級的對立。有兩個階級對立在這兒，一個要維持牠素來的勢力，一個要推翻牠。在這樣的時候，一個階級當然有一個階級的代言人，

看你是站在那一個階級說話。你假如是站在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反對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壓迫階級的，你當然會贊成革命。……」（郭沫若革命與文學）

這完全是用辯證法的唯物史觀的觀點來解釋文學的兩方面。他並且以爲文學和一切的現象一樣，是有正反兩個矛盾的狀態——革命的文學和反革命的文學。

在現在的社會當然也不能例外：文學也必有革命和反革命兩對立的範疇。所謂『革命文學』的提倡者，當然要站在革命的一方面。於是他們就要代被壓迫階級說話，要做革命的先驅。但甚麼是中國社會的被壓迫階級呢？中國人不是都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嗎？……然而，他們所找出來的被壓迫階級是所謂『普羅列塔利亞』階級，他們就不能不代他們說話，不能不代他們宣傳，不能不代他們揭破支配階級的罪惡……

這種革命文學的主張，完全是受時代趨勢的鼓盪的。現代社會的進展，是從個人本位主義轉到社會本位主義：文藝的進程自然也是一樣。所以——

『……第三階級擡頭之後，以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爲核心的資本主義漸漸猖獗起來，使社會上新生出一個被壓迫的階級，便是第四階級的無產者。在歐洲的今日已經達到第四階級與第三階級的鬥爭時代了。浪漫主義的文學早已成爲反革命的文學，一時的自然主義雖是反

對浪漫主義而起的文學。但在精神上仍未脫盡個人主義與自由主義的色彩。自然主義之末流與象徵主義神祕主義唯美主義等浪漫派之後裔均祇是過渡時代的文藝，她們對於階級鬥爭之意義尙未十分覺醒，祇在遊移於兩端而未確定方向。而在歐洲今日的新興文藝，在精神上是徹底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文藝，在形式上是徹底反對浪漫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藝。這種文藝，在我們現代要算是最新最進步的革命文學了。」（同上）

在這裏，我們可以曉得革命文學運動底精神，是擁護社會本位主義和反對個人本位主義了。他們以為中國受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就是受資本主義的壓迫，就是受個人主義的壓迫，所以中國更需要第四階級的文學了。這種文藝——

『當然不是孤立的個人底描寫，不可不是階級的，集團的自我底描寫。』（克興評駁甘人的

拉雜一篇）

可見他們反對個人主義是很徹底的。他們並且大聲疾呼說：

『民衆心裏的熱情，民衆的勇敢的力量，民衆的偉大的犧牲的精神如果表現出來時，一定可以洗去從前個人主義文學的頹廢的，傷感的，怯懦的，歎息的缺陷，而另外造出一剛強的，悲壯的，樸素的文學來。這種文學是充滿着人的精神的：牠不特要攻擊現代的社會制

度，而且還要努力指出我們應走的方向……」（黃藥眠非個人主義的文學）

×

×

×

『創造社派』的人既是這麼決心地反對個人文學，所以他們對於他們所認為個人主義的文學作家魯迅先生和『語絲派』的一班人，就不能不加以攻擊了。但他們的攻擊，除了錢杏邨氏的死去了的阿Q時代外，恐怕完全都是主觀的謾罵：用周氏的籍貫，家族，年紀等等來做奚落的資料。同時『語絲派』底反攻，也是盡『冷嘲熱刺』的工夫。所以這一次論戰的態度，比人生觀論戰的態度還壞。我們也不必紀述那些沒有價值的相罵了。

平心來說，魯迅先生何嘗是一個反革命的文學家呢？正如畫室所說：『我們在魯迅的言行裏完全找不出詆毀整個的革命的痕跡來，他至少嘲笑了革命文學的運動（他也並沒有嘲笑革命文學的本身）。……』這個話可以代表反對『革命文學運動』的人的態度。他們的主張可以分五點來說：第一，他們並不是反對革命的文學，他們並且相信在中國今後文壇上，革命文學是最有發展的可能。（參觀待符評「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但他們之中，如郁達夫氏等，就相信它的發展非在無產階級專政以後不能成功；他說：『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未達到以先，無產階級的文學是不會發生的。』（郁達夫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的文學）第二，他們承認文藝可以用作宣傳；然而，不

是一切宣傳都是文藝，那些『標語口號的文學』更談不上是文藝。（他們認定『創造社派』的『新作品』，即使不是有意的走入了『標語口號文學』的絕路，至少也是無意的撞上去了。）

（茅盾從骷髏到東京）第三：他們不承認『所有文學都要變成革命文學』的論調。他們有些以為『文學與革命是沒有必然的連帶性的，是可以分離開的。』（謙弟：革命文學論批判）他們有些以為：在

革命時期，文學是很容易沾染革命色采，但並不能說，在革命時期一切的作家必須創作『革各文學』。（梁實秋文學與革命）第四：他們承認文藝家是不會拋棄社會的；他們相信『阿Q時代』並沒有去死，所以魯迅先生等還是時代的領導者。他們以為在停滯着的中國社會，文藝決不能獨自飛躍，所謂『超時代』其實就是逃避。第五：他們否認文學是有階級性的，文藝不是某一階級所得壟斷的。

這五點可以代表反對革命文學的人的立場了。可見他們所反對的，是『創造社派』人抹煞『革命文學』以外一切的文學的態度，而不是反對整個『革命文學』的本身。他們尤其是要反對的，就是『創造社派』的人的『誇大狂』，他們再三的要問：『所謂革命文學的歷史根據在那裏？』『他們有什麼革命文學的產品？』『革命文學對於社會起了什麼影響？』……

真的，這些問題我們到了今天——革命文學運動發起了幾個年頭的今天——還要問呢！

到了一九三二年，胡秋原氏又重新提起這個問題。他否認了阿Q時代之已死去，他要求文藝之自由。後來蘇汶氏又在現代一卷三期發表了一篇文章，遂引起了『文藝自由的論辯』，一時參加的除蘇胡之外，有洛陽、周起應、魯迅、陳雪帆、何丹仁、譚四海、易嘉、舒月……等氏。論辯紛紜，歷時一載。這次論戰的一切駁辯或相罵，均沒有敘述之必要。我們祇把這問題的焦點指出，分述於下：

(一)文藝能否離政治而自由？是否一切文學都是鬥爭的武器？——在無產文學理論家或革命文學家看來，『一切藝術都是宣傳』，『文藝到處是政治的留聲機』。乃屬天經地義。所以文藝是不能離政治而自由的。但自蘇汶氏看來，文藝是可以離政治而自由，並且爲了保全文藝對人生那永久的，絕對的任務起見，它當要脫離政治而自由的。至於說文藝都是煽動或宣傳，則更爲蘇汶胡秋原氏所 能同情。所以胡氏要問——

『例如，塞凡蒂斯，濟茨，繆塞，法郎士，普希金，屠格涅夫，坡，乃至陶潛，嵇康，他們煽動了什麼，做了那一階級的「政治的留聲機」？』(胡秋原演說的論爭——現代二卷二期)

不但如是，若用藝術作宣傳，則『那補助革命的藝術，不限定是真正值得稱爲藝術的東西而已。』

(二) **文藝與階級**——有些普羅文藝理論家，認文藝不是贊助被壓迫階級便是贊助壓迫階級，不是革命便是反革命，其中是不容間位的。他們以為：

「一般所說的「一切的文藝都不能超階級的（這種文藝祇能在將來無階級的社會裏存在），同時都不能超利害的，又都是直接間接地做階級的鬥爭的武器」的理論，是文藝的歷史所證明了的。」（何丹仁關於『第三種文學』的傾向與理論——現代二卷三期）

就是蘇汶先生也承認『在天羅地網的階級社會裏，誰也擺脫不了階級的牢籠，這是當然的，因此作家也便有意無意地露出了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文學之有階級性者，蓋在於此。』不過苟進一步說『洩露某一階級的意識形態就包含一種有目的意識的鬥爭作用』，他們就不能承認『一切文學都是有階級性的』一命題了。

(三) **第三種文學和絕對中立的問題**——文藝既在蘇汶氏等的目中，是當具有絕對的自由，而至少在作者寫作時的主觀上，可以超乎階級的利害觀念，所以他們很自然的主張『第三種文學』或中立文學，而同情於第三種人和『同路人作家』。在他們看來，凡是忠於藝術，死抱文藝不肯放手的人，都可以成爲第三種人，而走向第三種文學的路。當然，普羅文藝理論家們是對此不會同意的。例如丹仁說：

『第三種文學，如果像蘇汶先生現在所表現似的傾向，乃是要超階級鬥爭的，超政治的文學，更具體的明白的說，要在地主資產階級反革命文學和普羅革命之間或之外存在的超革命也超反革命的文學，那麼這種文學實際上也早已不是真的中立的，真的第三種文學。因為這樣的文學及其理論，實際上，客觀上，往往仍舊幫助着地主資產階級的……所以，問題並不在於我們拒絕中立，而是在於牠在客觀上並非中立，在於這樣的第三種文學，以及做這樣的第三種人，並非蘇汶先生們的作家們（『作者之羣』）的出路。但是，第三種文學，如果是「反對舊時代，反對舊社會」，雖不是取着無產階級的立場，但決非反革命的文學，那麼，這種文學也早已對於革命有利，早已並非中立，不必立着第三種文學的名稱了，而這才是目前放在一般作家們（『作者之羣』）的面前的正當的路。』

（四）藝術價值的問題——在普羅文藝理論家看來，藝術底價值祇是客觀地存在；換句話說，藝術祇有社會的價值，因為它是不能獨自存在的。而蘇汶胡秋原氏等，則認為藝術底價值是獨立的。因之，『爲藝術而藝術』，實應尊重。

上述四點，是這個重要論戰的中心。然而，他們兩方，也不是沒有共同承認之點的。正如蘇汶氏所指出，這次論爭的結果，相對的文藝創作自由的原則是一般地被承認了，而左翼方面的

狹窄的排斥異己的觀念是被糾正了。

x

x

x

然而，歸根到底，不論文藝之理論的爭辯是怎樣，一個客觀的人，始終要說一句話：『拿作品來！』

參考書

李何麟編中國文藝論戰（民十八北新印行）

丁丁編革命文學論（民十七泰東出版）

蘇汶輯文藝自由論辯集（民二二現代出版）

現代第一卷至第二卷

第十二章 政治問題的討論

學術界一方面爲時代背景所支配，一方面常常在環境允許下影響環境，創造時代，在各種環境之中，『政治』的環境與學術的關係最大。尤其是在士的階級占有特殊位置的中國，學術和政治的關係，自是更深。例如晚清之季，今文學家，一方面研究學術，一方面做變法維新的運動的先鋒；古文學派，一方面努力學術，一方面種下種族運動的種子，樹起民族主義的旗幟。他們都是與政治不能分離的。辛亥革命之後，智識階級與政治的關係更日深一日，所以政治問題的討論，雖在言論未得完全自由之下，仍是沒有減色。最近胡適氏與羅隆基氏等的討論人權，更能掀動一時。所以這個問題的討論，有特別紀述的價值。

歐洲文化的中心是科學和『德謨克拉西』；科學雖是受過一度的反對，但現在已深深的走入中國所有的青年的腦海中，再多來幾個『殲尸』（指提倡讀經，反對科學的復古派——用周子同氏的話。），也不能洗得『賽先生』去了！然而『德謨克拉西』在中國的地位怎樣呢？現在執政者不肯歡迎真正的『德先生』，一般人民正在用懷疑的目光去注視『德先生』，有許多人正在大聲疾呼的反對『德先生』！

……在這樣情形之下，我們學術界的領袖，自然應該站在學術的立場來發表一些意見了。

X

X

X

這一章所要討論的，完全是站在學術的立場來討論政治的言論。所以我們對於爲政治而談政治的政治家和他們的言論，如孫中山先生和他的三民主義，陳獨秀先生和他的社會主義，吳稚暉先生和他的虛無主義，……都祇得放下不講。

站在學術的立場來討論政治的，有辯證法唯物論的社會主義運動，胡適氏等的人權討論和梁漱溟氏等的村治運動。胡氏完全站在西方文化學者的地位來討論人權，介紹和宣傳『德謨克拉斯』。胡氏是抱着介紹『賽恩斯』時的精神來介紹『德先生』。西方文化的中心在科學與『德先生』，科學在中國可算是成功了，但『德先生』在中國處處不及『賽先生』，德賽先生的擁護者胡適博士，自然要代德先生抱不平之鳴了。在另一方面有東方文化學者梁漱溟先生，抱着不同的觀點。梁氏深信中國文化，向西方文化這一方面——『德先生』的一方面——根本懷疑，以爲『德先生』的路在中國是走不通的。胡梁二氏所抱這兩個不同的觀念，是有歷史上的價值的，是有歷史上的意義的。東西文化的討論是一個學術上爭辯的大題目。東西兩派此興彼伏，此伏彼興，將要循環不已。我們在第八章裏所討論的，是這個問題的一面；第九章裏所討論的，也是這

個問題的一面；這裏所討論的，也是這個問題的一面，將來這個問題還要在各方面發展呢！

×

×

×

胡氏等這一次發起的人權討論，完全是站在新文化的立場來說話的。他所以批評國民黨，原因就是他以爲國民黨是新文化的反動者，（翻一點對不對是另一個問題。）我們在胡氏的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裏可以看出。胡氏明明白白地說：

『新文化運動的一件大事業就是思想的解放。我們當日批評孔孟，彈劾程朱，反對孔教，否認上帝，爲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門戶，解放中國的思想，提倡懷疑的態度和批評的精神而已。但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的結果，造成了一個絕對專制的局面，思想言論完全失了自由。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紀念週不可不做。一個學者編了一部歷史教科書，裏面對於三皇五帝表示了一點懷疑，便引起了國民政府諸公的義憤，便有戴季陶先生主張要罰商務印書館一百萬元！一百萬元雖然從寬豁免了，但這一部很好的歷史教科書，曹錕吳佩孚所不會禁止的，終於不准發行了！』（人權

論集頁一二四）

『新文化運動的根本意義是承認中國舊文化不適宜於現代的環境，而提倡充分接受世界的

新文明。但國民黨至今日還在那裏高唱「抵制文化侵略」！還在那裏高談「王道」和「精神文明」！還在那裏提倡「國術」和「打擂臺」！……」（同上頁二二六）

於是就得到一個結論：站在新文化運動的立場上，他不能不說國民黨是反動的。這就是胡氏這次批評國民黨，提出人權討論的立場了。可見他完全是站在學術的，新文化運動的觀點來談政治，他自己也說他這一次的討論，不過是「一個負責任的學者說幾句負責任的話，討論一個中國國民應該討論的問題」（人權論集頁一二五）。

明白了胡氏的立場，我們可以討論他們的主張了。他們主張的中心，在上面已經說過，是「德謨克拉西」。「德謨克拉西」是甚麼？它就是「人的個性伸展」。一個人要把他的個性伸展，就不能不要求自由，要求平等。這一種個人自由地去伸展，平等地去伸展的權利，就是人權。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氏這一次所爭的，就是這樣的人權，所以羅氏說：

「人權是做人的那些必須的條件。人權是衣，食，住的權利，是身體安全的保障，是個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個人生命上的幸福，因而達到人羣完成人羣可能的至善，達到最大多數享受最大幸福的目的上的條件。」（同上頁四〇）

在今日的中國，這樣的人權不是還沒有嗎？

他們引了外國許多文獻來證明人權是應該保障的。如他們引法國的人權宣言：

『一切政治組織的目的在保全自然的及永不磨滅的人權。』

他們又引納斯克在他的政治典範裏所說的話：

『國家的優劣程度，就以他保障人權成功失敗的程度爲標準。』

他們更將中國人權沒有保障的事實指出來，他們以爲現在應該要求自由，要求平等，要求人權的保障。

他們所要的是甚麼人權呢？羅氏在他的論人權裏提出三十五條，其中最重要的是：

(一)『國家是全體國民的團體。國家的功用，是保障全體國民的人權。國家的目的，謀全民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國家的威權是全民付與他的，其量以國家在功用及目的上達到的程度爲準。』(同上頁六〇)

(二)『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人民，因爲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對國家政治上一切權利，應有平等享受的機會。不得有宗教及信仰的限制，不得有社會階級及男女的限制。』

(同上頁六一)

(三)『國家的功用保障人權，人權的首要原則在保障人民的生命。國民維持生命的方法

是用勞動力去換取衣，食，住。所以國民有勞動權，國家有供給人民勞動機會的責任。國民失業是國家失職的證據。是國家在人權上沒有負擔責任的證據。」（同上頁六五）

（四）『國民發展個性，培養人格以後，進一步的目的在貢獻私人的至善於社會，以求社會的至善。為達到這種目的，國民應有思想，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的自由。』

（同上頁七三）

用甚麼法子去保障人權呢？最好的方法——而且是惟一的方法——是用法律來保障人權。所以爭人權的人，必主張法治。法律之中，最要緊的是根本法——憲法或約法，所以主張法治的人，必先爭憲法。胡氏等也是一樣，他們就是主張法治，主張制定根本法。胡氏的人權與約法和我們什麼時候才有憲法？兩文，就是這樣的主張。所以他們的口號是：

『快快制定約法以確定法治基礎！』

『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同上頁一二）

總觀他們這一次的人權運動，若果說他們是反對國民黨，無寧說他們是介紹西洋文明的『德先生』。

繼『新月派』的人權論而起的有汪精衛氏等所倡導的憲法運動。不過憲法運動和人權運動有一個大不同之點，即後者醉心於歐美十八世紀所盛行的民主主義，而事事以法國革命之人權宣言為依歸。憲法運動則在促成國民黨之還政於民，而不受十八世紀哲學之縛束的。

人權運動和憲法運動之外，又有社會主義運動和村治運動。關於社會主義的思想，下章有詳細的討論，茲不贅。在這裏，我們將集中於村治運動的紀述。

村治運動的代表作是梁漱溟氏的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梁氏底立場，剛剛和胡氏的相反：梁氏的立腳點是中國文化，胡氏的立腳點是西方文化，所以梁氏明白的否定了胡氏的路，他認為中國出路當另有一途，不是『德先生』所能解決的。

讓我們把梁氏底主張，作一個忠實的撮要：

『所謂從民族自覺而有的新趨向，其大異於前者，乃在向世界文化之開闢以趨，而超脫乎一民族生命保存問題。此何以故？以吾民族之不能爭強鬥勝於眼前的世界，早從過去歷史上天然決

定了；而同時吾民族實負有開闢世界未來文化之使命，亦爲歷史所決定；所謂民族自覺者，覺此也。』（頁九六）

在梁氏看來，時至今日，中華民族底自救運動，已可說是到了山窮水盡的景況：資本主義很明顯的是一條死路，而共產主義的把戲我們也弄不通。那麼我們就不該執迷不悟，再拋開自己的精神，而向絕路以趨。我們應要打破了往西走的迷夢，更不沾戀；因爲我們自有其立國之道呢。

爲甚麼模倣歐美近代國家，期望達到資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路是死路呢？一方面因爲這個制度本身的缺陷：『近代西洋人走的這條路，內而形成階級鬥爭社會慘劇，外而釀發國際大戰世界禍災，實爲一種病態文明，而人類文化的歧路。』（頁二〇七）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中國人和這種制度是永無緣分的。理由有三：（一）大多數人是全然無此要求；（二）物質的條件不合；（三）與我國民族精神不相符合，所以受吾民族隱意識的拒卻。所謂精神不合者有四點。第一：西洋近代制度的運行，實賴其各份子底爲私利和自由競爭，這根本和中國安分守己，與世無爭的精神不合。第二：中國人那種溫恭摯節，順序就理底態度完全不合於那種各自爭雄的選舉制度。一動一靜：是無法互相做效的。第三，西洋政體的施行，全靠制衡和法律底運用，而法律制度底事實根據，則爲個人主義和權利觀念；中國民族卻以倫理爲最大的事實，而以『禮治』爲中心。第

四：西洋近代制度，在擁護慾望，滿足慾望，而中國人則超乎慾望，而注重於人生底意義與價值——即所謂『理』。可見中國民族精神，實使中國無法走上德謨克拉西的路。

至於俄國共產黨發明的路，自有其很多妙處。但中國人要跑這條路，卻不可能。其根本的原因，也是在文化的不同：因為中國文化是超出了唯物史觀的圈外，其生活基本絕不是機械的，所以不能從經濟以把握看它底樞紐機械。中國人祇顧其一生一家的利益，而少公共的觀念，因而不會有階級的意識；並且他是好尚和平，寬容而有理性，所以他也不屑鬥爭。自中國舊日之社會組織而言，則其結構亦與西洋不同：『一、大體上人人機會均等，各有其前途運可求，與西洋之階級社會異；二、倫理本位與西洋之個人本位的社會異。』（頁一七三）由此兩異，則西洋人要向外發展，而有革命，有階級鬥爭；中國人則心思氣力祇向裏用，沒有階級鬥爭。而且中國數千年的政治，都以消極不擾為治，內部結構祇有統治者而無統治階級；人民則除了納糧之外，便不受國家底干涉。因為階級鬥爭底客觀條件不存在，階級基礎困難，革命對象沒有（帝國主義和軍閥都非革命的眞對象），理論上的不能統一，所以要走蘇俄發明的路向，必不可得。

簡而言之，這兩條路之所以走不通，實因其與我們底民族精神大相刺謬，亦即因『我們的精神實超邁於他之故』。『自曾文正李文忠以迄共產黨，雖再轉再變，不可同語，而拋開自家根本

固有精神，向外以逐求自家前途，則實爲一向的大錯誤，無能外之者。」（頁八八）今後當趕緊回頭，認取自家的精神，尋求自家的路向。『自家前途，自家新生命，全在循固有精神而求進，而向上；不能離開向外以求，不能退墜降格以求。』（頁九二）往西走的兩條去路，均較我們固有精神低下，所以於我無補，而『祇益死機』！

因之，我們祇有一條生路——鄉村建設底路。唯有這條活路才能激發吾民族的精神，打動吾民族生命的深處。但所謂中國民族精神，不是在清代那早已腐壞僵化的殘餘和軀殼，而是中國人自周代以來所濡染浸淫的一種俊偉精神——周公孔子所給予我們的人生態度。這人生態度，就是『兩眼常轉回看自家這裏，反求諸己，盡其在我，調和融洽我與對方之間，或超越乎彼此之對待，以變換主觀自適於這種境地爲問題之解決，而得滿足於內者。』（頁五四）基於這人生態度的中國民族精神，其主要的特徵有七：（一）第一是人本主義：我們不像資本主義國家之以「錢」爲本，而是以「人」爲本的。（頁二四）（二）然中國人對「人」的認識，又超過於西洋人，因爲他認識了人類之所以爲人——認識了人的「無對」（頁六四）。正因其有此認識，故他能超乎慾念，自人性中異乎一切生物之點出發，因而有他那「藝術的人生」：凡事安分守己，對人則處寬容的態度，對己則無往而不自得。（頁五九，六一，一一八）（三）不但如是，中國人凡事訴諸自己的理性；

而講理又都以孔子底道理爲歸宿。(頁六一)(四)因爲如此，所以社會秩序，自能靠道德習慣去維持(頁六二)；所以數千年來的政治，都是「無爲而治」(頁七四)，並且有王道仁義之風(頁九二)。(五)所謂道德習慣，可由兩方面表現出來。一方面是倫理關係——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底相互的關係，而非自私的關係。(頁六七，七六，二二八)(六)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禮俗制度(頁五八，六六，一三九，二一五)；而「禮」也是與倫理相緣而來的(頁一三〇)。在梁氏看來，人類未來社會的路是禮治的路而非法治之路(頁一三二，一四〇)。(七)最後一點，就是中國人大體上是機會均等，沒有嚴限的階級劃分。(頁七二)

梁先生雖以中國民族精神，爲其烏托邦底中心，但他的方法是從政治經濟和教育三方面入手的——而尤注重於經濟問題，他並且說：「誰對於中國經濟問題拿不出辦法來，誰不必談中國政治問題。」(頁二五五)

然則梁先生的辦法又是甚麼呢？答案是「鄉村建設」。鄉村建設所以即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就因爲中國是一個村落社會：「求所謂中國者，不於是三十萬村落，其焉求之？」(頁二八九)因此，農村問題，便是中國問題底焦點：「祇有鄉村定安，乃可以安輯流亡；祇有鄉村產業興起，可以廣收過剩的勞力；祇有農產增加，可以增進國富；祇有農村自治當真樹立，中國政治才

算有基礎；祇有鄉村一般的文化能提高，才算中國社會有進步。總之，祇有鄉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無論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教育上都是如此的。』（頁二一〇）

然所謂鄉治或村治，不是一種改良而是一種革命的主張。（頁二七六，一九二）但『革命』不是指對誰革命，不是以『人』爲對象的。（頁二八四）這裏的革命是一種秩序上的革命；『從舊秩序——君主專制政治，個人本位的經濟，根本改造成——全新秩序——民主政治，社會本位的經濟。』（頁一九二）然而這種革命，是由下而上，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換句話說，它是民辦而非官辦的（頁三五二），同時我們祇要鄉村建設，不必努力求達到不可能的全國統一（頁一七）。

鄉村建設，既應由人民自行負責，故『其發動主動以至於完成，全在其社會中知識分子與鄉村居民打成一起，所構成之一力量。』（頁一八一）實施方法，先使知識分子組織起來，回到鄉間，與鄉村居民作廣大聯絡，形成一中心勢力（頁一九〇），而從事各種建設；經濟上則舉辦各種『合作』，設法改良技術；政治上則從合作的路，實行以『人』爲本的地方自治；教育則注重民衆教育，樹立良好的禮俗。（頁二一二，二一五，二四九，三六四）祇要如此，中國問題便能解決了。

X

X

X

參考書

胡適·羅隆基·梁實秋人權論集（新月）

梁漱溟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後覺悟（村治）

村治（村治）

第十三章 社會史的論戰

自從一九二七年國民革命之後，國民黨初握政權，對革命的理論，不能不作進一步的研究，對今日中國社會的現象，不能不求深一層的認識；而共產黨則因第三國際盲動政策之失敗，對中國經濟結構，更迫切地要求解答。更兼以社會科學界漸知注意於中國社會之探討，所以中國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研究，便如風起雲湧了。

中國經濟性質的問題，不獨成了這六七年來學術討論中心之一；而且因對這個問題的見解不同，形成了政黨上不同的派別。例如中國共產黨底分裂，這是一個主要的因素。在『幹部派』看來，封建勢力在今日中國社會甚佔優勢——

『總之無論是誰，除掉他是佔領中國工業最發達的局部江浙以外，他都必然要把主要的基礎放在封建剝削方式——封建生產方法上；因為在生產落後，農村經濟佔優勢的地方，決不能從海外找資產階級的基礎，從天上掉下一個資產階級的政權來的。』（李立三）

他們指出許多軍閥的剝削和地主的剝削，認為這是中國封建勢力佔優勢的明證。（註一）至於帝國

主義對中國經濟的作用，祇是使中國變成一個『半殖民地的國家』，而不會助長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因為——

『殖民地是世界帝國主義發展的有機組成的一部分，如果殖民地經濟走上獨立的資本主義發展，帝國主義便失去了商品的市場與原料的供給，便是帝國主義經濟基礎的根本動搖。』（李立三）

帝國主義者不獨不助長中國的工業，並且『極力扶持封建勢力，壓制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在他們看來，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必無法擡頭，因為它不能克服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工農革命運動這三大阻礙。而『反對派』（即『取消派』）則認資產階級已在中國取得優勢，今日中國經濟的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了。他們否認封建勢力之重要性，（註二）他們說：

『其實中國的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的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構造，都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久已成爲他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累）財政上（維持政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稅）的共同必要。……而且中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無論是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沒有完

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的意義，因為他已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就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的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重；封建殘餘在這一大大轉變時期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之中，變成了殘餘的殘餘；牠爲自存計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以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個區域內的統治基礎。」（陳獨秀中國革命問題）

可見中國共產黨的分裂，實由於幹部取消兩派對中國社會認識的差異和因此而引起政治策略見解的不同。

中國國民黨的學者，對這問題很早就加以注意；他們在新生命和前進發表了許多文章。在新生命裏的中國社會史論者以陶希聖氏和梅思平氏爲代表；但他們的見解是不同的，（註三）前者主張中國在資本主義侵入以前，是地主階級的社會；後者則以爲這是商業資本階級的社會。梅氏的主張，可於他底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註四）得之。他把海禁開通以前的中國社會，劃分爲六個時

期：第一個時期是『民族鬥爭時期』，他把關於黃帝炎帝蚩尤共工的傳說，歸入這個時期。第二個時期他叫它做『原始封建時期』，就是一般人所謂唐虞時代。他引尚書堯典的九族，百姓和黎民以證明它是封建式的社會。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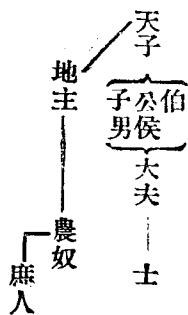
『九族和百姓都是地主階級，在經濟上是剝削者，在政治上是治者。黎民是農奴階級，在經濟上是被剝削者，在政治上是被治者。』

他把夏商時期劃爲『原始帝國時期』：這時期的特徵是中央政府的勢力逐漸擴大，但社會的組織，仍以封建制度爲基礎。這時期階級的分化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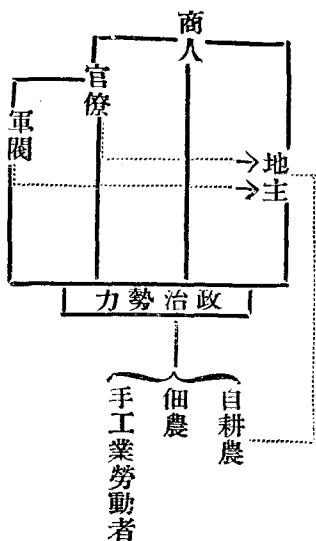
- (1) 地主……………(君主及貴族)
 - (2) 商人……………
 - (3) 官僚……………
 - (4) 農奴……………
 - (5) 手工業者……………
- } 剝削者
- } 被剝削者
- 因有市廛與貨幣
必定有手工業者

第四時期是『新封建時期』，這時期的開始是周民族的東徙。他把周民族的東徙附會到日耳曼的南徙，認爲它的結果是古代文化的毀滅，手工業和商業因此大受破壞，使社會回復到物物交換的

情況。當時社會階級的對抗是：



春秋戰國那五百多年，他總名之為『封建制度衰落時期』。這時期的社會變化，可由貴族的互相併吞，商業的勃興，農奴的解放，官僚階級的發生四種現象表示之。因為這四種變化，到了秦漢以後便形成了近世的中國社會——『商業資本社會』。其階級的對抗，可用下圖表示之：



他以爲用官僚政治或封建社會來代表秦漢以來的中國是不妥當的。因爲官僚在生產上是沒有地位的，嚴格言之，它祇是一種寄生的階級。至於地主，則這時期的新地主階級乃由自耕農，商人和官僚三者所形成；除了第一種外，他們都是土地投資者，他們都不是封建地主，所以這個時期不能算是封建時期。而且地主賴地租所得，原極有限，所以極難累積，遠不及商業資本階級求富之易；所以地主階級在政治上的勢力，遠不如商業資本階級。他又舉出秦以商業上的力量併吞六國（註五）和漢武帝以商業帝國主義作背景的侵略政策等事實來證明這個時代之爲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

陶希聖氏底主張，散見於他所著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中國封建社會史，西漢經濟史等書。但因他底著述較多，所以他底見解未免有前後不同的地方（註六）。在起初，他對中國古代的社會，大概是沒有甚麼定見。他以黃帝蚩尤時代爲中國社會史的開端，而且他把封建制度提到黃帝時代。（註七）後來在中國封建社會史裏，他把封建社會的開始，移到殷代。（註八）到了寫西漢經濟史時，他以周族爲中國封建社會的建立者。（註九）他說：

『周族對於黃河流域高邱及平原農業區域，以征服及開闢建立封建莊園。周一方面令商末

諸侯有些各守其莊園，他方面使本族及同盟部落散布於各地，『徹田爲糧』，以收奪農民的剩餘勞動。』（西漢經濟史頁七）

封建制度既於周初建立起來，他以為它約維持了七百年（自紀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五世紀）。『公元前四百年以後，封建的要素開始分解。』（註十）分解的象徵有五——

（一）等級關係的崩壞；

（二）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而爲集權國家；

（三）社會紐帶的鬆解；

（四）個人及社會階級對社會再建之無力；

（五）士人階級的勃興及軍僚制度的成立。（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頁二五五——二五八）

然則封建制度爲甚麼分化呢？他以為是由於人口的過剩和生產技術的發達（犁耕與灌溉方法之使用）。因爲犁耕及灌溉農耕之使用，封建的莊園便不能不被破壞，而農業生產力之進展，又促進了商人資本的勢力，而使封建制度分解。分解之後，很明顯的變遷是『由莊園制到分散的農場，由農奴制到佃戶制』。這個變革使政治上及意識上之上層構造或急或徐的變遷——『由分權的諸侯到集權的國家，由領主到衣食租稅的封家及以朝命爲退進而受俸不受田的官僚。』既然有這種

變遷，所以——

『祇可認為封建制度後期及資本主義前期的現象。』（中國社會現象拾零頁四）

爲甚麼既是後封建社會，同時又是前資本社會呢？因爲封建制度破壞的明日不一定就是資本主義的天下。在中國，封建制度雖已破壞於秦以前，但資本主義生產方法還沒有建立起來，而且『封建制度雖已崩壞，封建勢力還存在着』。所以：

『此二千五百年的中國，由封建制度言，是後封建社會；由資本主義言，是前資本主義社會。』（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頁一九五）

所謂封建勢力還存在者，是下列五種封建要素：

（一）現物地租，及主佃間封建苛例與封建意識。

（二）士大夫階級的統治。

（三）軍閥政府的統一與割據。

（四）財政收入及土地的分割再分割。

（五）等級思想及人與人間的隸屬關係。（中國封建社會史頁九一）

他以爲這些封建勢力，便是中國資本主義不能超出商業資本而作進一步發達的桎梏，也就是中國

農民痛苦的流泉。（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頁四〇）在這個社會——

『支配的勢力還是直接剝削中國直接生產者農民階級的地主階級。此地主階級與封建領主不同，非世襲的身分而是貨幣持有主依契約并稍帶強制來買得土地而形成。貨幣最大持有者是收奪地租的大地主及商人資本家，所以中國之地主階級與商人資本並不立於反對的地位。』（中國社會現象拾零頁一〇三）

他對秦漢以來的中國社會的認識就是如此。（註十二）至於帝國主義侵入之後，是否使中國社會變質，如變質又達到甚麼程度的問題，他的見解是——

『自帝國主義的經經勢力侵入以後，上層社會除兼地主與資本家的殘餘士大夫階級而外，新生了以帝國主義資本為中心的資本階級。在都市，資本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已有『見端』。在鄉村，全國耕地大半屬於地主而為佃田，農民土地問題形勢極為嚴重。中國社會便是這樣一個社會。』（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頁五〇）

可見他還是徘徊於資本主義和封建社會之間，二者均不願捨取。（註十二）因之，他一方面說中國金融資本，因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而日益發達，而中國工業，也因外國工業品之刺激及剩餘資本之投入而資本主義化；他另一方面又說：

『在中國社會，商人資本是支配的勢力，同時地主階級也有支配的勢力。……中國的社會的統治，常握在地主階級之手。而商人資本是構成中國地主制度的一個因子。』（中國社會現象指導頁五九）

這完全表現他底折衷的和調和的見解了。對資本主義和封建社會都不願有所捨取，這是陶氏研究秦漢以至現階段之中國社會的一個特徵。此外他的思想還有一個要點，就是他注意於中國社會之不平衡發展。他在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一章第一句便說——

『經濟發達的不平均，是中國經濟發達的一個原則。』（頁五）

這種不平衡發展的現象，實為研究中國社會史時所不容忽視的。

前進底社會史論者可以公孫愈之（即顧孟餘氏）為代表。他在該刊第四期提出他的主張說：

『中國自封建制度崩潰以後，直到現在，社會的構造沒有改變。這個構造的特徵是：（一）不發達的錢幣經濟。……（二）資本的主要形式是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很少工業資本。

（三）土地價值的流動化，購置土地成為最重要最普遍的投資。以上所舉的特徵，自封建制度崩潰後直至現在，沒有改變。最奇怪的，就是雖然和西洋通商將近百年，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的影響，而中國的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依然沒有根本改變。這個構造，可以叫做

一個「爲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資本主義」。思想是封建的，保存這個思想的有傳統的聖賢傳。經濟與社會則是初期資本主義的。」（中國的社會構造）

可見他把秦漢以來的社會和今日的經濟結構都看爲「初期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社會。

對主張秦以後中國社會是商業資本主義或初期資本主義提出反對，而主張秦以後直至今日的中國經濟性質還是封建的，是「新思潮派」的中國經濟論者。他們的主張，可用新思潮第五期「中國經濟研究專號」爲代表。他們以爲商業資本是一種交換的關係，而不是生產的關係，所以它「不能充分的媒介及說明由某一種生產方法到他一生產方法的轉移」。不但如此，商業資本的發達不獨不是「資本制生產方法的先聲」，不足以證明資本主義之發達，而且反而維持了「舊生產方法」和加緊了「封建式的剝削」。因此——

『益發是商業資本主義發達的地方，益發表現那裏的資本是沒有支配生產的作用，益發表現那裏經濟是落後。』（新思潮第五期）

中國的經濟基礎在農村，中國的經濟性質是封建，這不獨閉關時代的社會是如此，『直到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封建的剝削關係，仍然是占着優勢。』他們描寫中國今日的社會說：

『我們就中國經濟的實際情形看來，中國的經濟究竟怎樣呢？廣大面積的中國，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處，現在還經營着原始的幼稚的經濟生活。……十八行省或二十一行省地方，多數鄉村間，尤其在內地的行省的多數鄉村間，所謂農村經濟，大體仍是以自給自足爲原則。……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這種農村間成爲稀有罕見的現象。』（同上）

因此，最少自『數量』上言，『這封建的，半封建的經濟，是在中國經濟佔支配的地位。』這些封建的剝削——

『第一表現於特別殘酷的地主階級對農民之高度的佃租關係上。』

『第二表現於商業資本及高利貸之極殘酷的剝削上。』

『第三表現於軍閥官僚地主豪紳民團之一切苛捐雜稅上。』（同上）

然而，他們也說『並未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他們並且有時也承認『資本主義確比較的有較大的力量』，不過他們以爲『說到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不能不記住帝國主義是佔着絕對的優勢』，所以資本主義的發達也不過是助長帝國主義的剝削，而『根本中國資產階級沒有任何重要的工業』。不但如此，『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中……扶助封建勢力』，『用盡一切力量阻礙着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因此中國民族資本主義沒有前途，而『在全國經濟生活的比重

上，半封建關係仍然佔着比較的優勢。』

朱其華氏（又名朱新繁）底主張和新思潮派極為相近，他的著作有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和散見各雜誌的文章。（註十三）他以為封建制度破壞於春秋戰國時代之一說是錯誤的；自他看來——

『在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以前，中國依然是一個封建國家，封建制度並沒有崩潰。』（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頁二九一）

因為在這個時候，有封建的（超經濟的）剝削方式存在，而且——

『在中國，自從春秋戰國以來，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經濟依然是自然經濟佔着優勢。貨幣經濟的不發達，物物交換盛行，都是顯例。』（同上二九七）

那麼不是封建社會是甚麼？至於把封建制度看成一個狹義的分封諸侯的政治制度，在他看來，這是不對的。他不但反對人說這個時代是商業資本社會，並且根本否認商業資本的分解作用。他說：

『商業資本不僅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而且也不能破壞舊的社會制度。』（同上二八七）

帝國主義的來臨，對中國經濟結構發生甚麼影響呢？他以為中國封建制度因而破壞，中國經濟就變成了『半殖民地的經濟』。然而，『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一點，即中國封建制度雖然在十九世紀下半年已開始破壞，可是一直到現在，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結構依然佔着支配的作用。』（全上頁三二二）所以中國現在社會的特徵——

『就在封建制度已經開始破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已經開始由萌芽而發展；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還沒有完全戰勝封建勢力，所以封建勢力依然是佔着支配的作用。』

（同上頁三二五）

雖然封建勢力依然是佔着支配的作用，但因封建制度已開始崩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已存在，所以也不能算是封建社會。在他看來，我們當說『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半殖民地的社會經濟之主要特徵是——

『第一、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佔有統治的作用。……』

第二、帝國主義的侵略必須扶植國內的封建殘餘為其助手。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中還佔有強大的支配作用，這種支配作用因帝國主義的扶植而更形穩固。

第三、新式工業已經出現，但因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的壓迫束縛，阻礙其向上發展，而在

衰微停滯的狀態之中。」(同上頁五)

可見他以爲今日中國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

雖然它的結論是有很多錯誤，雖然他常常陷於機械的公式主義，但在中國用唯物辯證法去研究學術的第一部成功作品，我們不能不推郭沫若氏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註十四）在這本書的『導論』裏，他說明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階段；他的主張是——

(時代) (社會形態) (組織成分) (階級性)

(一) 西周以前 原始共產制……氏族社會……無階級

(二) 西周時代 奴隸制

(三) 春秋以後 封建制

(四) 最近百年 資本制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頁二三)

| | | |
|------|------|-----------|
| 王侯 | 百姓 | (貴族) |
| 庶民 | 臣僕 | (奴隸) |
| 官 | 僚 | 人 |
| 地主 | 農夫 | 身分的階級 |
| 師傅 | 徒弟 | |
| 帝國主義 | 弱小民族 | |
| 資本家 | 無產者 | 最後形態的階級對立 |

他很正確地斷言『商代才是中國歷史的真正的起頭』。(註十五)他引詩書易三經和卜辭的記載

以證明商代還是牧畜盛行的時代。在下辭裏，漁獵的記載雖然有一九七條（佔大多數），但田獵當中每次都差不多書明了『王』，而所獵的物類很少在百匹以上的，可見當時漁獵已變成遊樂的事，而生產狀況確已超過了漁獵時代。至牧畜貞卜的事項，雖在骨甲文中發現的極少，但從這少的幾條，我們卻可以看出當時不但有馬牛羊雞犬豕的六畜，而且象也成爲當時的家畜。同時卜辭又告訴我們當時的六畜都已用作犧牲，且一次確有用到三百四百的時候，若不是牧畜最盛的時代，決難辦到。此外在易經裏他也得着相同的結論。商代既是牧畜盛行的時代，『那嗎商代的社會必然還是一個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祇要是對於新與科學稍稍受過訓練的人，立刻便可以得到這個暗示。』（同上頁九）事實上的證據有三——

『（一）商代的王位是「兄終弟及」，這是從來的歷史上已經有明文的。

（二）據殷虛書契的研究，商人尊崇先妣，常常專爲先妣特祭。

（三）殷虛書契據余所見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現象的。』（同上頁九）

在這個商代的氏族社會中，一方面青銅器已極發達，由彝器的存在可以證明；（註十六）但另一方面則石器骨器尙盛見使用，『殷虛古器物圖錄』中之各種石骨器即其鐵證。由此『可斷然作一結論，便是殷虛時代還是考古學上所說的金石併用時代。』當時農業已經發現，（註十七）不過當時的耕具

還是石器，所以尙未十分發達。但我們已可以說『商代的產業是由牧畜進展到農業的時期』。

『原始氏族社會向奴隸制的推移，當以牧畜的發現爲開始，以農業的發達而完成。』商代末年是牧畜最盛的時期，也是農業已經發現了的時期，所以氏族與奴隸兩社會制度的推移，在殷末已經開始。因爲在當時階級制度已開始萌芽，而私有財產似已成立。（註十八）但這個社會變革要到殷周之際才真正完成，易經就是這個轉變時期的產物。在易經裏我們可以找出由牧畜轉化到農業（頁三六—四一），由母系制轉移到父系制（頁四四），私有財產權的成立（頁四五），國家的擡頭（頁四六起）階級的存在（頁五三起）……種種痕跡，但在變革後的周詩和周書裏，我們所看見的却是農業的轟轟烈烈發達，與卜辭的社會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爲甚麼有這次的變革呢？郭氏歸功於鐵的發現。『鐵的發現，論理應該是在周初，不然那農業發達的原因便無從說明，中國歷史上的一個重大的社會變革的時期也無從說明了。』（頁二二）

變革後的社會是奴隸制而非封建制。在『周金』所說的『庶人』或『人民』與臣僕器物了無分別，可見『庶人』就是奴隸。奴隸之存在，不獨可由『周金』上得着證明（頁二九五起），而在詩經裏也可以找得許多關於奴隸農民的生活（頁二六起）。但當時奴隸的工作不限於耕種，統治階級並且常常使用多量的奴隸來大興土木，開闢土地，和供徭役征戰；這是詩書所告訴給我們的（頁一

三起)。至於『奴隸之來，如周公敦克鼎之類都很詳明的表示着是來自俘虜』(頁二九七)；而且都是世傳的。

他不但企圖『證明周代上半期是奴隸制度，同時也舉出了它的並非封建制度的反證。』(頁三二四)他所用的材料也就是周金；他在周金找出了『不少的錫土田或者以土田爲賠償低價的紀錄』，從此可『證明周代已經實行土地的分割。這和井田制是根本的不相容，而此中亦無井田制之痕跡。』(頁二九九)同時他又證明『周金中無五服五等之制』(頁三〇五)，因此便斷定『周初並不是封建時代』。

奴隸制在周穆王時達到了高峯點，在周穆王末年便漸漸的衰落下去；不過『事實上周室東遷以後，中國的社會才由奴隸制轉入真正的封建制度』。(頁一九)在這轉變時期，易傳和儒道墨諸家都是文化的反映。在易傳裏我們很可以看出它的封建性和代表支配階級的折衷主義。這次社會變革的因素，甚麼呢？他以為是社會生產的重大變革；這可分四點來說。第一，刑罰的買賣，由此可見——

『當時的被支配階級已經到了有錢可以買賄刑戮的地步！假使人民沒有錢，儘管周穆王是怎樣愛錢，他從甚麼地方擷取來呢？這實際上是奴隸解放的表現。』(頁一九八)

第二，爵祿的買賣，也有同樣的意義。從這兩點我們可以推想到第三點，工商業的發達，和第四點農業的發達。（頁一九六至二二五）『以上是一般社會產業的發展，所以農民便得到自然解放的機會，手工業漸趨獨立化，商人階級也急劇的擡頭，更加以各方異民族的滲雜混處，於是而純粹的奴隸制，便不能不跟着周室的東遷而完全潰敗了。』（頁二一四）

春秋以後，『在農業方面中國才有地主和農夫對立的莊園制的產生。在工商業方面也只有師傅和徒弟對立的行幫制的出現，春秋的五伯，戰國的七雄，要那才是真正的封建諸侯。』（頁一九）後來秦始皇統一了天下，名義上雖建立了郡縣制，但在郭氏看來，他實在保全了封建制度，而且他才『不愧是中國社會史上完成了封建統制的元勳』（頁二〇）

秦代以後，『儘管一部二十四史成爲流血革命的慘史，然而封建制度的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依然無恙』。爲甚麼會有這長期的停頓呢？『一句話歸總：是沒有蒸汽機關的發現！』（頁二一）

這就是他所認識的中國社會歷史；而他把他的結論附會到馬克斯在經濟學批判所指出的進化階段（註十九）說——

『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的」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時代。』（頁一七六）

與『新思潮派』站在對立的地位的有嚴靈峯氏和任曙氏。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是前者關於這個問題的作品；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則代表了後者底主張。無論他們是怎樣的互相駁辯，他們的結論是大致相同的。至於他們所爭辯的，不過是關於中國資本主義之發生的『外鑠論』或『自發論』和其他枝節的問題。

任氏以爲近代中國資本主義之擡頭，完全由於帝國主義者的來臨，而『絕不是由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誘導出來的』；換句話說，『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鑠的』。因此就是『把握着歷史上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資本，亦不能說明現在的經濟特質』。所以欲關於中國經濟研究，有正確的觀念，必要『把握中心問題——外來的資本帝國主義問題』；而農村問題並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因爲『牠在整個經濟中已失了決定的意義，而且牠還被決定於資本主義的關係』。帝國主義既是問題的焦點，那麼我們研究當以它爲出發點，而尤其是要注重於對外貿易，因爲它是『中心問題的中心』。對外貿易所指示給我們的有三點：（一）中國對外貿易，『當一九二〇年每人已佔關平銀四兩多，佔美金五元多，英金一鎊以上。這同……戰前後俄國不過美金二元左右，印度亦過四元至六元美金的比較』，可見中國資本主義已有發展，而且

『有了「十月革命」的經濟基礎！』——進口商品已深入了並支配了全國窮鄉僻壤的經濟生活，因此破壞了封建的自然經濟。（二）帝國主義的『投資與投貨是分不開的』，因為這二者是『二而一』的。何以見得呢？他說：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產業的投資和借款（自一八八〇至一九二九），總計在七十餘萬萬圓以上，此地近五十年來的入超總數計算的結果，亦為七十餘萬萬圓以上；出入相抵，天緣巧合。那末，人們對於投資與投貨的關係當可恍然大悟吧？』（中國經濟研究緒論

修訂版頁五八）

這三點已足以相當的證明中國之經濟性質為資本主義的了，但他的所謂中國資本主義，『不是資本主義經濟學派那種偏狹的誤解的中國民族內的資本主義，而是中國地域內的——中國的和外國的一併計算在內的。』（同上頁七〇）必要在這個特殊的假定之下，他才能說中國輕工業是如何的進展，和中國重工業是如何的發達。中國既是資本主義的社會，那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到甚麼程度呢？這可分兩點來說。第一，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頁八七）。任氏用了三種『統計』作證：他以帆船代表封建經濟，以輪船代表資本主義經濟，以錢莊代表封建經濟，以銀行代表資本主義經濟，而指出『資本主義』的代表物的增加比重，以證明它已發展到壓倒封

建經濟的程度；(註二〇)這兩種『統計』他怕還不够，再以各種生絲出口的百分比來做證明，因為出口的生絲，土絲在數量上不及百分之十，在貨價上不過百分之五，而廠絲半廠絲合計，無論在數量與貨價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資本主義的生產將要奪去生產的全部領域，封建手工業的生產將要完全消滅』。(註二一)第二，『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頁九〇)怎樣證明呢？因為中國紗廠在一九二八年的錠子已佔全世界百分之二，與捷克斯拉夫同，及日本的一半；而每年用花數量更佔百分之八，與印度相同，及於日本五分之四。中國資本主義不但已發展到上述的程度，而且在繼續發展着。在他那中外『一視同仁』的『中國資本主義』定義之下，證明是很容易找得的。

嚴靈峯氏和『動力派』的主張，也是以爲今日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但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則主張『自發論』——

『誰都不曾否認近數十年來中國社會的「急劇變動」是受「帝國主義經濟侵入」的巨大影響的。但是，帝國主義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過程的作用和影響祇是次要的、附帶的；而中國社會經濟內部的發展和資本主義前期的一切經濟前提和條件是主要的基本的因素。』

……帝國主義僅僅是「促進」和「加速」這個發展過程的「直接因素」，而不是這個發展

過程中的「絕對」的和「基本」的因素！」（嚴靈峯中國經濟問題研究頁二二二）

商業資本早就對中國封建制度作長期的破壞，「在閉關時代以前商業和高利貸就已蠶食自給經濟的基礎」（頁九七），所以不能說沒有帝國主義的來臨，中國自己就不能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階段。然而，爲甚麼中國社會又竟長期沉澱在商業資本侵蝕的進化過程之中呢？「這因爲中國歷史上不曾起過轟轟烈烈的技術革命」（頁一九）但自從帝國主義促進了中國鐵路的建築和將生產技術搬到中國來，更加以中國本身的廉價勞動與豐富的天然富源，「不管原始積累的薄弱，總能多多少少地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萌芽發葉」（頁一九）。尤其是二十世紀之後，帝國主義把資本輸入中國，更促進了中國社會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我們從大工業機器進口的增長，輕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的情況，可知「中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還是有蒸蒸日上之勢」（頁二六）但他並不否認中國有封建殘餘的存在；不過自給經濟封建領主經濟在中國早已破壞，帝國主義侵入後更使之日益衰落。無疑的，資本主義經濟已在中國佔一種「領導」的地位。在這帝國主義侵略下，資本主義領導中的中國社會，他們所得的認識是——

「1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雖是複雜，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是居領導（亦即支配）的地位；整個社會的再生產行程要依賴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經濟部門之再生產行程

的。中國社會內部主要的統治者是資產階級，他們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勢力爲其後盾，換言之，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

2 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絕對地要破壞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要推動中國整個社會向着資本主義過程發展和擴大，但在國際生產力發展與民族界限發生衝突的條件之下，帝國主義要排擠中國的民族企業，操縱整個國民經濟命脈，使之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

3 因爲帝國主義是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直接因素，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有造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主要條件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必然會按一般社會發展公律而發展的，並且現在還是繼續發展着。

4 中國農村階級的分化係由於資本主義的商品輸入農村，不斷地瓦解和侵蝕自然經濟的結果。正確地說，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生產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

(同上『序言』頁八至十)

除了最近的『專制主義論』和『分期論』外，上述各家，已可代表五年來的主張。但爲着要介紹論戰的全局，所以我們在未敘述『專制主義論者』和『分期論者』之前，先把幾種較爲次要

的意見，略爲陳述。

孫偉章的中國經濟分析（見論戰第一輯）和怎樣幹祇是想調和『新思潮派』和任曙，嚴靈峯的主張，認爲在經濟上資本主義於中國社會的現階段佔優勢，而在政治上，則支配者爲封建勢力；他以爲中國社會可用下層基礎已變而上層建築未變的特殊解釋，但實則沒有甚麼新的見地，我們用不着詳述。余伯康的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見論戰第一輯），不消化地舉出資本主義和封建社會的成分，而均不願有所取捨，祇『勉強的說是半殖民地之半封建的經濟』，也可說是毫無貢獻。劉鏡園的中國經濟的分析及其前途之預測承認了資本主義佔統治地位，和任曙的外鑠論，但以『中國經濟發展之遲滯』爲『中國經濟之特色』；這也不過是企圖調和兩派的衝突，也說不上甚麼新主張。此外還有其他的折衷論者，我們都不用舉出了。

至於祇討論一個時期的次要著述，如王志瑞宋元經濟史，李達中國產業革命概觀，侯厚培中國近代經濟發展史，及論戰所載王亞南和王伯平的文章；或祇側重於單方面的著述，如熊得山中國社會史研究，周谷城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郭真中國資本主義史；或外國學者關於中國經濟的著述，我們都因篇幅所限，不能加以敘述。在這裏，我們祇能將對整個中國經濟發展的道路有所主張的戴行縉，李季，梁園東和陳邦國的意見略爲說明：

戴氏的主張見於他底中國文化的進化（見新生命卷三十號）和中國官僚政治的沒落（見論戰第一輯）。在這兩篇文章中，他都下列一表來代表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期的主張——

- 『(一)原始社會時代（自太古起至殷庚止）
- (二)奴隸社會時代（自殷庚起至周初止）
- (三)封建社會時代（自周初起至秦朝止）
- (四)過渡社會時代（自秦朝起至清鴉片之役止）
- (五)資本主義社會時代（自鴉片戰役起）』

大約他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所謂『過渡社會時代』了。

李氏的主張見於他底對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貢獻與批評（見論戰第二輯）。他把中國全部經濟的發展，劃分為五個時期：

- 『(一)自商以前至商末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至紀元前一四〇二年止）
- (二)自殷至殷末為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一四〇一年起至一一三五年止）
- (三)自周至周末為封建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一三四年起至二四七年止）
- (四)自秦至清鴉片戰爭前為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二四六年起至紀元後一

八三九年止)

• (五) 自鴉片戰爭至現在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一八四〇年起)

他對第一個階段的說明，祇靠一些可疑的傳說，是沒有甚麼價值的。他最引人注意的可算是他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時代」；讓我們看看他怎樣證明盤庚元年（傳說是前一四〇一年）起以至殷末是亞細亞式的社會。他第一步企圖證明中國社會到了盤庚，氏族已經崩潰；他用了四個證據。

第一，盤庚以前已經有文字，「所以盤庚時代正是野蠻高級的結束和文明開端的時代，也就是氏族社會崩潰和私產與國家起源時代。」第二，當時私有財產已出現，因爲盤庚篇有「貝玉」，「好貨」，和「總于貨寶」等句。第三，當時已有階級制，我們從盤庚分三篇，「告羣臣」，「告庶民」，「告百官」族姓便可知。第四，當時國家已成立，由盤庚篇和卜辭所指出的階級關係可證明。氏族社會崩潰之後，亞細亞式社會代之而興；「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的特點是土地國有。」怎樣證明殷代是土地國有呢？他的證明是——

「盤庚既因舊都耿被河水毀壞，而遷于殷墟，則新都的土地與遷來的任何私人向來沒有發生關係，這是很顯明的。殷墟相傳係成湯故都，可見其附近一定已有人定居，……不過新都地方的文化程度當較舊都的爲低，否則人民不會表現不肯遷居的心理，此處大概還沒有

跳出氏族社會的範圍。在這種情形之下，已經組織國家的專制君主的盤庚將氏族共有的土地轉變爲國有的土地，這再順利再便當也沒有了。」

此外他還有兩個間接的證據，就是孟子說的『殷人七十而助』和詩經載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兩句話，此外他又用了相似的證據，證明了周太王在盤庚後一百年也建設國家和遷都岐周，也一樣的土地國有，變成亞細亞式社會。周武王後是封建社會，他用很簡略的話說明，秦以後是前資本主義社會，有七個特徵：

『(一)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直接結合，構成一個地方小市場的網。

(二)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很佔優勢。

(三)商業宰制工業。

(四)地主階級和其他上等階級的存在。

(五)獨立生產者——手織工人——的存在。

(六)向來各種生產方法殘餘的存在。

(七)農工的破產流爲貧民和生產工具的集中。』

此外他對中國資本主義之發生，主張極端的『自發論』，而把中國資本主義時代的開端提早到『

八四〇年。這我們都不必詳述了。

梁園東和陳邦國底論戰文章，都是一方面批評沫若底主張，而一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見，我們對於批評部分，因篇幅關係，不能敘述，在這裏我們祇能把他們具體主張，略為介紹。梁氏在他底中國社會的基礎和中國社會各階段的討論（見論戰第三輯）說明下列各點：

（一）『商代的社會也不是原始共產的。我以為從商代的侵略性和奴隸的衆多，以及工藝交換形態文字用具等等導線上看來，是一種極進步的社會，單從侵略和土地的佔有上看，他已具足封建時代的狀況，即使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也是封建的前期，即是所謂奴隸社會的——家長制家族奴隸社會。』

（二）周代乃封建制社會。

（三）『在春秋戰國間所破壞的祇是上層構造的一半，其下層却仍完全和封建時代一樣，這種情形的結果，使秦漢後的中國社會，表面雖無封建制度，而實際却仍存有廣大的封建勢力，此種「封建勢力仍存在封建制度不存在」的社會，即所謂「半封建社會」。』

陳氏的結論，可在他底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見論戰第一輯及讀書雜誌二卷十一十二號）得之。他以為『在殷時期，已表示出氏族社會的完全崩潰』，『已充分的具備了發展封建社會的條件』，所以『殷

周之際是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而不是原始共產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西周時代的封建社會，在西周末年已開始崩潰。『東周時期已發展到城市手工業制度的時代了』。於是社會轉入一個新的時期——『商業資本時代』。秦始皇統一中國，就是代表商業資本的統一。不過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沒有向工業上走，而向着另一條道路走，這條道路便是土地投資，發展高利貸，於是工業的農業基礎亦沒有建立起來。同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很殘酷的破壞了農民生產，土地不斷地由農民手中失掉。』由這土地集中和農民破產所形成的社會矛盾就是歷代滅亡的因素。中國因地理的及社會條件的限制，自秦以後沒有跳出這個『循環』的圈外，以進到工業資本的領域；反之，有時它『曾企圖倒退於封建社會去』（如元代）。帝國主義之來臨，外國資本之輸入，雖『在某種限度下推動資本主義的前進』，但無疑地，今日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趨向於殖民地化的。至於『在農業方面，價廉物美的舶來品之源源而入，使家庭工業破產。……農業中機器的應用，是表示農村之趨向于資本主義化。富農，即農村資產階級，與僱農，貧農的對立，正是資本主義的關係。』雖是資本主義的性質，但終不能不趨向於殖民地化的。

上面所說的各種主張，都沒有特別注意於秦漢以至清末這一個長的時期的。現在我們當說及

以這個時期爲研究中心的『專制主義論』者和『分期論』者了。

專制主義論可以王禮錫底中國社會形態發展史中之謎的時代（見論戰第三輯）和胡秋原底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論爲代表。他們以般以前爲原始社會時代，般爲氏族社會，周爲封建社會。（胡著）到了周末，因爲（一）人民繁殖，土地兼併，（二）生產力的發展，（三）貨幣的發達，（四）社會分工的進步，（五）國際分工的興起，（六）交通的發達，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便突飛猛進地發展。（王著）然而，『商業資本不是生產資本，所以不能產生任何社會。但商業資本與封建經濟的結合，爲着自然經濟的分解，封主與封民的關係變爲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同時爲着商業資本對於政權集中的要求，而定於一尊的專制君主於以產生。』（汪）秦始皇的至上權威的專制主義政權，就應着勢的要求而建立了。秦的專制主義的政權的特色是——

『1 在土地問題上，適應地主的要求，使阡陌制成爲法定的。……』

2 在商業的便利上，開始統一幣制，適應資本家交換便利的要求。……』

3 富人（大地主與富商）的政治地位提得很高。……』

4 統一羣縣制，將封建主完全剷除。……』

事實這樣證明了專制主義政權的建立，是地主資本與商業資本的結合。』（王）

自秦以後，我們雖然可以分爲（一）兩漢至魏晉，（二）南北朝至唐末，（三）元明清三個階段（胡），但其主要社會形態均屬於專制主義社會。在這個時期間，中國社會的變化是由下面幾個要素組成的：

1 專制主義之成熟 剝削之加深——農民暴動 專制主義之崩潰。

2 生產力之破壞——商品經濟之破壞。

3 暴動之漸次平息——專制主義之再建（及其發展——崩潰）。』（胡）

還有幾種 Moments：

1 封建專制主義之頹廢，

2 蠻族之侵入——生產力之破壞，

3 封建制度之再建立，

4 從封建主義到專制主義。』（胡）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研究專制主義的特徵。第一，專制主義與封建主義的關係很特異，它既不是封建的，也不是非封建的或反封建的，而『是以封建剝削爲基礎，分解封建主義而又深化封建主義的。』第二，雖然『沒有商業資本、封建主義不能達到專制主義』，但若說『專制主義是

商業資本主義所表現『則屬謬誤，因為後者不是一種生產方法。第三，專制主義是要『維持封建主及商人利益，調和他們之間的鬥爭。』第四，它的『最大任務，在鎮壓因剝削之加深而反抗的農民』。第五，『因為貨幣的發展，增加了統治者蓄積的欲望，與無度的奢華，因而更使剝削益加殘酷，因而發生了貨幣租稅。』第六，『為着鞏固並空密這個政體，官僚與僱傭軍隊就應運而生』，且佔很重要的地位。第七，社會一般的變化是依着上面所指示的循環。

所謂『分期論』是指把秦漢以至清末的社會，分為幾個不同的時期的主張。這和普通的見解不同，這一派的主張可以王宜昌和陶希聖新主張為代表。王氏把這個長的時期分為兩個階段；他對中國社會史之發展的認識是——

『……在殷代以前是氏族社會，周秦漢西晉是奴隸社會，東晉到清末是封建社會，而一九〇〇年以來，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奴隸社會史——見論戰第三輯）

王氏的主張，大部份是把中國情形巧妙地附會到西歐的經濟史，（如把齊國附會到希臘，漢代附會到羅馬），沒有加以敘述的必要。閱者要對他的思想發生興趣，可參閱他底中國社會史短論和中國奴隸社會史。（分見論戰第一和第三輯）

陶希聖氏最近在論戰第三輯發表了中國社會形式發達過程的新估定，放棄他底舊主張，而主張『分期論』。他底結論是：

(一)『西周時代，我們認為氏族社會末期。所謂「封建」，是周族征服黃河流域以後，依族內身分而分配土地的意思。王侯乃是聯盟長及族長。被征服的氏族分隸於各氏族，但征服者與被征服者間乃是族的關係，與階級間的關係不同。』

(二)『戰國到後漢是奴隸經濟占主要地位的社會。其中的主要階級是奴主與奴隸。城市的工商業勞動都由奴隸負擔。鄉村裏固然有很多佃戶，但如任公(前漢書貨殖傳)，如樊家(後漢書樊重傳)仍以奴隸任耕作。』

(三)『自三國到唐末五代，要另劃一個時期。……這是一個發達的封建莊園時期。』

(四)『宋以後，莊園經濟漸次分解。……這是封建制度分解期，也就是城市手工業時期。這時期確可以說是先資本主義時期。』

(五)『自一八四〇年以後，中國受工業資本主義的克服，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已經不能依然照通常的社會發達過程前進了。』

我們新的陶希聖怎樣的證明『從前把春秋以降乃至清代劃入一個時期的辦法』是『站不住』呢？

他的唯一的理由是——

『沒有三千年之久不變的社會。何況生產力的進展在中國歷史上很顯然？』

生產力在中國歷史上的進展，是顯然到甚麼程度呢？陶氏說：

『大略的考一下，每一畝田地在漢初得生產一石五斗穀。西晉每畝良田大約可生產兩石多。南宋初每畝約生產三石了。參看徐氏農政全書、漢書食貨志、文選稽康養生論，方回續古今考等書。』

這就是『分期論』者的議論。

這五年來思想界對中國經濟發展的觀念就是這樣的在矛盾與對立中辯證地展開：陶希聖與梅思平，幹部派與反對派，新思潮與動力，修正派與任曙，朱其華與陶希聖，郭沫若與其批判者，任曙與嚴靈峯。分期論與不分期論，和論戰諸家的錯雜關係，都表示這次論戰是怎樣的在『一反一正相毀相成』的對抗狀態中發展。王宜昌把『論戰時期』限於讀書雜誌之專號，這是多麼一種可笑的錯誤見解！（註二）現在，論戰已有五年多了，我們可以算算總帳，並在此地把各家意見歸納於下表：

| | | | | | |
|---|--------|--------|--------|--------|--------|
| 顧靈峯 | 原始社會 | 新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梅思平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戴行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李季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陳邦國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顯孟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王禮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郭沫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孫偉章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陶希聖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朱其華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新思潮派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商業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 唐虞以前 ——前2358?)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 唐虞時代 前157-前2203?)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 夏代(前105-前1784?)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原始社會 |
| 商代 盤庚以前(前1783-前1422) 殷代(前1401-前1135) | 原始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 西周時代 (前1134-前769)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 春秋戰國時代 (前770-前247)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 秦代(前246-前207) 漢代(前203-後219)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 三國時代(220-264) 西晉時代(265-313) 東晉時代(313-419) 南北朝時代(420-588)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 隋代(581-617) 唐代(618-907)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 五代(907-960) 宋代(960-1127)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 元代(1277-1367) 明代(1368-1643) 清主近世終(1644-1840)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封建社會 |
| 現階段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資本主義社會 |

凡有***號的均位代表變形時期

看了這個表，就曉得各家意見不同之處了。在他們那錯雜紛繁的爭辯中，關於中國社會史的主要問題，都已先後明白地或暗示地提了出來。這些問題很多，但最重要的不過是下列的幾個

(一) 中國經濟史是否依着馬克斯或恩格斯底公式而發展？中國經濟結構的發展，是否有跟着西歐社會發展的道路的必要？

(二) 中國經濟史當以甚麼時代為開端？

(三) 中國經濟史中有過幾次劃分時代的變革？殷周之間，春秋戰國，三國時代，西晉末年，五代，和鴉片之役，都已先後被人指為劃分時代的地方，究竟那幾個才是真的變革時代？它們代表了甚麼變革？變革底原動力是甚麼？

(四) 中國生產工具和生產力有過若干次急激的變化？它的變化在甚麼時候，有甚麼證據？

(五) 中國農業何時發現？國家何時成立？私有財產何時開始？它們底變化如何？中國底商業、工業、貨幣……的發展經過怎樣？

(六) 中國有沒有過封建時期？它始於何時，終於何時？中國是否祇有一個封建時期？有人說中國『自有史以來，便是封建制度起源發達崩潰的紀錄』；這句話對不對？傳說上的唐虞時代是

否原始封建時期？商代是否封建社會？周代是否如一般人所說，是封建社會？三國至五代，是否自成一階段，是否封建社會？我們能否說秦至清末，或東晉至鴉片之役，是封建社會！爲甚麼在一國的歷史中竟有這麼多的地方可以被指爲封建社會的階段？

(七) 我們能否以亞細亞的生產方式代表中國經濟史之全部！中國是否有過亞細亞的一階段？倘若有的話，在商以前？在秦代？在秦漢以至清末？在……？

(八) 中國是否有過一個奴隸社會階段？倘使有的話，在商殷？在西周？在春秋至秦漢？在西周至西晉？在……？

(九) 秦漢以至清末的生產方法有沒有大變動？它是否一個完整的時代？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話，爲甚麼會有二千多年的遲滯？在這個遲滯的時期，經濟性質是甚麼？封建社會？半封建社會？後封建社會？專制主義社會？前資本主義社會？商業資本社會？過渡社會？……？

(十) 商業資本是否一種生產關係，我們能否有『商業資本社會』一階段？專制主義是否一種生產關係，我們能否在經濟史上有『專制主義』一階段？

(十一) 商人，地主，官僚，士大夫，軍閥，僱傭軍隊等在周末以至現階段所佔的地位，他們的發展，他們的比重種種問題。

(十二)商業資本的擡頭對封建社會能起甚麼作用？自周末以來，土地兼併，高利貸等等現象對村經濟有甚麼影響？歷代中國農民的狀況如何？倘若封建制度是早已崩潰的話，封建殘餘的勢力和它的變遷怎樣？

(十三)秦爲甚麼能統一中國？歷代農民革命在經濟史的含義是甚麼？太平天國革命，辛亥革命和國民革命的歷史的意義是甚麼？

(十四)中國是土著民族，歷代都受游牧民族的侵入；這些外民族的侵入對中國經濟發展起了甚麼作用？

(十五)帝國主義侵入之後是否使中國社會變質，如變質，又達到甚麼程度？中國經濟結構是否已走上了資本主義的路上？倘若答案是肯定的話，資本主義之發生是外鑠的還是內在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在繼續發展中還是在停頓着？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關係怎樣？帝國主義是否扶持了封建勢力？帝國主義是否助長了中國工業的進展？

(十六)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有若干經濟層級？以何種經濟佔領導的地位？工業資本，商業資本，金融資本，封建殘餘，軍閥剝削，等等的現狀如何？各在中國社會佔甚麼地位？起了甚麼作用？

(十七)中國社會的前途如何？中國當走那一條路以自救？

問題已經弄清楚，研究的門徑已經打開了，今後探討的人，祇要把前人的困難解決，把上面十七個問題答覆，就可以把握着中國社會過往的來程，現在的結構，和將來的前途了。

(註一)如李立三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見布爾塞維克卷三第二三期合刊)舉出了五種地主的剝削和四種軍閥的剝削。前者是：(一)「地主徵取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二)「租額以外的貢獻」；(三)「徭役的殘留」；(四)「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四)「在社會關係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後者是：(一)「強迫徵收農民極重的賦稅」；(二)「軍事勞役制的殘餘形式的存在」；(三)「分區割據的形式」；(四)「極力保護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

(註二)取消派的主張，可以說是淵源於俄國拉狄克和托洛斯基，拉氏在他底中國革命史說：「中國商業資本主義已經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的封建已經完全沒有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而集中到商業資產階級手中，他們剝削的目的，與封建主不同，因為後者不知通貨幣經濟，他們的目的不過為得黃金，裝飾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祇有商業資本家。」托氏在他底中國革命與斯達林的大綱第三十九段，也有相似的見解，反對布哈林對中國封建勢力的重視，並且大膽的說：「中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山窮水盡的形式。」

(註三)王宜昌氏以「新生命派」和「新思潮派」代表中國社會史論者的兩大派別，實是錯誤的。因為新生命本身，對中國社會史的問題，就沒有具體的一致的意見。它的代表論者梅陶二氏見解便不相同。在該刊卷一第十一號周佛海氏就這樣說：「希

聖和思平兩人，祇要一見面，就拿這個問題辯論不休。觀此就可見他們意見是如何的分歧，如何的不能自成一派。並且，即使它能自成一派，這兩派也不能代表這次論戰的全局。

(註四)見新生命第一卷第十一號(民十七年十一月)

(註五)他引史記以證明秦在戰國末年是一個最大的商業國。史記說：『秦文孝居雍，關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厄薑丹沙石鋼鐵竹木之器。南御滇黔，變僮。西近邛笮，笮馬旌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結轂其口，以所多易所鮮……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唯京師要其道。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及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因為商業那麼發達，商鞅底抑商政策不能不失敗。『後來司馬錯和張儀的辯論，就可見秦是不得不求商業上的發展。至於最後統一的事業，則完全成於商人之手。呂不韋的相秦，歷史上說來，好像是一件滑稽的小說。其實這就是商業資本階級搶奪政權的活動。李斯等的官僚都是依附呂不韋而起。呂不韋的食客也數千人。這都是官僚寄生於商業資本階級的鐵證。其統一的手段：也完全是以金融的勢力作基礎。秦始皇本紀說，尉繚說秦王用三十萬金，破壞六國的合從；後來李斯即用其計謀，以併天下。可見秦的併吞六國，完全是商業資本階級政治的成績。』(這段話是梅氏對中國社會史的一個貢獻，故詳引於此。)(註六)至於他在民二十一年的新主張，則與以前主張完全不同，以後再行討論。

(註七)例如他在中國社會史的分析就這樣說：『氏族的戰爭，如傳說上黃帝與蚩尤，炎帝與共工氏間的戰爭，使一氏族征服他氏族，便成立了初期封建國家。封建國家間的戰爭，使一國家征服他國家，便成立了次期的封建國家。社會中到了這個時期，已構了三個或四個階級。梅思平先生解釋尚書堯典所說的「九族」，「百姓」，及「黎民」為三個階級，這是我完全同

意的。……」（頁一九五——一九六）不過他在同書第二十七頁又說：「春秋以前，中國有許多封建諸侯。但是周以前，又不能說是封建社會，那個時期的牧伯，不過是氏族長。」可見當時他實沒有甚麼定見。（再參看同書頁八七）

（註八）他說：「……我們可以說約在公元前一七六年至一一二二年，黃河腹部，包含河南歸德，偃師，淇縣的地域以內，已從氏族社會進入於封建制度。」（中國封建社會史頁一三——一四）案前一七六六年為傳說上湯戊夏放桀的一年，前一二二二年為傳說上周武王伐紂的一年，可見在這裏陶氏以殷代為封建社會的發端。

（註九）在西漢經濟史裏，他對殷代社會的見解，完全同意於程憬氏，所以不加以敘述。

（註十）見中國封建社會史頁一。此外他在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頁二七一，則以戰國時代為封建社會分解期；在同書頁一九五，他又說它的分解在紀元前五世紀。可見他實以春秋及戰國時代為封建制度分解期。

（註十一）此外他對「士大夫階級」的分析，我們原應也加以敘述。陶氏在寫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時，便以士大夫身分的特質為該書的要點（頁九）。不過他自始自終就承認士大夫階級和地主有共通的利益，而在他寫中國社會現象拾零自序時，又很含糊的承認了「知識分子是統治階級的附庸或尾巴，或竟可以說統治階級以外沒有知識分子」。那裏他把士大夫階級認為一社會層的主張，自不能成立。而且本文祇注重經濟方面，所以對這點便不提了。

（註十二）他在給朱其華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寫序時，便這樣說：「因為土地制度之封建性，及商業資本之分解性，兩方面的材料都很多。主張封建制度者，專引前者的材料；主張商業社會者專引後者的材料，都各可以引出一大堆。我對於兩方面都平願捨棄，尤其是爲了指出兩方面經濟勢力的交互作用及有機結合，所以不恤兼徵並引。」他所以常不免於矛盾就是因此。

（註十三）朱其華氏曾在讀書雜誌第二卷第二期合刊聲明以「朱新繁一名義發表的著作無論已廢或尚存，他都加以否認。」

他不論用那一個名字，他的主張原就沒有甚麼不同；他的『朱其華』名義發表的並不見數用別名來待說明，否認否，似乎是不值得我們注意的。

(註十四)參看本書第三章文學革命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正如我們對顧頡剛氏的古史辯之結論，未能完全贊同，而顧氏的作品也不失為代表實驗主義的方法的成功作品。

(註十五)但在這本書中他又常追述傳說中的唐虞等時代；不過這方面的意見多屬錯誤而且在本書中不佔重要地位，所以不加敘述。

(註十六)商代的銅器其形式雕刻文字均極精巧，因而近世學者，特別是歐美人，很懷疑于它的歷史性，很多想把它們斷成周代或更後期的作品；但傅小辭出土以後，這個問題可以說完全決定了。(頁二五〇)

(註十七)團頁一四起及頁二四五起

(註十八)在頁二八一起他說明奴隸之發現和階級制的萌芽。在頁二七九—二八〇頁和二八五他用很不充足的證據推想私有財產之成立。

(註十九)馬克斯的主張是：『從大體說來，我們可以把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世有產者的各生產方法，看做經濟的社會組織的進步的階級。』(經濟學批判)

(註二〇)在這篇短文裏，筆者目的在把各家意見作忠實的介紹，而不願加以批評。不過對這位以亂用『統計』為能事的任曙，我們却不能不破例畧為指出他的謬誤。第一，錢莊和銀行都是代表金融資本，我們經找不出錢莊可以代表封建制的理由。第二，即使退一步說，錢莊可以代表舊勢力，這個表也不能證明『新陳代謝』的關係。這個表是——

錢莊 (一九二二年) 百分之六八 (一九二〇年) 三七
銀行 三二 六三

這個表沒有指出投資之實數，祇指出其百分比。據我所知，百分比的變更大部分是由于銀行資本之增加，而由於錢莊之衰落。第三，帆船和輪船都是交通工具，交通工具的發達都可以助長自然經濟的分解；我們不能以前者代表封建社會。第四，即使退一步說，帆船可以代表舊勢力，他所引的表也是不可靠的。大概任氏對海關報告的統計還沒有深切的認識，所以他不懂得帆船連例報關的很少，帆船一項不能代表它真實的情況。第五，即使數目字都對，表中所指出的是噸數而非隻數，是百分而非實數，這都是不能說明重況的。

(註二) 這個統計的用法也是錯誤的：第一，出口的生絲比重並不能代表工業上出產的生絲的比重；任氏以為祇要在海關報告上抄幾個統計表，便可以曉得中國工業的動向，這是誰也曉得是不行了。第二，即使這個表能代表中國絲業，它祇說明一種輕工業，但它無從證明『資本主義的生產將要奪去生產的全部領域，封建手工業的生產將要完全消滅』的。此外他的錯誤還有很多，因為不是本文範圍，所以祇得不提了。

(註三) 王宜昌在論戰第二輯發表了中國社會史論戰一文，在那裏他完全用他主觀的成見以估計各家價值，態度異常的不公允。他把一九二七革命後之中國社會史論戰，劃分為(一)回想，(二)研究，(三)論戰三個時期。他以新生命與新思潮代表了回想時期的兩大派別；他以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嚴霜峯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和任曙中國經濟研究為研究時期四大著作；以讀書雜誌之『論戰』專號為論戰期。這都是很可笑的錯誤。新生命不能自成一派，新思潮定與取消派相對立，而不是與新生命絕對的對立；而且這兩派也不能代表那個時候思想的全局，所以第一個時期的分析是無意

義的。至於所謂「研究期」的四大著作，除了郭氏一書外，其他都說不上研究的作品。大約王宜昌看見這幾本書的書名都有「研究」兩字，遂收在一起，名之曰「研究期」，這又是何等幼稚雅呢？倘使亂用統計數字的任禮和三篇「論戰體」文章編成的嚴氏著作，都可說是研究作品。我們的王先生又置陶澐聖熊得山周谷城王志瑞劉大鈞……於何補呢？

參考書籍

陶希聖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九二九新生命）

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一九三〇新生命）

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一九三一新生命）

中國封建社會史（一九三〇南強）

西漢經濟史（一九三一商務）

朱其華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一九三一新生命）

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一九三二新生命）

朱新繁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一九二九聯合）

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九三〇現代）

任 曙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初版一九三一中國問題研究會）

同 上（增訂版一九三三國光社）

嚴靈峯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九三一新生命）

孫倬章怎樣幹（一九三二社會科學研究社）

胡秋原亞細亞生產方式與專制主義論（一九三三國光社）

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第一輯，第二輯，及第三輯。

第一卷至第二卷

新生命第一卷至第三卷

新思潮第五期『中國經濟研究專號』

前進第四期

第十四章 結論

把這十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蛻變概括起來，可以分爲四大階段：（一）直覺主義的階段，這階段的代表人物是張君勱等；（二）實驗主義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代表人物是胡適等；（三）唯物辯證論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代表人物是陳獨秀郭沫若等；（四）東方文化的階段，這個階段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等。這四個主義的彼興此替，就代表了這十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不過有一點我們應要注意的，就是這四種思想在這十餘年來都是有勢力的，這裏所謂『某某主義階段』，就是說在這階段之內，某某主義是最盛行的吧。這四種主義除了第一種是漸漸的消沈下去外，其他三種直到現在還是很興盛的。

學術思想的變革，又可用下表分析之：

十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之變革

第一次 新文化運動——西洋文化運動

第一段 思想表現工具「德謨克拉西」化——文學革命

第二段 思想方法科學化(一)——實驗主義

第三段 思想方法科學化(二)——辯證法的唯物論

第二次 東方文化之重新提倡

若用這個分析方法，則在第一次變革之第一階段中，有『文體的論戰』（即『新青年派』和林琴南章士釗及『學衡派』的爭辯）；在第二階段中，引起了『人生觀的論戰』；在第三階段中，有『文學的論戰』和『哲學的論戰』（胡適及其他實驗主義者和唯物辯證論者的互相批評）。同時辯證法唯物論者本身亦引起了『社會史的論戰』。

第二次的變革，引起了『東西文化的論戰』和『政治問題的討論』。但東方文化的重新擡頭，現在祇是一個開始，將來是替代西方文化論者而興，還是一種『迴光反照』，現在還不可知。不過西洋文化本身的缺陷，經東方文化者指出之後，我們必有更深刻的認識。將來就是西洋文化論

者占了勝勢，思想界也必不能不受這次東方文化論調的影響，因而對西洋文化不會有完全盲從的病態。這一點的轉變，實在是很要緊的。因為現在中國一般人的心理的病態，不在不肯模倣他人，而在專事模倣他人——盲目地模倣他人。今後的學術思想家，大約能先思索一回方去模倣吧？

x

x

x

『不是人類之意識決定人類之存在，而是人類的存在決定人類之意識。』（馬克思經濟學批判）所以，不是中國學術思想的蛻變決定中國社會的變遷，而是中國社會的變遷決定了中國學術思想的蛻變。

中國經濟組織，在這百年內，遇到了西歐帝國主義的侵入，不得不起急激的變化。直至現在，中國社會還是在轉變的過程。尤其是在五四之後，中國新興的資本主義，更有急激的進展。我們祇要不是盲目地去否認事實，我們便不能說今日中國社會還是封建社會。（註二）沒有錯，封建的殘餘在今日中國社會，確仍占有相當的勢力，並想對新興資本主義，作最後的反抗。不過，其在歷史上的意義，祇是一種『迴光反照』，或最後的掙扎吧了。在我們的時代，蒸汽機和火輪船已把整個世界打成一片，我們再休要夢想我們可以離開世界而生存，我們可以超出帝國主義的世界而獨立。中國是被定命要受帝國主義的影響而走上資本主義的途上的。數目字告訴我們：一

九二八年中國的煤鑛產量較一九一三年增加了百分之八七·六；鐵鑛產量增加了百分之一〇八·八；鐵道增加了百分之三三·二；航業增加了百分之六九·二；紡紗業增加了百分之三六〇·二；出口增加了百分之六五·五；入口增加了百分之八八·三……（註二）資本主義生產這樣的長足進展的事實放在我們的面前，難道我們還要駁辯嗎？（註三）

『運命用了無限長的鎖鏈，把全部人類連繫着。一髮牽動了全局；一粒火星的觸發，燃燒了整個世界』。（註四）社會主義的蘇俄宣告成立，中國社會的變革就因而更覺複雜。階級意識底發展，勞工運動的擡頭，處處給中國新興資本主義以致命傷。中國資本主義者，一方面要掃除封建的餘孽，一方面要和新興的工人階級對敵，其地位的險惡，自屬不言而喻。兼且最近帝國主義者極力向這力量微薄的中國幼弱的資本主義工業摧殘，中國資本主義，真是四面楚歌，危險滿伏了。

這就是最近中國社會的變遷。

十餘年來中國學術思想的變遷完全是受社會變遷的推進：直覺主義代表了封建殘餘的最後掙扎，實驗主義代表了資本主義理論的展開，辯證法的唯物論代表了社會主義的擡頭，東方文化論

調代表了中國幼弱的資本主義在風雨飄搖之中的另求出路。

直覺主義不過是一種玄學的思想，玄學的思想很顯明的是封建社會的傳統觀念。然而，因為中國封建制度早已續漸的崩潰，中國封建勢力，早已續漸的幻滅，這種反動的思潮，遂失去其社會的基礎。因之，其在前十餘年的發展，祇是一種『迴光反照』而已。其實不用實驗主義者的全體動員，它也必不打而自倒了。

實驗主義是建築在資本主義基礎的一種哲學。它的特徵是注重實際的效果。這種『實利主義』完全是美國資產階級的精神的表現。同時，實驗主義是一種『改良主義』；它不贊同革命的突變，而主張『一點一滴』的演進。這完全是暗示社會當在資本主義社會之下續漸改良，而不應『一反一正』的以階級鬥爭求社會的革命。這正是今日中國資本案所深信的主義，他們認這是救國的唯一徑途。

辯證法的唯物論是社會主義革命理論的中心，它是農工革命唯一的哲學根據；它隨着社會主義而來臨中國。信仰唯物辯證論的人，反對代表資本主義的實驗主義，說它是『拜金主義』或『市僧主義』。他們以為惟有階級鬥爭，惟有『一正一反相毀相成的變革』才可以使我們達到理想的共產社會。這種哲學，是代表勞働階級的哲學。

資本主義在大陸上的發展，因受了無產階級的猛力攻擊和資本主義內在的矛盾性，其弱點一天一天的暴露出來。因此，在歐戰以前大陸便有了『反歸康德』的口號。尤其是歐戰以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礎，受了根本的動搖，資產階級更不能不另求出路，而有求助於『東方精神文明』的主張。最近，中國幼弱的資本主義因受封建勢力，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的三面夾攻，遂亦不能不另求出路，而趨向於本身自有的文化。這就推進了東方文化的論調。

可見每一種思潮的擡頭 都有其社會的基礎的。

社會的變遷可以說明學術思想的蛻變，同時學術思想亦反映出社會組織的真相。因為社會的經濟構造，是『社會的意識形態之現實基礎』；而學術思想，祇是上層的表现。基礎沒有變動，新的思潮是不會發生的。若有新的思想發生，必是社會組織變動的反映。

所以，我們祇要看見實驗主義的擡頭，已足證明中國資本主義的展開了。何況辯證法的唯物論和東方文化論都已產生而且成爲重要的思潮呢？因之，祇要不是有了『先天的結論』，沒有一個人會否認中國資本主義在支配着中國的社會的。

x

x

x

這十餘年來變遷的大勢及其背景已說明了，現在讓我們把這十餘年的帳結算一下罷。

這十餘年來中國的學術思想，是進步很迅速的。不過這個進步雖速，若拿來比較歐美各國或東隣日本的過去十餘年，我們的進步就很遲緩了。

最可惜的，就是在這十餘年間，中國總逃不出『模倣』的工作。例如張君勳不過想做中國的柏格森，胡適不過想做中國的杜威，陳獨秀不過想做中國的馬克斯，郭沫若不過想做中國的恩格爾，甚至最近梁漱溟提倡中國文化的文章，也不過是『模倣』羅素的理論吧！

筆者嘗痛論中國未能達到『長大成入』的日子說道：『爲甚麼筆者不能歌頌我們的中華民國，說她已『長大成入』了呢？原因是很顯淺的。就是她未有成年的特徵。一個人要成年，他必要有自主的能力，有創造的精神。惟有處女才是事事模倣他人，事事受他人的影響，受他人的支配的。中華民國在這二十年來，除了模倣的事業，試問她還有甚麼建樹呢？』（註五）

當然，有人會說：『不要怕模倣，因爲模倣是創造的必要預備工夫。』但中國的模倣時間已很久，中國的學術界應要努力於創造和發明了。不然，天天的跟着人家跑，便永遠的要落後。所以筆者盼望中國的學術界，能夠用點苦工，向那突飛猛進的世界思潮迎頭趕上去。祇要如是，『長大成入』的日子就在我們的面前了！

(註一) 參看本書第二章

(註二) 參看 H. D. Fong, "China's Industrialization"。

(註三) 參看 A. Nagano,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China"。

(註四) 胡適之現代的危機 (見東方雜誌卷二九號一)。

(註五) 拙作二十年來中國學術思想之蛻變 (見天籟季刊二十週年紀念專號)。